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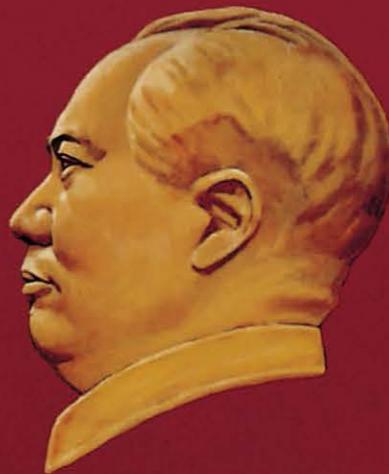
张迪杰 主编 第33卷 润东出版社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3卷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3卷

张迪杰 主编 第33卷

毛泽东全集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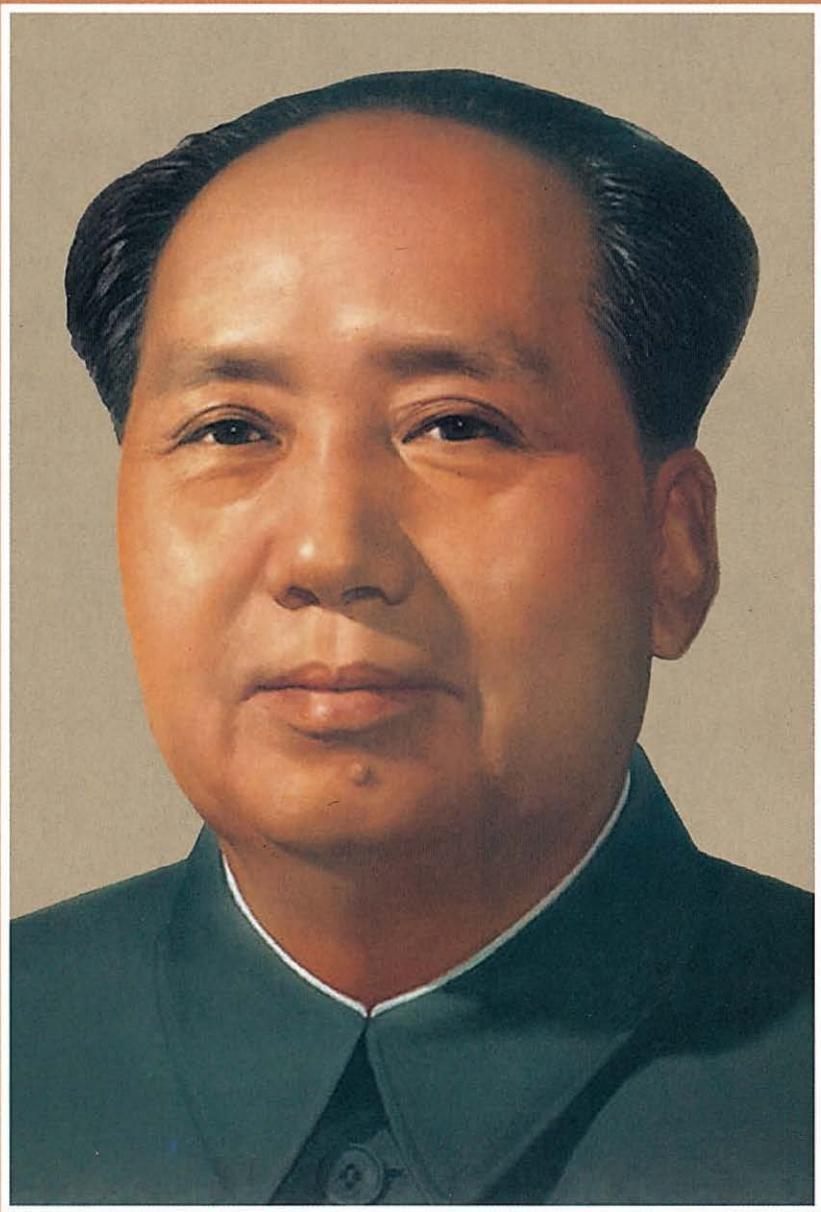
润东出版社



马恩百科（资料库）工作组
www.MEBK.org

收集 · 整理

感谢ZhuChengrui同志赞助购买本套《毛泽东全集》



毛 泽 东 同 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3卷

润东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毛泽东全集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 任 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利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加强斗争技术战术灭尽一切伞特.....	1
(1953年3月4日)	
转发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2
(1953年3月4日)	
在一封不同意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来信上的批语.....	4
(1953年3月4日)	
对李克农病况报告的批语.....	6
(1953年3月4日)	
慰问斯大林病情的电报.....	7
(1953年3月4日)	
对肖华关于派干部深入部队检查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8
(1953年3月5日)	
中央关于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延期举行的通知.....	9
(1953年3月5日)	
关于悼念斯大林逝世的命令和唁电	10
(1953年3月6日)	
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开展新三反斗争经验的批语	13
(1953年3月6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继续开展新三反的报告的批语	15
(1953年3月6日)	

对军委准备在沈阳市建立中心血库的批语	16
(1953年3月6日)	
在中央关于少数民族地区金融贸易政策的复文稿上加写的话	17
(1953年3月7日)	
给达赖喇嘛的信	18
(1953年3月8日)	
给黄炎培、陈叔通的信	20
(1953年3月8日)	
最伟大的友谊	24
(1953年3月9日)	
对财政部关于一九五二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报告的批语	29
(1953年3月10日)	
给达赖喇嘛的信	30
(1953年3月10日)	
给班禅额尔德尼的信	32
(1953年3月10日)	
军委关于同意西北剿匪部署的电报	33
(1953年3月10日)	
中央关于新三反的方针和部署的指示	34
(1953年3月14日)	
关于修筑通往福建的铁路线路问题给高岗的信	35
(1953年3月14日)	
对胡绩伟关于山东省级机关分散现象调查报告的批语	36
(1953年3月15日)	
对第二机械工业部反官僚主义报告的批语	37
(1953年3月15日)	

关于公开报道典型材料问题的批语	39
(1953年3月15日)	
在华南分局关于新三反给所属的指示上的批语	41
(1953年3月15日)	
悼念哥特瓦尔德逝世的唁电	42
(1953年3月15日)	
在军委关于同意中南军区一九五三年工作计划的复电稿上加写的话…	43
(1953年3月16日)	
批判大汉族主义	44
(1953年3月16日)	
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分散的特点	46
(1953年3月17日)	
对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甘肃临夏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报告的批语和附注	47
(1953年3月19日)	
关于向陈云建议用毛巾蘸热水擦身的批语	49
(1953年3月19日)	
中央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	51
(1953年3月19日)	
关于减少军队专职体育运动员问题的批语	55
(1953年3月21日)	
对《上海市税务机关征税中违反政策现象严重》一文的批语	56
(1953年3月21日)	
关于处理日本渔船侵入我渔区捕鱼问题的批语	57
(1953年3月21日)	
同意所提战俘交换方针	58
(1953年3月22日)	

关于准备同意讨论交换重伤病俘问题的电报	59
(1953年3月23日)	
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的批语和修改	61
(1953年3月24日)	
对湖北省委关于贯彻手工业代表会议精神的指示的批语	64
(1953年3月24日、4月4日)	
中央关于如何在县区乡进行新三反的指示	68
(1953年3月25日)	
祝贺陶里亚蒂六十寿辰的电报	71
(1953年3月25日)	
关于通报上海市税务机关征税中严重违反政策的批语	72
(1953年3月27日)	
给黄炎培的信	73
(1953年3月27日)	
给林志钧的信	74
(1953年3月27日)	
中央转发山东分局关于新三反的报告的批语	75
(1953年3月29日)	
关于妥为处理四川万县事件和江津事件的批语	77
(1953年3月30日)	
关于减少中央及各部委所发全国性电报的批语	79
(1953年3月)	
中央关于同意推迟执行群众性戒烟运动的指示的电报	80
(1953年4月2日)	
对中南行政委员会关于整顿小学的指示的批语	82
(1953年4月2日)	

关于检查军委卫生部领导工作的批语	84
(1953年4月3日、7日)	
接受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87
(1953年4月3日)	
朝鲜停战后铁道兵须以大部修路一部进行技术训练	88
(1953年4月5日)	
给黄炎培、陈叔通的信	89
(1953年4月5日)	
对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的批语和修改	90
(1953年4月)	
印发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的两个文件的批语	93
(1953年4月9日)	
关于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学习做领导工作的批语	98
(1953年4月10日)	
关于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章程及宣言中删去“毛泽东思想”字样的批语	99
(1953年4月10日)	
中央转发钱瑛关于广东发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严重情况的报告的批语	100
(1953年4月11日)	
对安子文关于清理登记全国革命烈士的报告的批语	104
(1953年4月13日)	
给程潜的信	105
(1953年4月20日)	
对财政部关于全国农业税法会议请示的批语和对中央指示稿的修改	107
(1953年4月16日、21日)	

给李烛尘的信	109
(1953年4月21日)	
要做好举行夏季战役的攻击准备	112
(1953年4月23日)	
对西南局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规定的批语	113
(1953年4月26日)	
关于修改工会工作文件的批语	115
(1953年4月26日)	
关于同意推迟军衔评定工作的批语	116
(1953年4月26日)	
给李烛尘的信	117
(1953年4月26日)	
在中央关于派人下去检查工作的几项规定稿中加写的话	118
(1953年4月28日)	
对天津市委关于发动职工讨论生产计划的经验的批语	122
(1953年5月)	
给毛泽荣的信	123
(1953年5月2日)	
关于解决任务与政策的矛盾的批语	126
(1953年5月3日)	
关于搜集敌战俘营中我伤病人员情况的电报	127
(1953年5月4日)	
关于大批减免西南灾区公粮和农业税的批语	128
(1953年5月5日)	
关于全国财政会议的议题和准备工作给陈云等的信	129
(1953年5月6日)	

对贾拓夫关于工业情况的报告稿的批语.....	130
(1953年5月6日)	
关于就战俘遣返方案同印度协商的意见.....	132
(1953年5月6日)	
中央关于基本同意西北军区甘青剿匪指挥部的布告的电报.....	133
(1953年5月8日)	
对中央关于限期完成购粮计划的指示稿的批语.....	135
(1953年5月10日)	
给张澜、黄炎培的信.....	136
(1953年5月13日)	
给黄炎培、陈叔通的信.....	137
(1953年5月15日)	
给黄炎培的信.....	138
(1953年5月17日)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高教、教育两部的请示报告上的指示.....	139
(1953年5月17日)	
对陈叔通来信的复信和批语.....	142
(1953年5月18日、19日)	
关于用中央名义发文件、电报问题的信和批语	145
(1953年5月19日)	
对邓子恢报告中关于基本完成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时间的传达问 题的批语.....	147
(1953年5月19日)	
对总政布置调查美军虐待俘虏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	148
(1953年5月21日)	
给马叙伦的信.....	150
(1953年5月22日)	

关于邀请刘澜涛参加中央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的批语	152
(1953年5月24日)	
关于付印三大条令草案的批语	153
(1953年5月24日)	
在中央会议中应有军委议程	154
(1953年5月27日)	
关于修改顾问工作守则给王稼祥的信	157
(1953年5月27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新疆分局关于加强党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 的批语	160
(1953年6月2日)	
对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队第二期教育计划的批语	162
(1953年6月4日)	
关于印发有关新税制问题的几个文件的批语	163
(1953年6月5日)	
中央转发华南分局关于加强集体领导与各部门分工负责的决定的批语	164
(1953年6月8日)	
对陈叔通、黄炎培来信和附件的批语和复信	165
(1953年6月14日)	
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68
(1953年6月15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169
(1953年6月15日)	
有关停战事务问题需早作准备	175
(1953年6月17日)	
停战签字必须推迟	177
(1953年6月21日)	

在警卫战士回乡探亲的调查报告上的批语	178
(1953年6月22日)	
给毛泽连的信	180
(1953年6月23日)	
中央转发莱阳地委关于物资供应工作总结报告的批语	181
(1953年6月24日)	
对《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批语和修改	183
(1953年6月28日)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	186
(1953年6月30日)	
对青年团二大的指示	192
(1953年6月)	
今冬明春农闲季节应集中力量解决区乡新三反问题	195
(1953年7月1日)	
接受蒙古驻华大使奥其巴特尔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6
(1953年7月2日)	
为迁移马克思墓捐款给波立特的信	197
(1953年7月4日)	
对苏联一篇文章中批评“对立的统一”提法的批语	198
(1953年7月)	
给符定一的信	199
(1953年7月7日)	
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掌握主动争取停战	202
(1953年7月8日)	
给张澜的信	204
(1953年7月8日)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206
(1953年7月9日)	
关于复会后的谈判应分两个步骤进行致李克农电	207
(1953年7月9日)	
中央关于小土地出租者、富农和地主贷款问题复西南局电	209
(1953年7月10日)	
关于缩减在辽东等地修建国防工事计划的批语	211
(1953年7月11日)	
给邹普勋的信	212
(1953年7月11日)	
涉及广大群众利益的事项未经允许不得下达	213
(1953年7月13日)	
为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题词	214
(1953年7月15日)	
对全总关于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中工会工作的指示和中央批语稿的修改	216
(1953年7月)	
在黄克诚关于歼灭登陆之敌的部署的报告上的批语	218
(1953年7月17日)	
关于停战后工作安排和志愿军参加各委员会代表人选的问题	219
(1953年7月20日)	
关于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安排等问题的指示	222
(1953年7月21日)	
坚决制止滥发统计报表	225
(1953年7月22日)	
停战协定签字后志愿军仍应提高警惕	227
(1953年7月25日)	

在中央关于处理湖东县劳改队看打死群众事件的电报稿上加写的话	228
(1953年7月27日)	
对彭德怀谈话稿的修改意见	229
(1953年7月27日)	
关于朝鲜停战后空军作战等问题的批语	230
(1953年7月27日)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32
(1953年7月29日)	
给黄炎培的信	237
(1953年7月30日)	
答谢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祝贺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电报	238
(1953年7月31日)	
给李济深的信	239
(1953年7月31日)	
关于国营企业中的工资、年终双薪、年休假问题的批语	241
(1953年7月)	
关于不要劝龙云献出其公馆内浮财的批语	243
(1953年8月2日)	
对黄克诚关于英国商船要求我护航的报告的批语	244
(1953年8月4日)	
在中央关于西南文委机关反分散主义斗争的通报中加写的话	245
(1953年8月5日)	
总政转发中南军区党委关于召开高干会议检查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246
(1953年8月5日)	

对周恩来关于中德贸易问题复格罗提渥的信稿的批语和修改……	248
(1953年8月10日)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249
(1953年8月)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252
(1953年8月12日)	
为祝贺朝鲜解放八周年致金科奉电……	260
(1953年8月12日)	
在中央给罗贵波、邓一凡的电报稿上的批语……	261
(1953年8月14日)	
在刘景范来信上的批语……	262
(1953年8月16日)	
给叶恭绰的信……	263
(1953年8月16日)	
关于海军执行运粮任务问题……	265
(1953年8月17日)	
对“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口号的意见……	266
(1953年8月21日)	
征询对告我方被俘人员书的意见……	267
(1953年8月22日)	
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	269
(1953年8月26日)	
对中央转发陕西省委传达全国财经会议精神的报告的批语和修改……	271
(1953年8月27日、30日)	
给李漱清的信……	273
(1953年8月27日)	

给毛宇居的信	275
(1953年8月27日)	
给邹普勋的信	277
(1953年8月27日)	
在审阅中央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 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稿时加写的话	278
(1953年8月28日)	
缩短主观主义时间的办法	279
(1953年)	
为公安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大会题词	280
(1953年8月)	
为祝贺抗日战争胜利八周年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电	282
(1953年9月2日)	
对陈云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六次会议上的报告要点稿的批语和修改 ..	284
(1953年9月4日)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	286
(1953年9月7日)	
给文润泉的信	290
(1953年9月8日)	
给张四维的信	293
(1953年9月8日)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 报告提纲	294
(1953年9月)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	295
(1953年9月12日)	

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慰问电	303
(1953年9月12日)	
关于感谢苏联政府援助我国经济建设的电报	308
(1953年9月15日)	
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311
(1953年9月16日至18日)	
对军委办公厅摘要报送空军安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322
(1953年9月20日)	
悼念布曼增迪的电报	323
(1953年9月24日)	
在朱德总司令国庆阅兵命令稿上加写的话	324
(1953年9月26日)	
关于阅处高岗起草的致苏联政府文件的批语	325
(1953年9月27日)	
关于一切文电必须将发文年月日写齐的批语	326
(1953年9月27日)	
给沈钧儒的信	327
(1953年9月27日)	
给易礼容的信	329
(1953年9月27日)	
关于更改拖拉机厂、矿山机械厂厂址问题的批语	330
(1953年9月28日)	
为《工学》报题写报头	331
(1953年9月)	
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讲话提纲	335
(1953年)	

粮食统购统销问题·····	338
(1953年10月2日)	
给毛月秋的信·····	341
(1953年10月4日)	
给马叙伦的信·····	345
(1953年10月5日)	
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电报·····	347
(1953年10月5日)	
在印尼总统祝贺我国国庆的电报上的批语·····	348
(1953年10月5日)	
在李大梁来信上的批语·····	349
(1953年10月5日)	
对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结论的批语·····	351
(1953年10月11日)	
美蒋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值得注意·····	352
(1953年10月11日)	
关于粮食征购、配售和管理等几个问题的提纲·····	353
(1953年10月12日)	
为冯玉祥将军骨灰安葬仪式题词·····	355
(1953年10月15日)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	357
(1953年10月15日、11月4日)	
关于重要土特产和副食品的经营问题·····	366
(1953年10月16日)	
对华南分局关于具体执行粮食征购配售政策的意见的批语·····	368
(1953年10月16日)	

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决议的通知和毛泽东对决议稿的修改	370
(1953年10月16日)	
给李漱清的信	372
(1953年10月16日)	
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的谈话	373
(1953年10月18日)	
对朝中停战代表团首席委员发言稿的修改意见	375
(1953年10月20日)	
给杨尚昆的信	377
(1953年10月22日)	
对刘少奇等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379
(1953年10月23日)	
给文九明的信	382
(1953年10月25日)	
接受印尼首任驻华大使莫诺努图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385
(1953年10月28日)	
不怕破裂也不把门关死	386
(1953年10月29日)	
给邹普勋、谭熙春、毛锡臣的信	388
(1953年10月29日)	
关于李克农回国后停战代表团工作安排问题	389
(1953年10月31日)	
对中央关于统购粮食的宣传要点稿的修改	391
(1953年10月31日)	

中央关于批判党内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指示	394
(1953年11月4日)	
对李维汉在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	395
(1953年11月5日)	
关于中央警卫团不应设立文工团的批语	397
(1953年11月5日)	
祝贺苏联十月革命三十六周年致马林科夫电	398
(1953年11月5日)	
拟公布美军细菌战战俘供词	400
(1953年11月8日)	
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当前增产节约情况报告的批语	402
(1953年11月8日)	
关于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和配备干部问题	404
(1953年11月10日)	
接受民主德国驻华大使柯尼希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408
(1953年11月12日)	
中央转发天津市委统战部关于资本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反映 的报告的批语	409
(1953年11月20日)	
关于签订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等问题的批语	411
(1953年11月21日)	
对彭德怀《四年来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建军中的若干基本问题 (初步定稿)》的批语	412
(1953年11月)	
关于揭露美军对朝中军民暴行问题	413
(1953年12月1日、3日)	

接受芬兰新任驻华公使孙士敦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416
(1953年12月2日)	
给黄炎培的信	417
(1953年12月3日)	
给袁希洛的信	419
(1953年12月3日)	
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421
(1953年12月4日)	
关于为中央政治局会议准备文件给杨尚昆的信	422
(1953年12月4日)	
关于通过公债条例及批准中朝协定给周恩来的信	424
(1953年12月5日)	
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的批语和修改	426
(1953年12月7日、13日)	
给戴毓本的信	434
(1953年12月9日)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统战人士安排问题	436
(1953年12月9日)	
对胡乔木关于在他暂离期间由凯丰列席中央会议等问题的请示 的批语	440
(1953年12月10日)	
对统战部召集人物安排工作会议请示报告的批语	441
(1953年12月12日)	
接受朝鲜驻华大使崔一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442
(1953年12月12日)	

接受丹麦驻华公使格瑞杰生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443
(1953年12月12日)	
对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	445
(1953年12月13日、22日)	
关于看望徐悲鸿夫人的信	449
(1953年12月13日)	
接受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452
(1953年12月15日)	
对金门作战建议的批语	454
(1953年12月19日)	
同意目前不打金门	455
(1953年12月22日)	
为《人民工兵》题名	456
(1953年12月23日)	
给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的贺信	457
(1953年12月24日)	
为《铁道兵》题名	459
(1953年12月25日)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任务	460
(1953年)	
对学校领导骨干、教材等问题的指示	461
(1953年)	
青少年的教育	463
(1953年)	
为海南岛海榆中线公路纪念碑题词	464
(1953年)	

为华北烈士陵园题词	466
(1953年)	
为河北清苑革命残废军人学校题词	468
(1953年)	
为韶山学校题名	470
(1953年)	
在转发邓子恢关于老根据地干部情况报告时加写的话	475
(1954年1月4日)	
对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修改	476
(1954年1月)	
关于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问题的建议	478
(1954年1月7日、8日)	
宪法起草工作计划	482
(1954年1月15日)	
关于在七届四中全会前征求对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意见的电报	487
(1954年1月18日)	
关于高岗来信和七届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问题致刘少奇电	488
(1954年1月22日)	
同意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结论稿的电报	490
(1954年1月23日)	
关于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闭幕词的修改意见致朱德电	491
(1954年1月25日)	
关于由杨尚昆转达四中全会文件修改情况和有关意见给刘少奇等的信	493
(1954年1月27日)	

目 录

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四周年致马林科夫电	501
(1954年2月11日)	
关于宪法初稿的讨论和修改给刘少奇等的电报和信	502
(1954年2月17日)	
关于宪法草案初稿修改情况给刘少奇等的信	505
(1954年2月24日、26日)	

加强斗争技术战术灭尽一切伞特^[1]

(1953年3月4日)

彭副主席^[2]阅后，送罗瑞卿同志：

在北朝鲜境内亦应实行安置反伞特据点的办法，可将此件中所述办法^[3]电告联司^[4]，并请联系和人民军总部商量，由志愿军和人民军分担，在北朝鲜境内各山头上安置多数据点，专任反伞特斗争，定期总结经验，加强斗争技术战术，灭尽一切伞特。

毛泽东
三月四日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等1953年2月23日关于各地布置反伞特斗争的情形给毛泽东、彭德怀和聂荣臻的报告上的批语。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罗瑞卿等在反伞特斗争的报告中所述的办法。报告说：国内各地均于12月下旬及一二月份举行了由公安部队召集的反伞特会议，以建立反伞特便衣武装据点为主要内容，全面布置了反伞特工作，包括设立据点、建立各级指挥机构、发动群众、组织民兵、派对空监视哨等。由于各地情况和部队任务不同，在反伞特布置上也各有特点。目前各地应该迅速解决据点部队装备问题，争取早日建起据点，提高据点部队的业务，深入检查反伞特工作的执行情形，开展群众性的反伞特斗争，以彻底歼灭降落的伞特，粉碎敌人的阴谋。

[4] 联司，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

转发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 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53年3月4日)

习仲勋^[2]同志：

[1] 指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广播事业管理局局长梅益1953年2月12日关于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中央广播事业局最近召集了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确定了今后“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总结了提高广播宣传质量的经验，并且讨论和布置了今年的任务。3年来，全国广播工作有很大成绩，但还存在许多弱点。第一是力量太分散。台数多，电力小，中央台的输出力既不足以普遍达到全国各地，更不足以负担开展有力的国际广播斗争的任务。第二是干部奇缺。编辑、播音干部很少，其政治文化水平一般比不上同级的报纸干部；技术干部也少，如不集中，全国无法组成一个包括设计、土木、天线、装线、供电的完整的基本建设的班子。第三是广播节目一般是量多而质不高，在运动中能起作用的台较多，日常能起作用的台较少。第四是广播收音网由无到有，发展很快，但不够健全和巩固。第五是广播工业有很大发展，但没有统一的管理和统一的生产计划。根据上述情况，1953年广播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中央台的基本建设；调整人力，精办节目，提高广播宣传的质量；整理与巩固广播站和收音站；统一制订广播工作的生产计划，统一管理全国工厂与修理服务机构。

[2] 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转发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似可先将梅益报告由中宣部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其宣传部，然后再发你所说的中央指示^[1]，请加酌定。

毛泽东
三月四日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向毛泽东报送梅益的报告时所说的准备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对广播工作领导的指示。

在一封不同意批评胡风^[1]文艺思想的 来信上的批语

(1953年3月4日)

熊复^[2]同志：

此事^[3]请你调查一下，以其情形告我^[4]。

毛泽东

三月四日

[1] 胡风，当时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2] 熊复，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

[3] 1953年2月25日，有人署名“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中国文协1953年1月29日召集文艺界负责人座谈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情况及他个人的感受，说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使他不理解，感到压抑、苦恼。

[4] 按照毛泽东的批示，熊复于1953年4月8日就此事向毛泽东写了调查报告。报告中说，胡风于去年7月来京，找周扬和丁玲，并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讨论他的文艺思想问题，当时周总理指示要中宣部负责处理。中宣部先后召

集了四次座谈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作了全面的批评，希望他能够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进行自我检讨。胡风口头上表示愿意考虑，实际上仍然多方为他的错误思想辩护。因此，中宣部指定何其芳（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和林默涵（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写文章进行公开批评。为了使文艺界不感到突然，决定在批评文章发表前由林默涵向北京各文艺团体的负责干部作一报告，介绍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经过情形，这就是文协召集的于1月29日晚在文化部举行的“座谈会”。这本来是一个报告会，因觉得用座谈会的名义比较随便些，故文协在会议的通知上说是座谈会，由于会议名义与内容不符，就使那位写信者得到不让大家发言的印象。这确实是一个缺点。林默涵和何其芳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以后，文艺界一般反映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肯的。在公开批评胡风前，《文艺报》和《人民日报》都收到许多批评胡风文艺思想或检查自己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的读者投书。林、何文章中所提论点，大半都是读者已经提出的，只是比读者说得较为系统些。但也有少数读者对于批评胡风表示不满或对于批评的论点表示不同意。近两年来，在一般的文艺批评中，的确存在着许多缺点，如简单化，断章取义，缺乏艺术分析，指摘多于鼓励等。这些现象在去年《人民日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的社论中已经指出。最近这种过“左”的倾向已有改变，但又呈现了文艺批评不够活跃的现象。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由文艺处收集材料，研究改进文艺批评工作。

对李克农病况报告的批语^[1]

(1953年3月4日)

尚昆^[2]同志：

克农这样对自己病状的处理是很危险的，请你劝他遵医嘱休养，并决不可那样服药法。

毛泽东

三月四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1953年2月21日关于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的病况给周恩来的报告上。报告说，李克农自1943年起，即有发作性心前区疼痛症状，每年发作一二次。去年则加重了，每月发作五六次。今年返京后，每天都发作，昨晚并曾晕倒，昏迷了五六分钟才清醒。今早苏联大夫和黄树则同志会诊，诊断为“冠状动脉硬化”及“过度疲劳”，建议到医院检查治疗，李克农尚未同意。安眠药平常服量为0.2毫克，他竟服过0.8毫克，我已再三劝他不能这样用，如此用下去有中毒的危险。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慰问斯大林病情的电报

(1953年3月4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

亲爱的约·维·斯大林同志：

获悉您患重病的不幸消息，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我本人怀着最关切的心情，向您谨致诚挚的慰问，并衷心地希望您的病情好转，恢复健康，以慰中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祝望。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三月四日于北京

对肖华^[1]关于派干部深入部队 检查工作的报告^[2]的批语

(1953年3月5日)

肖华同志：

分组下去检查很好。惟每组每次检查时间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时间似太长，以半月至二十天回来报告为适宜，过几个月再去检查一次。如以一个半月时间而论，可分三次去，每次半个月就够了。

毛泽东

三月五日

坐飞机、火车、汽车，半个月可看看许多地方。

[1] 肖华，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

[2] 指肖华1953年3月5日关于派干部深入部队检查工作问题给毛泽东、彭德怀的报告。报告中说，为了贯彻中央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拟采用分批派遣干部深入部队检查工作的办法，以推进全军开展这一运动。总政治部第一期检查工作的人员共分五组，各组检查工作时间为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检查重点为各军区的主力部队及文化教育工作。

中央关于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延期举行的通知^[1]

(1953年3月5日)

各中央局、分局、大军区、志司，并转各省市区党委：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延期，确定日子待后通知，但本月内确定不能开会。

中央
三月五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

关于悼念斯大林逝世的命令和唁电

(1953年3月6日)

—

我们伟大的盟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大元帅不幸于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晚九时五十分（莫斯科时间）逝世。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于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最敬爱的朋友和导师的无限沉痛的哀悼，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于伟大盟邦领袖的崇敬，兹规定：一、自一九五三年三月七日起至三月九日止全国下半旗志哀；二、在志哀期间，全国各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及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

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同志：

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我自己，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获悉了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和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逝世的消息。这不仅是苏联人民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整个和平民主阵营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失。我现在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及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三十多年来不断的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又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斯大林同志的不朽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主席同志，光荣的列宁、斯大林的党，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定将得到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兄弟般的始终如一的信任和支持。中国人民一定会以最大的坚定性，和伟大的苏联人民永远紧密地团结一致，巩固并加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提高警惕，加倍努力，打击战争挑拨者，为苏中两国人民的永久利益和世界和平与安全而奋斗到底。我相信，全世界一切劳动人民和爱好和平的进步人类，都将和我们一道，遵循斯大林同志指示的方向，把保卫世界和平的神圣事业担当起来。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于北京



1953年3月6日，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到苏联驻中国使馆吊唁斯大林。

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开展 新三反斗争经验的批语

(1953年3月6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地委：

河北省的经验^{〔1〕}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并登党刊。希望各省市仿照河北省委的榜样，在一九五三年内结合各项工作，有领导地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3年3月5日向所属通报的河北省委领导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斗争的经验。通报说，河北省委各级领导机关，过去严重地存在着不很注意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和不揭发坏人坏事的现象。在中央发出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和华北局不断督促之后，河北省委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并于1月下旬召开地委、市委书记会议，由省委书记林铁主持，严肃地处理了易县台底村干部的违法乱纪案件和石家庄植物油总厂因领导干部官僚主义导致火灾造成国家财产严重损失的案件。之后，省委、省人民政府和有些地、市委连续处理了一批严重违法乱纪、破坏人民利益的典型案件，惩办了严重违法乱纪、欺压人民的坏分子。这些典型案件的处理，都通过《河北日报》公开发表，对干部和群众起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河北省委这种严肃认真地处理违法乱纪典型案件的措施，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进一步密切与巩固了党和广大群众的联系，增强了群众揭发坏人坏事的勇气。河北省委领导这一斗争的经验是：第一，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第二，实行自我批评，毫不留情地揭发坏人坏事。第三，加强检查工作，派得力干部深入厂矿、机关和农村进行重点检查和处理典型案件。第四，通过报纸，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

开展新三反斗争，并请在春季三个月内选择几个典型案件，由省委书记亲手主持，开展斗争，在报上揭露，以为全省倡导。

中央
三月六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继续开展 新三反的报告的批语

(1953年3月6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地委和县委：

华北局三月一日的文件^[1]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并登党刊。华北局对于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已做出第一个总结，并作了有分别的部署，望你们都仿照这样做。

中央
三月六日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3年3月1日关于继续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报告。报告中说，华北地区反对官僚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已取得了一些成绩和经验，但运动开展得很不平衡，许多领导认识不足，注意不够，仍处被动。为此，华北局提出：结合当前工作，继续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斗争；并采取有领导、有重点地逐步深入的办法，切忌急躁情绪和急风暴雨方式；首先组织各系统的领导机关干部学习有关文件，联系思想，结合实例，进行检查；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应有不同的检查重点；3月初再召开一次省市处理人民来信会议，检查处理人民来信情况。

对军委准备在沈阳市 建立中心血库的批语^[1]

(1953年3月6日)

此事请彭^[2]注意，督促有关机关予以审查，起草复电。是否需要建立如此巨大的血库，请加斟酌。

毛泽东
三月六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对东北局批转沈阳市委关于为抗美援朝动员献血计划的摘要上。摘要说：中央军委决定在沈阳市建立一个规模巨大的中心血库。根据抗美援朝前方的需要，拟先由机关、部队、学校开始，动员献血，计划每天300人，采取6万毫升。沈阳市委要求将动员献血与抗美援朝的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在动员中必须严格遵守自觉自愿原则，反对单纯任务观点和强迫命令作风。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在中央关于少数民族地区 金融贸易政策的复文稿上加写的话^[1]

(1953年3月7日)

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混合使用银元和人民币者，亦照南胡所提比价^[2]作出合理调整。

[1] 毛泽东这句话，加写在中央给中财委并中国人民银行的复文稿中以下一段话之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金融、贸易政策应采取稳步前进而对少数民族（包括本地商人及上层分子）有利的方针。切忌躁进，尤其不可将内地办法搬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货币问题，中央同意南、胡所提的第二方案，请即照办。”南、胡的第二方案，是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副行长胡景溪1953年2月25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货币问题的第二种办法，即在目前基础上，通过稳定人民币与银元、杂洋比价来稳定货币市场，以开展物资交流，从而使少数民族逐渐转变喜爱硬币心理，建立人民币威信，在将来条件完全成熟，少数民族完全同意的情况下，水到渠成地统一货币流通。

[2] 指南汉宸、胡景溪报告中提出的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按一万元（指旧币）兑换银元一元计算。

给达赖喇嘛^[1]的信

(1953年3月8日)

亲爱的达赖喇嘛先生：

饶西·彭措札喜^[2]带来的你于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九日写给我的信及你的相片均已收到。你对祖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所表示的亲爱，你为西藏僧俗人民谋求幸福生活，做好各方面工作的决心，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在为祖国和西藏民族利益奋斗的道路上，你达赖喇嘛先生和班禅额尔德尼^[3]先生和西藏僧俗人民永远会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帮助。

自然，在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我们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帝国主义和反动破坏分子也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因此，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国防，巩固汉藏民族之间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严防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和其他反动破坏分子的阴谋活动，并克服我们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的障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西藏僧俗人民的幸福前途。你和西藏人民如果在这一方面遇到困难，中央人民政府会帮助你获得妥善的解决。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

[2] 饶西·彭措札喜，达赖喇嘛的姐夫，当时在西藏地方政府外事局任职。

[3]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

西藏的宗教和在国内其他地方的宗教一样，是已经受到尊重和保护，并且还将继续受到尊重和保护。只要人民还相信宗教，宗教就不应当也不可能人为地去加以取消或破坏。

张经武^[1]同志不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他为西藏僧俗人民谋福利的决心和你是一致的。你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和他商议，他会尽力地帮助你。希望你多找机会和他面谈，如有需要直接告诉我的事情，亦可由他转达。

附送最近相片一张，以志纪念。顺祝健康。

毛泽东

三月八日

[1] 张经武，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

给黄炎培、陈叔通^[1]的信

(1953年3月8日)

黄任老、陈叔老：

此件^[2]请阅，并予掷还。如有意见，请告。

任老来信要将我上次谈话向工商界传达，我认为可将要协商，要公平，有多少本钱做多少生意，赚多少钱收多少税等带原则性的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政务院副总理。陈叔通，当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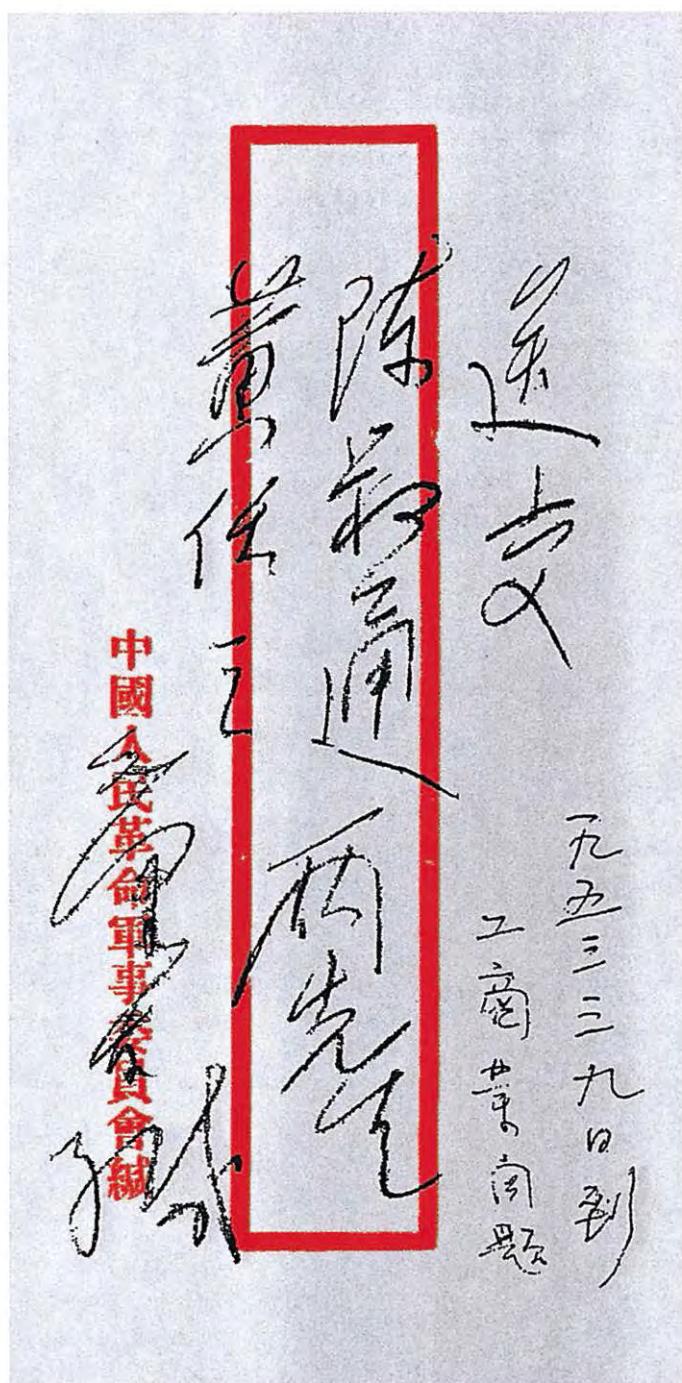
[2] 指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1953年3月4日关于各地汇报1952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准备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为了做好1952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春节前后曾由税务总局召开了一个由各大区及主要城市税务局长参加的会议，汇报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准备情况。会议认为，3年来税收工作有成绩，但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如负担上的偏高偏低，做法上的简单从事，作风上的生硬粗糙、强迫命令。会上批判了拿典型套任务，要任务不要政策的错误做法和观点，特别是批判了五反以后征收工作中所发生的许多违法乱纪事件，指出这些错误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造成了政治上很大损失，使工作陷于被动，今后必须坚决纠正。会上我们也检查了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指出要对这些错误负主要责任。在检查工作的基础上，对1952年所得税的汇算清交工作，包括政策与任务的关系、所得税税收计划以及税收工作中的几个具体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具体处理的原则和政策。

话，说给一些人听，其余不必传达；即使这些原则性的话，也只可非正式的说一说，不必正式传达，因为这些话实在太普通，是普通常识范围内的事，因为我们政府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许多事办得不好，才显得这些话好像颇为新鲜。具体解决问题的办法则要由财政部税务机关及其他机关逐一认真研究，才能妥善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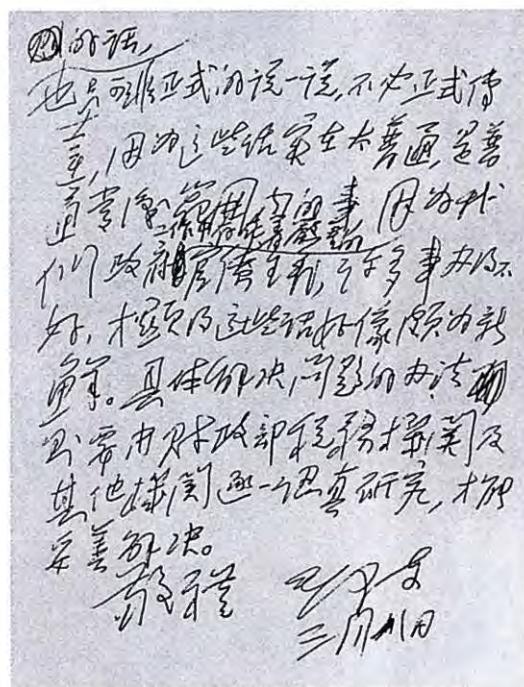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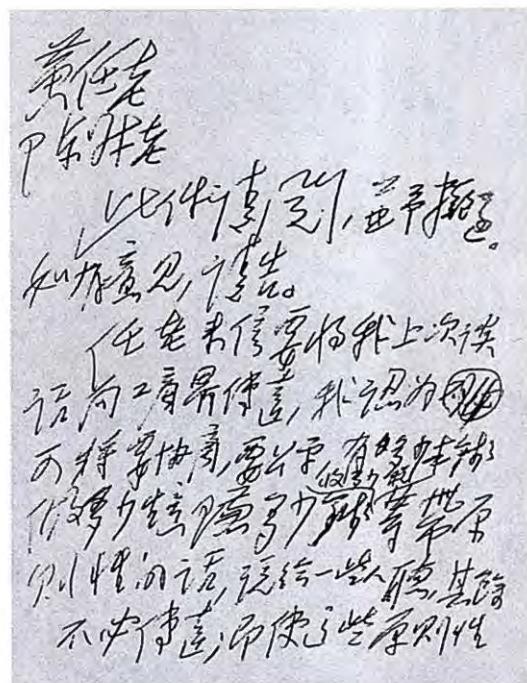
敬礼！

毛泽东

三月八日



毛泽东致黄炎培、陈叔通信的信封。



毛泽东致黄炎培、陈叔通的手稿。

最伟大的友谊^[1]

(1953年3月9日)



《伟大的友谊》(油画)

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伟大的导师，不朽的列

[1] 这是毛泽东悼念斯大林的署名文章。

宁的战友——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与世长辞了。

斯大林同志在理论的活动上和在实际的活动上所给予我们当代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斯大林同志代表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新时代。他的活动引导苏联人民和各国劳动人民转移了全世界的局面，这即是正义的、人民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在世界大规模的范围内，在地球上人口三分之——八万万人以上的范围内取得了胜利，而且这种胜利的影响，正日益普及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斯大林同志的逝世，使全世界的劳动人民感到了无可比拟的沉重的悲痛，激动着全世界的正义的人们的心。这就是表明，斯大林同志的事业和他的思想掌握了全世界的广大人民群众，而且业已变成了无敌的力量，这种力量将引导那已取得胜利的人民由胜利进入新的胜利，同时也将引导那一切还在邪恶的资本主义旧世界压迫下呻吟的人们能够对于人民的敌人进行勇敢的冲击。

在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同志指导苏联人民，把他和伟大的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共同缔造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成了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这不只是苏联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胜利。第一，这个胜利用最现实的生活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限正确，具体地教育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应该如何朝着美好的生活前进。第二，这个胜利保证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能够有战胜法西斯野兽的力量。不能设想，没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能够有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关系全人类的命运的，而这些胜利的光荣应当归于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全面地划时代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斯大林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列

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首先胜利的理论；斯大林同志创造性地贡献了关于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理论，贡献了关于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理论，贡献了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的理论，贡献了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斯大林同志还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斯大林同志这一切创造性的理论，进一步地把全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进一步地把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使世界的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人们为解放和幸福的斗争及其胜利达到空前未有的规模。

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朽的文献。他所著的《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以及他最后的伟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是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综合。他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是给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一篇宝贵的遗嘱。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一样，是从斯大林同志的伟大的著作中去找寻自己胜利的途径的。

从列宁逝世以来，斯大林同志一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我们围绕着他，不断地向他请教，不断地从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斯大林同志充满了对于东方被压迫人民的热情。“不要忘记东方”——这是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伟大号召。人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他献出了崇高的智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遵循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得到了伟大的苏维埃国家和各国一切革命力量的支持，而在几年以前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现在，我们失去了伟大的导师和最真挚的朋友——斯大林同

志。这是多么的不幸呵！这个不幸所给予我们的悲痛，是不能够用言语来形容的。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悲痛化为力量。为着纪念我们伟大的导师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名义下的伟大友谊将无限地加强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更加紧学习斯大林的学说，学习苏联的科学和技术，以建设我们的国家。

苏联共产党是列宁斯大林亲手教养起来的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最有经验的和最有理论修养的党；这个党在过去和现在是我们的模范，在将来也还是我们的模范。我们完全相信以马林科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是一定能够继承斯大林同志的遗志，而把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并且发扬光大的。

毫无疑义，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将变得更加团结，更加强大。

三十年来，斯大林同志的学说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榜样，推动了世界的大踏步前进。现在苏联已达到这样的强大，中国人民革命已获得这样的伟大胜利，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设已有这样的巨大成就，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压迫反侵略的运动已有这样的高涨，而我们的友谊和团结的阵线又是这样的巩固，所以，完全可以断言，对于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都是不怕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将被我们所粉碎，一切卑鄙的挑拨都是完全没有用的。

伟大的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所以是牢不可破的，因为我们的友谊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的原则而建立起来的。中苏两国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全世界各国一切爱好和平、民主及正义的人民之间的友谊，

也正是建立在这样伟大的国际主义原则上，因此，也就是牢不可破的。

显然，我们这种友谊所产生的力量是无穷无尽和真正无敌的。

让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战争贩子们在我们伟大的友谊面前颤抖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万岁！

伟大的斯大林的英名永垂不朽！

对财政部关于一九五二年所得税 汇算清交工作报告的批语^[1]

(1953年3月10日)

一波同志：

此件^[2]很好。应当（一）用中央名义将此件转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地委县委，各大中小城市市委；（二）由中财部以命令下达税务系统的各单位。一个中等县就有八百多财经干部，县委和这些干部对税收政策都不甚摸底，有很大偏差，故须下达至县委。至于小城市，例如临清、泊头等处只要有市委组织，也应下达。以上都请你办。此件已送黄炎培、陈叔通阅，他们表示同意。

毛泽东

三月十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薄一波1953年3月8日关于1952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中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召开了次会议，各大区及主要城市税务局长均参加。会前税务总局曾作了若干城市税收工作的调查研究，准备充分。这次会开得很好，解决了不少问题，是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的，一般合乎主席所指示的“有多少本钱，做多少生意，赚多少钱，收多少税”的精神。因此，有转发各地参考的必要。

[2] 指薄一波随信报送的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1953年3月4日关于各地汇报1952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准备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

给达赖喇嘛^[1]的信

(1953年3月10日)

达赖喇嘛先生：

感谢你一九五二年八月十六日及九月三日（藏历水龙年七月十四日）的信和礼物。

西藏地方政府及人民，在你领导之下，协助人民解放军的入藏部队，加强团结，并争取协议的逐步实现，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

你所派的致敬团和参观团代表都肯努力工作和学习，你的办事处已正式成立，办事处的人员也努力工作。

中央对西藏的政策除已明确地写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者外，我在接见致敬团和参观团的代表时曾又简要地告诉过他们。这些简要的话，柳霞·土登塔巴已经在他对西藏的广播^[2]中谈到，想你已经知道了。

建设新西藏所需要的帮助，凡属能够办到的，中央当尽可能地办到，但因交通阻隔，有些事情一时无法办到，只好等待以后再办。西藏致敬团和参观团的代表们在这里所提出的要求，中央人民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

[2] 柳霞·土登塔巴，1952年10月任西藏致敬团团长率团来北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52年11月22日，他在对西藏的广播讲话中，转达了毛泽东同西藏致敬团和参观团谈话的要点。

政府就是本着以上这种精神处理的。兹不赘述。以后你和班禅额尔德尼^[1]需要中央帮助之处，均可告诉张代表^[2]或请张代表用电报转告我。

祝你领导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逐步地建设，使西藏日渐繁荣，西藏僧俗人民的生活日加改善，藏族的前途日加光明，祖国的边防日加巩固。并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

随函附送：扩音机两个、附带喇叭四个，电转一个、附带片子十二张，黄缎四匹，长白山人参一个，貂皮衣筒一件。

[1]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

[2] 指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

给班禅额尔德尼的信

(1953年3月10日)

班禅额尔德尼先生：

感谢你一九五二年八月三日（壬辰^[1]六月十二日）的来信和礼物。

你回藏后，努力为汉藏两族之间的团结及西藏内部的团结做了许多工作，并为当地僧俗人民的利益做了工作，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在爱国和团结的基础上，相信我们的友谊会与日俱增地巩固和发展起来。

随函附送扩音器两个，附带喇叭四个，电转一个，留声机片子十二张，又黄缎三四匹，长白山人参一个，貂皮衣筒一件。并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

[1] 壬辰，即1952年。

军委关于同意西北剿匪部署的电报^[1]

(1953年3月10日)

西北军区，并西南军区：

西北军区三月八日电悉。同意甘青剿指^[2]之剿匪部署及西北军区之意见。望令剿指注意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主要是物质补给困难和少数民族对我不了解的困难，遇到这些困难时，必须鼓励部属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之，务达全歼各匪，不可半途而废。

军委

三月十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并西南军区的电报。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于1952年11月成立的甘青剿匪指挥部，彭绍辉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治委员，负责指挥所属部队，在西南军区和空军配合下，剿灭盘踞甘（肃）、青（海）、（四）川边藏族居住地区的马良武装股匪。

中央关于新三反的方针和部署的指示^[1]

(1953年3月14日)

华东局，上海市委，并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

(一) 上海市委三月二日及华东局三月九日两电均悉。中央同意华东局对上海市第一次党代表会议着重新三反的综合报告的批示。以后此种会议每半年应开一次，会期可缩短些。(二) 今年三、四、五月应着重在大区一级，省市一级和专区一级共三级，检查领导机关和各业务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而将检查县区乡三级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作为典型试办，取得经验，以利推广。今年六、七、八、九月应配合大选工作在县区乡三级着重检查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同时继续检查大区省市和专区的官僚主义。望你们按此方针进行部署，并注意和各项具体工作相结合，不要孤立地进行新三反。

中央
三月十四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

关于修筑通往福建的铁路线路问题 给高岗的信

(1953年3月14日)

高岗同志：

此件^[1]请你与铁道部同志商谈审查，以其结果告我。

我意只要工程方面无特别严重困难，较原拟南昌、抚州、瑞金、厦门线为好，闽北、闽南均可满足。惟贵溪至朋口线国民党时期似未留下戡〈勘〉测材料，须重新做，完成时间可能要延长一点。

毛泽东

三月十四日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震1953年2月18日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副总参谋长黄克诚的报告。报告说，关于修筑通往福建的铁路线路问题，铁道部原拟的线路是：从南昌以南的南塘起，经南城、南丰、广昌、石城、瑞金、长汀、朋口、龙岩、漳平、华安至嵩屿，全长922公里。华东军区又提出如下线路：从浙赣线的贵溪站始，经光泽、邵武、顺昌、南平、沙县、永安、连城、朋口、龙岩、漳平、华安至嵩屿，此线长约1000公里。两个方案相比较，铁道部所拟的方案，距海岸线深远，纵深较大，不易受战争影响。华东军区所提的方案，线路经过福建大部地区，照顾了福建交通不便的情况，在军事上从华东支援作战较近，将来续修至福州的铁路亦较近。究竟修筑哪一条线路为好，请审查指示。后来通往福建的这条铁路，基本上是按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赞同的华东军区的方案修筑的。

对胡绩伟^[1]关于山东省级机关 分散现象调查报告的批语

(1953年3月15日)

饶漱石、安子文同志：

此件^[2]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我意可以在人民日报发表。如同意，请考虑是否需要征得山东分局的同意，请酌量处理。嗣后各地有此类好报告，请你们择要发表。

毛泽东
三月十五日

[1] 胡绩伟，当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2] 指胡绩伟1953年2月21日关于山东省级机关分散主义现象给邓拓并转胡乔木、安子文的报告。报告说：在去年12月山东分局扩大会议之前，省人民政府总的领导十分薄弱，形成各厅局各自为政的严重分散现象，很多重大的指示决定，各厅可以不经批准擅自发出。分局委员会本身的党委制也很不健全，同样存在严重分散现象，多数分局委员对全面工作关心不够，没有把参加分局全面领导当作是委员的重要任务，分局开会讨论不是自己管理的问题时，常常兴趣不大，意见不多。分局扩大会议以后，分散现象虽有根本改变，但分局的统一领导还是不强。而这个问题不很好解决，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将会受到很大影响。胡绩伟的这个报告，中共中央于1953年3月2日批转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山东分局，后来未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对第二机械工业部 反官僚主义报告的批语

(1953年3月15日)

黄克诚、德怀、子恢、小平、仲勋^[1]同志阅，退薄一波^[2]同志办：
此件^[3]请你们一看，教训很大。

请黄克诚同志指导总后勤部及各大军区后勤部、志愿军后勤部、各特种兵后勤部，仿照第二机『机』械部办法，彻底检查仓库物资，反对官僚主义。请仲勋指导中央卫生部及各有物资的部门

[1] 黄克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2]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3] 指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机械工业部1953年2月20日关于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情况给中财委并报毛泽东、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检查中初步发现了以下问题：（一）库存物资严重积压，至1952年底为止，积压各种物资及原材料总数达21980余亿元。其中7个直属仓库所存物资约值12000多亿元。（二）1953年的国内供应和国外进口计划均有盲目性。（三）编制计划中也有错误。发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为反对官僚主义，改进今后工作，除对官僚主义继续深入检查外，必须建立眼睛向下，面向实际，面向群众的工作作风，在具体工作中认真执行一般号召与典型示范相结合的工作方法。

(如电影局)，检查官僚主义情形。请子恢指导农林水三部检查自己的官僚主义。请一波指导财委所属其他各部仿机机〈械〉二部办法彻底检查自己的官僚主义。

毛泽东

三月十五日

关于公开报道典型材料问题的批语

(1953年3月15日)

刘景范^[1]同志：

简报上的许多材料，都应当公开报道，并发文字广播，三五天一次，方能影响运动的正确进行。如本号凤城县的好事例^[2]及各地的不好事例，凡典型性的，都应当公开报道。请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同志商酌处理。

毛泽东

三月十五日

[1] 刘景范，当时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2] 指辽宁省凤城县在贯彻婚姻法试点中向群众进行深入宣传的经验。这个事例刊载在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办公室1953年3月13日编印的《贯彻婚姻法运动情况简报》第十一号上。

毛泽东致刘景范信的手稿。

在华南分局关于新三反 给所属的指示上的批语

(1953年3月15日)

饶漱石、安子文同志：

最近有许多关于新三反的文件，文尾多有希望中央指示的话，均请你们予以批复。有些重要的文件，可在中组部的党内刊物上发表，有些则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如已付给你看的山东分局及胶州地委的文件）。

毛泽东

三月十五日

此件^①写得很好。

[1] 指中共中央华南分局1953年2月23日关于新三反给所属并报中南局、中央的指示。指示分析了广东地区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情况，对华南地区的新三反作了如下布置：（一）必须以反对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为重点，首先从分局、省、广州市反起，逐步推到行署以下。要学习有关文件，有重点地进行检查，并将检查过去与改进今后工作密切结合。（二）由省到县应立即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处理典型事件，并迅速加强政府监察和党的纪检部门的干部，组织力量，集中揭发，造成浓厚的空气。（三）县级以下必须结合当前工作进行。（四）要区别问题性质，切忌简单粗暴。对过去因执行政策有偏差而处理错误的问题，需予纠正，但不能把这些偏差与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混为一谈。

悼念哥特瓦尔德^[1]逝世的唁电

(1953年3月15日)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主席团：

我以非常悲痛的心情，获悉哥特瓦尔德同志不幸逝世的消息。哥特瓦尔德同志不仅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伟大领袖，而且也是世界和平民主事业的卓越斗士。他的逝世，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于整个世界和平民主阵营，都是无可弥补的损失。我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并以我自己的名义，谨向您们，并通过您们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我深信：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捷两国人民的亲密团结和友好合作，进一步增强以我们的共同盟邦——伟大的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事业中，哥特瓦尔德同志的辉煌贡献将永远鼓舞着中捷两国人民奋勇地胜利地前进。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五日 北京

[1] 哥特瓦尔德，即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生前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

在军委关于同意中南军区一九五三年 工作计划的复电稿上加写的话

(1953年3月16日)

(三) 将此电^[1]及中南军区司令部二月二十三日来电^[2]发给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党委会，关于允许下级批评上级所犯错误，用向上级提意见的方式表现出来，请照此办理。

(四) 将此电及中南军区二月廿三日电发给军委各部门研究，并加以检查，所犯错误应加改正。

(五) 关于军委各部门所发文件有些互相矛盾一事，不但与各部门有关系，也与军委过去在这方面缺乏统一调节的工作有关。今后军委当建立这种统一调节的工作。

[1] 指军委1953年3月16日关于同意中南军区1953年工作计划的复电。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司令部1953年2月23日给军委的电报。电报说，在中南军区党委1953年1月7日至17日召开的扩大会议上，省军区的同志对编制提出了一些意见，认为省军区机关的编制定额太少，省军区除机关本身外，还代管了一些单位，而临时任务又不断增加，比如新兵的动员和训练，接收志愿军伤员，安置残废人员，而对这些人员的管理、教育与供应都没有专门机构，在原有编制定额中也不包括。建议在定编制时应考虑上述情况。

批判大汉族主义^[1]

(1953年3月16日)

有些地方民族关系很不正常。此种情形，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都要派出懂民族政策、对于仍然被歧视受痛苦的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访问，认真调查研究，帮助当地党政组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走马看花的访问。

根据不少材料看来，中央认为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大都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有些是很严重的问题。表面上看来平静无事，实际上问题很严重。二三年来在各地所发现的问题，都证明大汉族主义几乎到处存在。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即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这些同志和人民而尚未获得马克思主义教育、尚未学好中央民族政策的问题，故须进行认真的教育，以期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个问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的一部分。

题。另外，应在报纸上根据事实，多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判，教育党员和人民。

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 小农经济分散的特点^[1]

(1953年3月17日)

即使在互助合作组织普遍发达的农村，也要照顾这种分散的特点，因为目前的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还是小型的组织，并且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使用落后工具的。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稿上加写的话。

对中央转发西北局 关于甘肃临夏检查民族政策 执行情况报告的批语和附注

(1953年3月19日)

—

送李维汉^[1]同志再阅，在附件中添了一个附注^[2]。

毛泽东
三月十九日

—

有些地方民族平等基本实现了，民族隔阂基本消除了，在这些

[1]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2] 即本篇二。毛泽东为中央写的这个附注，加括号写在中央转发的西北局1953年2月20日给甘肃省委的复文中“根据临夏县的检查报告，目前存在于汉族干部和汉族群众中主要的是残余的大民族主义倾向”一句话之后。

地方可以说大民族主义只是残余了。但在民族平等还未基本实现，民族隔阂还未基本消除的地方则大民族主义还是严重地存在，不能说只是残余。再则目前时期主要的危险思想是大汉族主义，不要笼统提大民族主义。——中央

关于向陈云^[1]建议 用毛巾蘸热水擦身的批语^[2]

(1953年3月19日)

—

陈云同志：

此件请阅。每天用毛巾蘸热水擦身，先热后冷，又冷又热，锻炼皮肤毛血管又收缩又扩张，每擦一次，可经半小时，多至一小时，擦完全身发热。每天一次至两次，擦一二年可收大效，似可试试。

毛泽东

三月十九日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因病在休养。

[2] 本篇一是写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部长贺诚、副部长傅连暲1953年3月18日关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林彪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上的批语。报告中说：林彪“现在能同医生合作，并提出希望医生为他解决出汗及容易感冒的问题。苏联内科专家建议每天用水和酒擦身，锻炼皮肤抵抗力，他已同意，过几天即可试行”。本篇二是对报告中“苏联内科专家建议每天用水和酒擦身，锻炼皮肤抵抗力”一句的批语。

林彪同志长期不听医生的话，现在听了，情况有好转。

—

用酒似不甚好。

中央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 “五多”问题的指示

(1953年3月19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地委和县委；中央各部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一)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西北局检查组关于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报告，写得很好。这个报告集中地反映了我们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一些严重地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的利益的问题，即所谓“五多”问题。“五多”，就是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这些问题，很久就存在了，中央曾对其中有些问题有过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予以重视和解决，但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其原因，是没有将整个问题系统地提出来，尤其重要的是没有在中央、大区、省(市)、专区和县这五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展开反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因为区、乡的“五多”，基本上不是从区、乡产生的，而是从上面产生的，是因为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所引起的，有些则是过去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未加改变，遗留至今的。因此，必须在一九五三年内，在执行中央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着重地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

和分散主义，并将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加以改变，方能解决这个问题。今后各级领导机关在规定任务的问题上，在召集会议和调人集训的问题上，在发出公文表册和向下级要报告的问题上，在规定区、乡组织形式的问题上以及在使用乡村积极分子的问题上，都要由县以上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按照实际可行的情况，加以适当的规定，有些则要由中央作出统一的规定。过去由各级党、政、民组织的许多工作部门，各自独立地向下级分派任务，随便召集下级人员和农村积极分子开会或训练，滥发公文表册和向下级或农村随便要报告等项不良制度和不良办法，必须坚决废止，而代之以有领导的、统一的和适合情况的制度和办法。至于在农村中每个乡存在着几十种委员会以及积极分子兼职太多，均属妨碍生产，脱离群众，也应坚决地但是有步骤地加以改变。

(二) 中央一级党、政、民组织有关各部门，中央分别责成中央组织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财经、文教、政法三个委员会的主管同志负责，对于过去引起“五多”问题的各项迅速加以清理，并规定适当的制度和办法，向中央作报告。^[1]

(三) 各大区和省市，由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各该级行政

[1] 1953年3月20日，胡乔木在看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指示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并对中央应负责任一项提了几点建议。其中谈到：“任务多的问题，除各部委的责任外，还与中央书记处批发电报的状况有关，因为也有一些下面认为过重的任务是中央批准过的（至少电报是用中央名义发的），如批发的人较为集中，各部发的电报又有严格限制，并保证凡经中央批发的电报决不致先后不符彼此不符，这方面的情形也会好些。”毛泽东阅后在旁边写了以下批语：“此点请各同志注意，用中央名义批发的电报不要太多了，非十分必要者不要批发。”

机关主管同志负责，对于“五多”问题加以清理，规定自己的解决办法，并报告中央。为达此项目的，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仿照西北局的办法，派出一个专为了解“五多”问题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一二个区、乡（在城市是检查一二个区、街）的情况，以为解决问题的参考材料。

（四）专区级和县级的“五多”问题，由省委负责指导解决之。

（五）西北局检查组报告中关于解决“五多”问题的各项办法方面的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各地可以试行。

（六）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目前我国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使用旧式工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这和苏联使用机器的集体化的农业，大不相同。因此，我国在目前过渡时期，在农业方面，除国营农场外，还不可能施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生产，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并使之和工业相协调而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之中。超过这种限度的所谓农业“计划”，所谓农村中的“任务”是必然行不通的，而且必然要引起农民的反对，使我党脱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所谓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其中有很大的成分就是这种过多地干涉农民的表现（另一部分成分是因为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的需要而产生和遗留下来的），已经引起农民的不满，必须加以改变。即就广泛发展中的农业互助组和现在还不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说，也只是几家在一起或几十家在一起的小型的组织，而且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大多数尚不固定，又是使用旧式农具的。因此，对于这些互助组和

合作社，按照中央已有的决定给以积极的提倡和适当的指导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决不应当将它们混同于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决不应当施行过多的干涉。我党现在在农村中的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许多同志将分散的经济混同于集体的经济，就是干涉过多。所谓“五多”问题，也就是部分地反映了这种错误思想。

（七）本指示和附在下面的西北局检查组的报告，请登党刊。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

关于减少军队专职体育运动员 问题的批语^[1]

(1953年3月21日)

肖向荣同志：

各项均同意。惟运动员3000人至是〈是否〉可以减少的问题，请由肖克、肖华^[2]二同志会同政府有关此事主管人员，商量一次，加以研究，作出统筹计划，送周总理、彭副主席和我核阅。

毛泽东

三月廿一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肖向荣1953年3月13日关于军委第十六次例会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谈到了军以下各部队以参谋长为第一代理人的问题，军训部的干部配备问题，军事体育问题，以及军队中的抚恤工作改由后勤部门主管的问题。关于军事体育问题，报告说，肖克提出军事体育属军事训练部门，其内容应与军事训练相结合。但目前情况，主管军事体育的军训部本身无此种力量，而在政治部系统内又有3000名专职球员。会议决定由总政治部和军训部研究，对此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请主席考虑部队专职体育运动员是否要3000人，因地方亦有3000专职球类队员，合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2] 肖克，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训部部长。肖华，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

对《上海市税务机关征税中违反政策 现象严重》一文^[1]的批语

(1953年3月21日)

薄一波^[2]同志：

上海税务局应加整顿，对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应作适当处置，争取主动，免被资本家告发，陷于被动。

毛泽东

三月廿一日

[1] 这篇文章载于《人民日报》1953年3月18日编印的《党报通讯》第四期。文中说，上海市税务局自去年开展劳动竞赛以来，不断发生为“完成任务”、为“争取红旗”而预借货物税、营业税等严重违反政策的现象。商人们反映：“你们搞劳动竞赛是为了光荣，我们却要早付钱。”更严重的是有些税务局竟用侵犯人权的非法手段去强征税款。这种行为已引起商人极大不满，有的商人在市场上公开谩骂政府。

[2]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关于处理日本渔船侵入 我渔区捕鱼问题的批语^[1]

(1953年3月21日)

三艘渔船，可一起放还，只没收其渔〈鱼〉类。俟将来东京日本水产公司渔船再来侵渔时，再决定没收其渔船不迟。

毛泽东

三月廿一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3年3月13日关于侵入我渔区的3艘日本渔船的处理意见给周恩来的报告上。

同意所提战俘交换方针^[1]

(1953年3月22日)

恩来同志：

三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两电均收到。我们同意所提方针。这实际上即是去年九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2]同志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即将已达成协议的俘虏按比例交换，而将未达成协议的俘虏交给如印度一类的中立国管理待后解决。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唯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1] 这是毛泽东给正在苏联访问的周恩来的电报。

[2] 谢明诺夫，即斯大林。

关于准备同意讨论 交换重伤病俘问题的电报

(1953年3月23日)

丁国钰^[1]同志，并告金、彭^[2]：

(一) 三月二十一日十二时电悉。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3]上台后在五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4]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湾〈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对于对方可能拒绝接受我方文件甚至拒绝召开联络官会议的情况，你们应就事论事，在会内外据理力争，予以痛斥，但不要逼对方正式表示是否要最后破裂，对方亦不会作此种表示。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

[1] 丁国钰，当时参与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的领导工作。

[2] 金，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3] 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4] 杜鲁门，美国前总统。

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

（二）关于克拉克^[1]二月二十二日建议先行交换可以行走的重伤病俘虏一事，我方准备同意讨论此事，复文尚须数日才能拟好，暂时不要向外边透露。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三日

[1] 克拉克，当时任侵朝的“联合国军”总司令。

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 决议》的批语和修改

(1953年3月24日)

—

子恢^[1]同志：

指示^[2]和社论^[3]都看了，只改了几个字。互助合作社决议，改了三处^[4]，请你看过后，派人走送高岗、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彭德怀、邓小平^[5]等同志一阅（一天轮完），如果你及他们都同

[1]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2] 指中共中央1953年3月16日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稿。这个指示于1953年3月2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3] 指1953年3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

[4] 即本篇三、四、五，文内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改写和加写的文字。

[5]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副总理。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意，请叫廖鲁言^[1]同志将修改处抄正，再送报社发表。互助合作决议修改处，陈伯达^[2]同志已看过。

毛泽东
三月廿四日

社论，陈伯达同志有些意见，请与他再加斟酌。

二

这个决议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以草案形式发给各级党委试行，至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通过成为正式决议，并作了部分的修改。^[3]

三

中央估计了它们的两方面的性质，即私有的性质和合作的性质。初级互助组的组员，他们的生产资料是完全私有的，但也带了共同劳动的性质，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常年互助组则使这种萌芽进一步生长起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其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

[1] 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政务院副秘书长。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3] 这是毛泽东为正式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写的说明。

础上，农民有土地私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农民得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的收获量，并得按入股的工具及牲畜取得合理的代价这些条件来说，它保存着私有的性质。就其在农民以土地入股后得以统一使用土地，合理使用工具，共同劳动，实行计工取酬，按劳分红，并有某些公共的财产这些条件来说，它就比常年互助组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的因素。

四

在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工作而为它服务的。任何妨碍农业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避免。

五

(十三) 在解决了有关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问题之后，党中央认为必须重复地唤起各级党委和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注意，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必须承认他们的单干是合法的（为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所规定），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农业贷款必须合理地贷给互助合作组织和单干农民两方面，不应当只给互助合作组织方面贷款，而不给或少给单干农民方面贷款。在一个农村内，哪怕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了互助组或合作社，单干农民只有极少数，也应采取尊重和团结这少数人的态度。

对湖北省委关于贯彻 手工业代表会议精神的指示的批语

(1953年3月24日、4月4日)

—

子恢^⑩同志：

湖北此件^⑪很好。第七页上所说十项协议^⑫你处如有，请给我一阅。请你替中央起草一个电报^⑬，将湖北文件转发各地，要各省也召开手工业代表会议，如何？

毛泽东

三月廿四日

—

邓子恢同志：

湖北手工业协议，似可在人民日报上转载，请予酌处。

毛泽东

四月四日

[1]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 指中共湖北省委1953年3月2日关于贯彻全省手工业代表会议精神给所属的指示。指示说，湖北自解放以来手工业有很大发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把小生产者当作资本家，把劳动者内部雇佣、师徒关系当作劳资关系，因而造成关系紧张，影响生产。加之盲目强迫组织联营和合作社，在处理公私关系上某些措施不当，致使部分手工业者不敢大胆雇人，增加资本，扩大生产。这些都使手工业品供不应求的情况更加严重。为解决这些问题，决定：（一）对各个城镇的手工业情况进行分类排队，确定具体方针，哪些可以适当发展，哪些可以维持现状，哪些需要转业。（二）划分手工业阶级界限，宜宽不宜严。对雇有辅助工及学徒，有部分剥削，但其所得主要靠自己劳动的，应算作小生产者。有的虽雇有数个工人，业主参加主要劳动，房屋工具都是租赁的，剥削比重并不大，亦不能算为资本家。处理劳资、雇佣、师徒关系的总的方针是以搞好生产和团结为主。（三）关于工人和学徒的工资、工时和福利问题，应按代表会议通过的十条协议执行。手工业不能一般采用大工厂的工资、工时及劳保制度，各行业的旧习旧例，凡基本符合生产要求和劳资两利的，都可原则保留。（四）当前对手工业应提倡自产自销，提高质量，打开销路，加工订货只作为对销路有困难的行业的辅助办法。（五）宣传手工业的前途，解除某些人以为国家工业化一下就可以消灭手工业的想法。（六）以市或专区或县为单位，开好城镇和有关工作单位的干部会议，学习手工业代表会议文件，统一思想，研究办法，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贯彻。各城镇党委要把此项工作当作今年上半年中心任务之一。

[3] 指1953年2月召开的湖北省手工业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师徒、雇佣、劳资之间几项问题的协议，于1953年4月23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十项协议是：

第一项：学徒主要任务是学好技术，因而必须端正劳动态度，遵守劳动纪律，听从师傅在生产上的分配与指导。除了生产之外，也应做和生产有关

的杂活，帮助师傅增加生产。但师傅不得打骂和虐待学徒及强迫学徒做与生产毫无关系的事情，也不能干涉学徒的政治文娱活动，并须打破保守思想，传授学徒技术，提倡教得好，教得快，教得全。提倡尊师爱徒，提倡师傅以教好技术为光荣，学徒以学好技术为光荣。

第二项：新收学徒，老板可以自由收请不受限制，但在确定收学徒时须通知工会，并在当地劳动部门备案。新收学徒之待遇（除伙食外），一般的第一年内每月给予现行工薪分十至十五分的津贴，有些行业情况不同者，或高或低，双方协商解决，以后在学习期间（第二年、第三年）按其技术及生产进度逐渐增加，其他福利依照旧有习惯。

第三项：现有学徒今后主要是学好技术，师傅教好技术，师徒双方负责订立合同，要求在学习期满时，能够掌握一定的技术，如因其他原因，虽到出师年限，学徒尚无技术者，可以继续帮师，学习技术，工资双方协议。

第四项：学徒因公致病之医药费用，经医生检查证明，小病、轻病及短期病症由师傅负担，大病、重病及长期病症，如师傅全部负担有困难时，可由工人申请，从工会会员困难补助金中酌情补助一部分。

第五项：学徒三年出师之旧例可以保持，但应尽可能提前教好技术。出师后如因生产发展店内用人，双方自愿可以留下工作，工资另行协商。如店内不用人，师傅应本团结互助精神，根据旧有习惯，帮助学徒就业。

第六项：劳动者内部的雇佣关系，应本有利生产，团结互助，协商解决之精神，处理一切问题。医药费按各行业之合同，如无合同即按习惯解决。其他问题根据工会法处理，如有实际困难，双方协商解决。

第七项：劳资关系中如有纠纷，应本发展生产、劳资两利原则协商解决，必要时可经过劳动部门调解、仲裁或经法院判决。

第八项：雇请临时工人期满后可以辞雇，不作解雇处理。

第九项：工作时间，在半机器工厂及手工工场中，每日工作时间，一般不超过十小时；零散的厂店、作坊，每日工作时间一般不超过十二小时。

第十项：休息日连同新旧假期在内，一年暂定四十五天至七十天，各地各业可结合具体情况协商规定（固定假日，春节三天，元旦一天，国庆节二天，五一节一天，工资照发，其他根据旧习）。另外，基层工会干部之会议活动，每月不得超过两个生产日，一般工人活动不能占用生产时间。

以上十项协议须经政府审核、批准、备案后实行。

[4]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邓子恢替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手工业问题的电报稿，毛泽东先后作了两次修改，并拟了“中共中央关于应当重视手工业的指示”的标题。1953年3月31日，毛泽东第一次审阅这个电报稿时，将原稿“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是仅次于农民多数的一种经济成份，是今天不可缺少的一种经济形式”一句，改写为“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不可缺少的一种经济形式”；在原稿“在农业使用手工业工具时期尚未结束以前”一句后，加括号写了“这种结束要有几十年时间”；在原稿“由于农民目前的生产资料（如农具、肥料等）与生活资料（如布、手巾、鞋袜、烟等）百分之六十、七十”之后，加写了“有的竟至百分之八十左右是依靠城乡手工业品供应”，接着又加括号写了“即是说目前农村依靠近代工业供应的物资，只占农村需要量的百分之四十、三十、或二十左右”。4月2日，毛泽东再次审阅了这个电报稿，在原稿第三项“对于手工业中存在着劳资、雇佣和师徒三种不同的关系划分不清，处理不当，对于组织联营和合作社，采取强迫命令等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手工业者的生产情绪，不敢大胆雇请工人、学徒，增加资本，扩大生产，这些均应加以注意，有步骤地分别加以解决”之后，加写了“但在另一方面，目前仍有一些手工业资本家和手工业者对于工人和学徒存在着待遇恶劣的情形，亦应当予以妥善的处理”。

中央关于如何在县区乡进行 新三反的指示

(1953年3月25日)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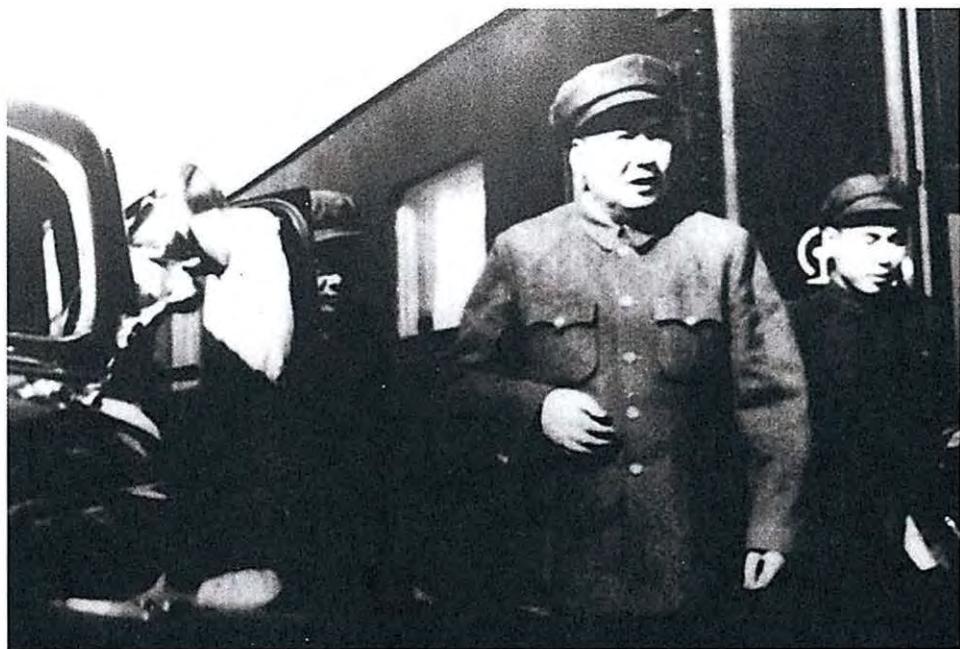
此件^[1]极好，可以发到县委阅看（并登党刊），并可普遍仿照施行，有利无弊。胶州专区所辖各县中已有五个县正确地解决了新三反的问题。其办法是由县委召集县区乡三级干部开会，到会人数多

[1] 指中共胶州地委1953年3月14日关于通过县、区、乡干部大会布置和检查工作进行新三反的情况给山东分局的报告。报告说，我区诸城、五莲、藏马、胶南、胶河五县，在2月下旬至3月上旬，均召开了一次县区乡干部大会，结合总结冬季工作，布置春季工作，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整风方法，贯彻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具体做法是：1. 各县县委通过冬季工作总结，联系具体事实深刻地检讨了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检讨了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而造成的一部分区乡干部的命令主义，批判了个别干部违法乱纪的行为，并从党的政策、原则、群众利益出发分析其危害性和危险性。2. 县委诚恳的自我检讨和虚心听取下面的批评，启发教育了到会干部，区乡干部也很自然地进行了检查和检讨。许多干部除检讨自己的强迫命令外，大胆批评揭发了区乡干部中的强迫命令和少数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3. 对干部中作风民主、走群众路线的典型范例，适时进行介绍，领导加以表扬，以教育干部，树立榜样。4. 从实际出发，布置冬季各项任务，在贯彻中注意交代任务，交代政策，交代工作方法，交代作风，并具体帮助干部研究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解决工作中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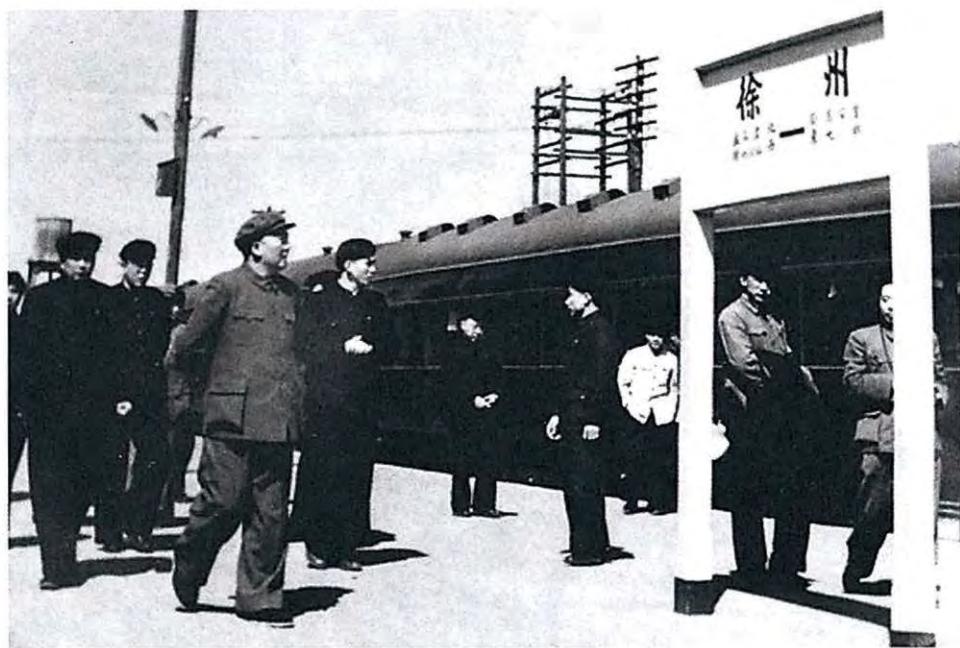
者一千四百人，少者七百多人。他们不是专为新三反而开会的，而是为了检查过去工作，布置今后工作而开会，就在这个会中展开了新三反斗争，由县委先作深刻的自我检讨，引导区乡干部向县区提出批评，并广泛地展开了自我批评。会议不但批评了坏人坏事，又表扬了好人好事，使人们知道去掉命令主义之后如何去做工作。开会时间十二天至十五天，是用整风方式进行的。这样做，受损伤的人很少，而团结教育觉悟起来的人则很多，各地都可以这样做。由省委指导地委，由地委指导县委好好地去做，做得愈有准备有秩序些就愈好。至于极少数最典型的坏人坏事，则须经过详细调查研究，作专案处理，并予以揭露，教育党和人民。

中央

一九五三年三月廿五日



1953年3月25日，毛泽东在徐州火车站。



1953年3月25日，毛泽东在徐州火车站的站台上。

祝贺陶里亚蒂六十寿辰的电报

(1953年3月25日)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亲爱的陶里亚蒂同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我个人，在你六十寿辰之际，谨向你和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最热烈的祝贺。

从你青年时代起，你就把你的全部生命贡献给意大利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依靠你的英勇的奋斗和卓越的领导，意大利共产党已经成为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光荣旗帜，成为意大利强大的政治力量，成为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堡垒之一。你对于意大利革命事业、国际工人运动和世界和平运动的光辉的贡献，使你不仅受到意大利人民、而且受到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敬爱。

为了意大利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压迫下获得解放的事业的胜利，为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事业和进步事业的胜利，敬祝你健康和长寿！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关于通报上海市税务机关征税中 严重违反政策的批语

(1953年3月27日)

薄一波^[1]同志：

此件^[2]有教育意义，应由中财部（加一报头，说几句话）发给各大区及省市财委及其财政管理局。

毛泽东

三月廿七日

同时北京印发如前示（尚昆知道）。

[1]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2] 指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1953年3月25日关于上海市税务机关征税中严重违反政策的情况给华东财委并财政管理局、上海市财委并报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上海市税务局在市委和财委的领导与督促下，努力完成了去年税收任务，工作是有成绩的。但由于财政部门领导上有重任务轻政策的思想，对税局强调任务多，交代政策少，因而不仅在一般税务干部中，即在各级税务局领导干部中，都有一部分人把任务和政策对立起来，存在着要任务可以不要政策的思想。最近，《党报通讯》第四期就反映上海市税务局某些分局有严重违反政策的现象。有的向私商强迫预借营业税、货物税；有的连不应征税的货物也征了税；有的为了催交税款，甚至发生押人、吊人、轮流审讯等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而这些行为市税务局领导干部发现后未予纠正。

给黄炎培^[1]的信

(1953年3月27日)

任之先生：

三月廿六日的信及附件收到，甚谢。此种材料有用，已转付有关同志阅看。五反以来延未解决的问题，今年大致可以获得解决，但尚须大家努力。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三月廿七日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给林志钧^[1]的信

(1953年3月27日)

志钧先生：

惠书及悼斯大林大元帅长诗收到，充满对人民的感情，极为钦佩。此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三月廿七日

[1] 林志钧，当时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

中央转发山东分局关于 新三反的报告^[1]的批语

(1953年3月29日)

[1] 指中共中央山东分局1953年3月26日关于新三反问题给各地委、市委并报华东局、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山东省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已在紧密地结合当前工作逐步深入开展。但各地进展情况不平衡，有些地区没有抓住典型的违法乱纪案件，大张旗鼓地加以处理，因此斗争还停留在泛泛检讨阶段，效果不大。为使这一斗争全面地健康地深入展开，提出如下意见：（一）各地必须结合中心工作处理违法乱纪的典型事例，这是当前开展新三反斗争能否深入的决定环节。同时，各地应着手调查好人好事，在斗争达到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予以表扬。对典型的好人好事和坏人坏事要采取登报、通报等办法公之于众，以发扬正气，压倒邪气。（二）通过召开党代会、人代会及干部会议，检查总结和布置工作，领导上进行自我检查，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批判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揭发和讨论违法乱纪案件，并表扬好人好事。这样全面体现政策的会议，效果很好。各地应总结推广这一经验。（三）今年参军运动及春耕生产工作均紧密地贯彻了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斗争的精神，既提高了群众觉悟，又推动了当前的各项工作，对这些经验要加以总结，写出专题报告。报告提出，当前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除应切实掌握以上三个环节外，并要严格防止以下两种偏向：第一，要防止界限不清，打击面过宽的偏向；第二，要防止以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以命令主义反命令主义、以违法乱纪反违法乱纪的错误。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

山东分局此件指出各点均很好，可供各地参考。

中央
三月廿九日

关于妥为处理四川万县事件 和江津事件的批语

(1953年3月30日)

邓小平^[1]同志：

此件^[2]值得注意。你前次所谈万县事件和江津事件，均是当地犯了错误。万县材料见早几天的内部参考，是三反五反中地书曾戎

[1] 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2] 指中华全国合作联合总社西南区办事处1953年3月20日关于西南区合作社调整商业后的严重情况给全国合作总社的报告。报告中说，自中央发出调整商业的指示后，西南全区一般的停止了非社员交易。四川省截至3月初的不完全统计，共撤销屠宰、理发店、食堂、缝衣店等2207个，加工生产单位1334个，两项比调整前共减少56.77%。各地合作社除个别地区外，营业额普遍下降。由于这样收缩，造成了合作社业务上的混乱和社员的不满。四川省江津县五区合作社猪肉没有卖完也不敢卖，干部分来吃了。更严重的是有些合作社连供应农民的生产资料也减少了。不少干部无原则迁就私商，致使私商气焰嚣张，乘机扰乱市场。四川省江津县县长竟命令合作社与国营公司干部向私商作公开检讨，强制合作社限期收拾加工部门，要工商联统一领导合作社与国营公司，不少私商乘机杀价收购、高价出售。造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各地在进行调整时，对中央调整商业的精神未能认真贯彻，对各地公私比重缺乏详细具体的调查了解，缺乏通盘的计划和步骤，有些领导干部单纯地认为调整商业是消极的收缩，这就更助长了下面干部的思想混乱。

犯了严重的乱打乱捕及迫死许多人的错误所引起的，应当彻查平反。合作社问题则不止江津，而是全四川各地，犯了大规模撤退的错误。以上请你以电话与西南局一商妥为处理。

毛泽东

三月卅日

关于减少中央及各部委 所发全国性电报的批语^[1]

(1953年3月)

中央在79天中发文统计。饶、安、习、周、朱、彭、高、邓、
邓^[2]阅，退毛。

还是太多，要减少。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53年3月22日关于中央及中央直属各部委自1953年1月1日至3月20日所发出的全国性电报的统计报告上。报告说，中央署名发各地的指示、通报电有128份，中央直属各部、委署名发各地的指示、通报电有98份，以上两项共计226份，以79天计，每日平均不及3件。

[2] 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指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习，指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高，指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邓，指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中央关于同意推迟执行 群众性戒烟运动的指示的电报^[1]

(1953年4月2日)

中南局，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委，中央人民政府内务、公安、卫生部党组及其他各委部党组：

湖南省委三月十四日电及中南局三月二十一日来电均悉。中央同意湖南省委及中南局的请求，将群众性的戒烟运动推迟执行。并认为凡对生产有妨碍的工作，不论是中央哪一个部门部署的，只要当地党委认为有必要推迟进行，均可提出请求，推迟进行。此外，根据主观主义设想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任何上级的命令指示，必须加以废止或修改者，地方党政有权提出意见。遇到这种情况，地方党政从实际出发提出意见，是正确的；不提意见，将不正确的命令指示，违反群众意见，硬着头皮往下推，则是不正确的。当然，除了遇着紧急情况，地方党政有权得先行处理，然后报请上级追认外，一般事件，最后如何处理，均应报告中央或

[1] 这是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同意推迟执行群众性戒烟运动指示的电报。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此电下发表时，毛泽东拟的标题为“中共中央关于推迟群众戒烟时间和给地方党政以权力推迟或停止上级所发那些不合实际情况的命令指示问题的指示”。

中央关于同意推迟执行群众性戒烟运动的指示的电报

其他原决定的上级机关批准，然后执行。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日

对中南行政委员会关于整顿小学的指示^[1]的批语

(1953年4月2日)

[1] 指中南行政委员会1953年3月31日关于整顿小学的若干问题给各省市人民政府并转各专署县府并报政务院的指示。指示说，整顿巩固、保证质量，是中央对目前整个文教工作的总的方针。中南区的小学教育，过去3年来有很大发展，这是各级教育干部积极努力的成绩，必须加以肯定。但由于领导上缺乏计划性，工作带有很大盲目性，目前情况相当混乱，质量多数低劣。因此，必须加以认真的整顿。(一) 对在校学生数的整顿，一要核实学生数目，二要处理流动生、超龄生和不及龄生。(二) 对现有教职员的整顿。原非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从积极分子、进步青年中调到学校而又不适合于这一工作者，应让其或劝其返归原来岗位去生产或工作。年老或体弱多病已不宜再任教者，应劝其退休。文化水平太低，不能胜任教者，应劝其转业，其中一部分年轻者可吸收到初级师范学校去学习。现行反革命分子不宜留校者，应由公安部门鉴别，提出处理意见，再妥商处理办法，报经专署负责机关批准施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不宜留校者，由县(市)政府查实处理。(三) 对小学编制和工资标准，应根据中央规定的控制数字，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认真研究。本着精简、公平的精神，定出合情合理的指标，力求切合实际。(四) 尽可能从本地机动田中给每校调拨半亩至一亩地，作为校田，由师生课余劳作，以保持勤劳的优良传统。(五) 本着民办公助精神，对入学儿童可酌收学费。收费多少根据年级高低和其家庭经济情况来定。确系贫苦者，应予减免。所收学费，不入国库，一部交由县统一掌握使用，一部留校使用。(六) 从7%的地方附加中，固定4%为小学经费，专充支付教师工资之用。校舍修缮，尽可能由当地人民设法，或出工出料，或自愿捐款，如必须由政府解决经费者，可增加地方附加至10%，从中拨给，而不得从4%中抽拔。

周总理、习仲勋^[1]同志：

此件你们觉得如何，我看很好，请习交教育部加以研究，有不妥当处酌加修改，由政务院转发各大区省市仿照施行。

毛泽东

四月二日

[1] 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关于检查军委卫生部领导工作的批语

(1953年4月3日、7日)

—

周恩来、习仲勋、胡乔木、彭德怀、黄克诚、贺诚^[1]各同志：

白学光同志这个报告^[2]，深刻地揭露了军委卫生部的领导方面

[1] 黄克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贺诚，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

[2] 指军委卫生部政治部主任白学光1953年3月27日关于军委卫生部领导工作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给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副总参谋长黄克诚、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的报告。报告指出，过去部队卫生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是：第一，摊子摆的太多，部领导忙于直属单位的行政事务，对全军的卫生业务以及直属单位的业务工作缺乏指导，甚至根本没有指导。第二，领导不集中。贺诚部长经常在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工作。几个部长很少在一块研究工作，虽然有分工，但形成分家的现象，这样有些问题推来推去就误了事。第三，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一是医疗事故多；二是严重浪费；三是成分复杂，各单位领导水平不高；四是许多干部（不论政治、行政、业务）不安心在卫生部门工作，卫生部缺乏政治思想领导，不能很好发挥大家的积极性。针对以上问题，白学光建议：第一，紧缩组织。第二，贺诚部长回到军委卫生部坐镇。第三，认真地开展反官僚主义，加强政治思想领导。第四，希望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党委加强对卫生部门政治工作的领导，充实一批必要的骨干。

所犯的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根据白学光的报告看来，军委卫生部对全军卫生工作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领导，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刻着手解决。提议：（一）请彭、黄主持，在军委例会上讨论一次，邀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及白学光同志到会，决定解决方案，付诸施行。（二）政府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的部长副部长不要兼任，另物色适宜的同志（不一定要学过医的同志）充任军委卫生部部长副部长。以上请彭、黄酌办。

因为白学光的揭露，使我想到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是否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有多大差别。我怀疑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可能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同样是一踏糊涂，既看不见政治领导，也看不见认真的业务和技术领导，只是没有白学光这样一个人作出这样有条理有根据的揭露，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请习、乔参考白学光的报告，严肃地检查一次政府卫生部的工作，看和军委卫生部好得多少？并对存在的问题决定解决方案，付诸施行。

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除军委卫生部外，可能还有别的部门，请你们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撕破面皮，将这些彻底整垮，改换面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四月三日

二

尚昆^[1]同志：

此件请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发至各总部下面的一切部，卫生部还要发部长各副部长及处长各一份），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毛泽东

四月三日

三

尚昆同志：

第一页上“讨论施行”，是“付诸施行”之误，印错了，请发一更正的通知。

毛泽东

四月七日

嗣后，一定要校对清楚，不要再错。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接受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3年4月3日)

大使同志：

我非常高兴地接受您所呈递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国书，并衷心地感谢您的祝贺。

中国人民与伟大的苏联人民在亲密的互助合作中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新中国在经济、文化各方面所获得的一切成就，以及目前正在开始的大规模国家建设计划的实施，都与苏联人民、苏联政府的真诚的、兄弟般的援助分不开。

我深信：中苏两国人民伟大的友谊与团结定将在两国人民共同的努力下，继续无限地发展与巩固起来。我们的友谊所产生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必将对于远东及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事业起着无比巨大的作用。

大使同志，我极为热烈地欢迎您出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巩固中苏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谨祝您在工作上获得完全的成功。

朝鲜停战后铁道兵须以大部修路 一部进行技术训练^[1]

(1953年4月5日)

朝战停后，十一个师，须以大部修路，一部（骨干）可属参谋部管，进行技术训练，以备战时与主力合并，以应作战需要。恩来意见^[2]请注意。

毛泽东

四月五日

[1] 这是毛泽东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1953年3月30日关于铁道兵部队建制问题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报告上写的批语。彭的报告说，关于铁道兵部队直属军委归参谋部管，不属铁道部建制的建议，待朝鲜战争结束可予同意。平时人数少，保存骨干进行技术训练，以备战时按需要扩大。

[2] 1953年4月3日周恩来在彭德怀的报告上批的意见是：“现在铁道兵团共有十一个师，建制属铁道部，但供给托后勤代管。即使朝战停止，铁道部队在国内修路仍有极大作用，特别是内蒙、西北、东北修路更需要他们，因此，此事似应从长计议。”

给黄炎培、陈叔通^[1]的信

(1953年4月5日)

任之、叔通先生：

许涤新的报告^[2]颇有些材料，可以一阅，请予掷还。

顺致敬意！

毛泽东

四月五日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政务院副总理。陈叔通，当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 指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许涤新1953年4月2日关于一、二月份工商情况的报告。

对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的 批语和修改^[1]

(1953年4月)

—

刘、周、陈、乔木、罗迈^[2]阅。

请考虑提交政协常委会（可扩大些，多邀几个人）通过，用政协全国委员会名义发表^[3]。

毛泽东
四月七日

[1] 本篇三是毛泽东在审阅庆祝五一节口号时加写和改写的几条口号。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名字。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3] 庆祝195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1953年4月20日经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四十八次会议通过后，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在1953年4月21日《人民日报》上。

二

邓小平^[1]同志：

- (一) 略有文句上的增减。
- (二) 政协会谈此件时，应邀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及各民主党派的宣传部长先谈一下，或在一起谈也好。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上午九时

三

十九、向革命烈士家属和革命军人家属致敬！

.....

三十三、男女盐民及盐业工人们，为提高盐的质量而努力！

三十四、男女船民们，为水运畅通发展城乡物资交流而努力！

.....

三十六、国家贸易工作者和合作社工作者们，经常了解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完成国家收购和销售计划，贯彻经济核算制，降低商品流转费用，加速资金周转，努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更好地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消费者和社员们服务。

[1] 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

四

新华社吴冷西^[1]同志：

此件请于四月廿一日广播，四月廿一日见报。

毛泽东

四月廿日

[1]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

印发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的 两个文件的批语

(1953年4月9日)

程子华、张启龙两同志关于供销合作社目前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1]，邓子恢同志关于供销合作社问题的意见^[2]，此两件印发中央到会各同志及曾山、贾拓夫、姚依林^[3]、程子华、张启龙各同志阅看，准备下星期讨论此问题。

毛泽东
四月九日

[1] 指中华全国合作联合总社主任程子华、副主任张启龙1953年3月24日关于调整商业与实行新税制后各地合作社出现严重危机等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中说，由于不少地区对中央调整商业指示精神领会不全面不正确，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主义手段，不根据具体情况就撤销零售点，不合理地限制经营额和减少经营品种，加上新税制的实施，致使全国合作社经营额普遍下降，造成合作社的严重危机。各地合作社被迫紧缩机构，大批“精简”或准备大批“精简”干部，致使合作社在组织上和干部思想上发生极度混乱。现在，合作社干部普遍不安心。全国合作总社虽已极力阻止各地合作社进行这种“精简”，但情况仍很严重，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又不是合作

社单方面的问题。因此提出如下建议：一、请各级党委注意这一严重情况，并立即制止合作社正在进行的“精简”，对已“精简”的干部要进行妥善处理。二、准许合作社立即恢复在调整商业中不应撤销的零售点、业务机构和加工部门，并恢复合作社必须经营的商品数额。三、停止与制止国营商业部门在不正确地执行调整商业指示中所采取的某些削弱和损害合作社的错误措施。四、请迅速修正新税制中某些不利于合作社而利于私商的规定。五、合作社雇用的临时工要允许保留。

[2] 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邓子恢1953年3月31日关于供销合作社几个基本问题的意见给毛泽东并转中央财政部部长薄一波的报告。报告中说，我认为程子华、张启龙的报告应由中央转发各地办理，先停止合作社目前大批裁员、大量撤销零售网点的状态，以避免合作社日趋瓦解的趋势。关于供销合作社的几个基本问题，我有如下的见解和意见：一、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群众性的经济组织，它的基本任务是通过供销工作，组织几万万个体农民与国营工商业相结合，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从而改善工农联盟，为国家工业化准备好市场、原料与政治基础。二、合作社的业务方针，应该是一方面替社员大量推销多余农产品与土特产品，另一方面适时供应社员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方面应与国营贸易公司、出口公司及附近工矿企业建立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必须与中小城镇及当地手工业工厂、作坊相结合。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三、合作社的经营系统，依据我国具体情况，应当是：（1）以县社及基层社为主体，加强县区社独立经营能力，真正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基层社为社员服务，上级社为下级社服务的方针。（2）必须允许合作社自成一个经营系统，建立自己的批发站，并允许直接向各地国营工矿订货，当然更重要的是与各地手工业结合。四、应该采取平行批发站制，允许合作社各级批发站向就近国营工厂、公营工厂直接进货、订货，取消贸易公司对合作社的限制。这是目前改变合作社危机的救急之道。

[3] 曾山，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商业部部长。贾拓夫，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姚依林，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商业部副部长。



1953年4月，毛泽东参观中央美术学院画展。



1953年，毛泽东观赏中国古画。

《研读史籍》(中国画)



关于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 学习做领导工作的批语^[1]

(1953年4月10日)

此件发给各同志阅看。就是要这样和被领导的单位密切联系，抓紧检查，全盘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改正错误，表扬成绩，使工作任务能按计划完成，才算有了合乎情况发展的领导。目前，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无领导的现象太多了，必须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学得做领导工作的能力和方法。领导者无领导，这是官僚主义者，不是领导者。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党组1953年4月3日关于反官僚主义的检查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上。报告中说，当前最突出的官僚主义表现是：部、各地区局与勘探队上下脱节，情况不明，大事不摸底；工作指导上控制不紧，检查不严，严重缺乏思想性，以致好事得不到发扬，坏事得不到改正，存在放弃领导，甚至发生分散主义的现象。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准备采取派出调查组，分工负责与局、队联系，进一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并推动局、队揭发官僚主义等措施。

关于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章程 及宣言中删去“毛泽东思想” 字样的批语^[1]

(1953年4月10日)

彭真^[2]同志：

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

毛泽东
四月十日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1953年4月3日关于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成立会的问题给彭真并政法党组干事会的信上。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国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中央转发钱瑛关于广东发生 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 严重情况的报告的批语

(1953年4月11日)

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

兹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钱瑛同志关于在广东方面发生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并请你们根据此件加以检查，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将自己过去所发命令指示中犯有错误的部分，迅速加以纠正。因为报告中所指各项不能容忍的坏事，或类似的坏事，除了个别事件，例如盐民、渔民问题及种蔗问题，只是在广东及其他若干省区存在以外，其余各项是带普遍性的，几乎每省（市）都有，只是件数多少不同而已。这些事件，很多是发源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其次就是省人民政府和专署的有关部门。而发生了这些事我们还不知道，有些甚至部长也不知道。由此可见，问题的性质是很严重的。中央责成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钱瑛的报告要给各司局长同志看），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务必迅速加以检查，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纠正各项不能容忍的错误。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一日



1953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看古碑文。



1953年4月12日，毛泽东和李敏在中南海瀛台。



1953年4月12日，毛泽东和女儿李敏在中南海。



1953年4月15日，毛泽东和李讷在北京西郊赏梅。

对安子文^[1]关于清理登记 全国革命烈士的报告的批语

(1953年4月13日)

刘、周、朱、彭、邓、邓、饶^[2]阅。

此事^[3]因涉很广，今年工作太多，以推迟至一九五四年举行
为宜。

退安子文同志办。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1]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邓，指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3] 安子文1953年4月11日关于清理登记全国革命烈士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草拟了一个革命烈士清理登记办法（草案），并于3月31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对这一办法草案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中央革命烈士清理登记委员会的名单，请中央审批。

给程潜的信

(1953年4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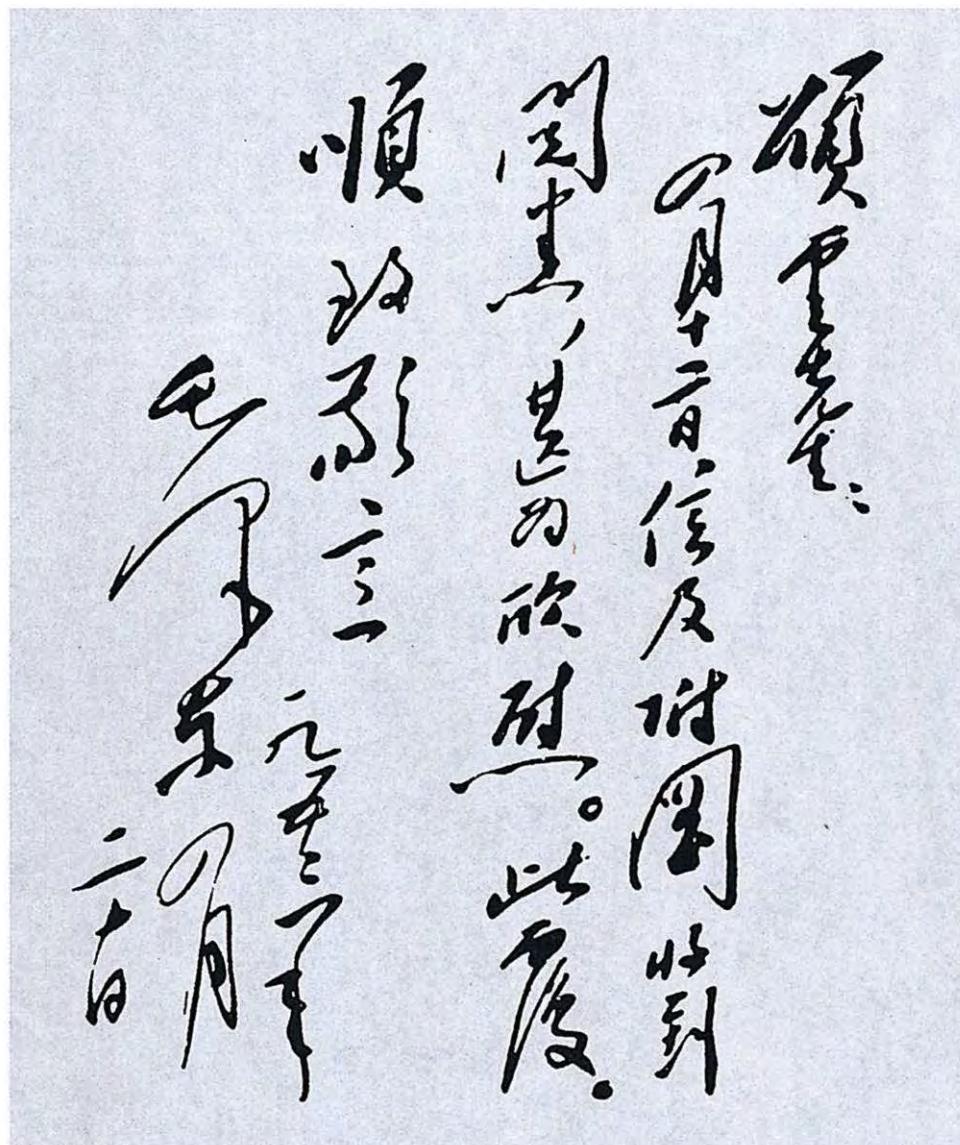
颂云先生：

四月十二日信及附图收到阅悉，甚为欣慰。此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日



毛泽东致程潜信的手稿。

对财政部关于全国农业税法会议 请示的批语和对中央指示稿的修改^[1]

(1953年4月16日、21日)

—

即送周总理、邓子恢同志：

此件^[2]应请中央农村工作部加以审查，如有不同意见，应召集
戒子和^[3]同志至中农部开会商定，然后替中央起草一个给财政部的
指示，于数日内交中央几个同志看过发出，因财政部的会议四月廿
日就要开了。

农业税中存在的问题很严重，据湖北报告，有十分之一的人口
春荒断粮。大概全国农业人口中有四千『千』万人左右到春季都要
闹荒，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年年如此。必须从今年征粮中开始认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党组关于召开第四次全国农
业税法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本篇二、三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1953年
4月21日对财政部党组的指示稿时修改的两段文字，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
毛泽东加写和改写文字。

[2] 指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党组1953年4月9日关于召开第四次全国农
业税法会议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

[3] 戒子和，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

真解决此问题。今年是否应比去年加征十六亿斤和发四十亿斤公债，也值得再考虑。

毛泽东
四月十六日

二

(一) 一九五二年公粮实收数为三百四十八亿斤，有些地方如河南、苏北等地由于查田定产偏高，农民负担显得过重。去冬今春，长江黄河之间受寒流侵袭，有些地方番薯和春季作物受损颇大。今年全国雨量如何，目前尚难断定。有些地方，发生旱灾是可能的。因此，今年国家概算中所列征粮计划能否完成，公债发行应否实施，均须从长考虑。但目前就宣布不增加农业税和不发公债，改变国家概算计划，则为过早，应当看几个月再行决定。你们可按各地实际情况，适当地部署夏征，保证农民不要负担过重。确实困难户，实行减免。

三

(六) 征粮中的社会减免问题，关系极大，全国大约有百分之十的农户要遭春荒夏荒，缺乏口粮，甚至断炊，必须认真减免农业税，望经此次农业税会议拟出具体可行办法，并望多注意对穷困的偏僻山区加以特殊照顾。对约百分之十的农户实行减税免税问题是整个农业税政策中的极端严重问题，过去几年都做得不好，今年一定要做好。

给李烛尘^[1]的信

(1953年4月21日)

烛尘先生：

四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来信收到，阅悉，甚谢。你做了许多调查工作，你的建议^[2]对于解决现存问题是会有帮助的。我已将你的信发给许多有关同志去看去了。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四月廿一日

[1] 李烛尘，当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2] 指李烛尘到一些工厂作了调查之后向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解决工商业方面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税负、资金等问题的建议。



中国妇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3年4月15日至4月23日在北京召开。图为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出席大会的代表。



1953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等接见中国妇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3年4月，毛泽东接见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

要做好举行夏季战役的攻击准备

(1953年4月23日)

彭：

此件^[1]似可批准，使他们好作攻击准备。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可则于五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请酌办。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

[1] 指1953年4月20日邓华关于在朝鲜战场举行夏季战役反击的几点意见给杨得志等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这次恢复谈判，停下的可能虽比过去要大，但拖的可能还是存在的。即使敌人迫于整个形势不能不停，但真正停下来还需要相当时间。且敌人狡猾，想采用军事压力来配合谈判中的讹诈，多得一点东西；也想争取一点时间，完成某些战略措施。根据这一估计，我们必须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做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的方针，加强各种准备，不能麻痹松懈。要继续完成东、西海防工事，能随时粉碎敌人的任何登陆和进攻。同时，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以积极行动来配合谈判，目前个别战术反击仍应进行。现东、西海防工事4月底大致可以完成，而举行夏季反击，打击的重点尽量放在美国及其外国仆从军头上。这次反击，口不宜张大，力求全歼，采取集小胜、多胜为大胜的方针。反击时间预定6月初开始到7月上旬结束，一切准备工作必须于5月底完成，而后视情况再定动作。

对西南局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的领导的规定^[1]的批语

(1953年4月26日)

[1] 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53年4月11日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及政府系统请示报告制度的规定给西南行政委员会各党组、西南局各部并报中央的报告。报告中说，我们认为在大区一级加强政府系统的请示报告制度，加强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对于更好地保证中央所规定的方针、政策、计划、任务的正确贯彻执行，以及避免各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的发生，是很重要的。为此，特作如下规定：（一）为了加强对政府各部工作的直接领导，决定撤销行政委员会党组干事会，并健全与加强各委、局、院、行的党组与党组小组的工作。财经、文教、政法、民族、监察各党组均直接归西南局领导。（二）政府各党组及党组小组严格执行如下的请示报告制度：各党组、党组小组每月向西南局作定期综合报告一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及专门性质的问题，应另向西南局作专题报告，报告内容应着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及有关政策的问题，并力求简短扼要。请示与报告要严格分开，不要混在一起，需要请示的问题须另行专题请示，并严格执行“每一请示只限一个专题”的规定。凡属重大问题及政策性的指示，须先经中央局审查批准，重要者西南局报请中央批示。（三）为了加强对政府工作的领导，除西南局加强统一领导之外，西南局各同志实行分工负责的制度，需要西南局进行讨论的问题，应经过分工的各同志提交西南局常委会议讨论，各有关业务部门须事先做认真的准备，并供给西南局各同志以必要的参考资料。

周总理：

此件似可转至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叫他们对各大区行政委员会及省市政府，仿照办理，以期统一地作一次改革。请考虑酌办。

毛泽东

四月廿六日

关于修改工会工作文件的批语^[1]

(1953年4月26日)

饶漱石^[2]同志：

我同意胡乔木^[3]同志所作的修改，请你和工会负责同志再加斟酌。乔木在这封信上所指的缺点^[4]，我也有此感觉。现在距开会尚有一段时间，是否可加以补充，亦请你们考虑酌定。我今天有些感冒，明天不一定到会。

毛泽东

四月廿六日

[1] 这个批语写在胡乔木关于工会工作的四个文件的修改问题给毛泽东的信上。

[2]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3]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4] 胡乔木在信中指出，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有一个重要的缺点，就是对目前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说得不多，只是一般的纲领性的说明，对工作中有哪些要推广的好的经验，有哪些需要批评的错误的倾向，有哪些须加以澄清的争论，或者说得过于简单抽象，或者简直没有说，因此减少了应有的力量。

关于同意推迟军衔评定工作的批语^[1]

(1953年4月26日)

彭^[2]:

推迟至年底好。

毛泽东

四月廿六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1953年4月22日关于请中央审批大军区以上军官的军衔问题给彭德怀的报告上。报告建议各大军区以上首长之军衔等级，能于5月5日前审批下来，以便着手进行正兵团级以下军衔等级的研究，彭德怀在这个报告上写了以下批语：“今年各项工作均挤在一起，颇为紧张，军衔评定工作推迟至年底不知如何？”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给李烛尘^[1]的信

(1953年4月26日)

烛尘先生：

四月二十一日来信收到。

工作虽多，可以安排一下，一段时间内只处理一个主要问题，这样也就会不觉得太忙了。此复。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四月廿六日

[1] 李烛尘，当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在中央关于派人下去检查工作的 几项规定稿中加写的话

(1953年4月28日)

在一般情况下（特殊者除外）下去检查的干部应该通过而不是超过被检查地区或单位的领导机关去进行检查。



1953年5月1日，毛泽东等在首都人民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主席台上。



1953年5月1日，毛泽东在首都人民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上。



1953年5月1日，毛泽东等在首都人民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主席台上检阅游行队伍。



1953年5月1日，毛泽东在首都人民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上。

对天津市委关于发动职工讨论 生产计划的经验的批语

(1953年5月)

天津市委关于发动工厂全体职工讨论国家计划的经验^[1]，值得普遍推行。

[1] 指中共天津市委1953年4月14日给华北局并转中央的报告中总结的天津市国营和地方国营工厂发动群众讨论1953年度生产计划的经验。主要有：一、针对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及薄弱环节，动员全体职工讨论计划。二、从制订组织技术措施计划（工人叫改进办法计划），推动增产节约和提高质量，并将它作为制订计划的根据。三、在修订计划中，进行革命任务及建设形势的宣传教育工作。有的局、厂还结合修订计划进行了反对虚假隐瞒、骄傲自满、官僚主义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保守落后思想和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四、发动大量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深入车间、小组，订计划时采用典型示范的办法。

给毛泽荣^[1]的信

(1953年5月2日)

泽荣贤弟：

四月九日给我的信及惠赠食品，均已收到，谢谢你。
因你眼睛有病，路上行动恐怕不方便罢，似乎不必来京看我。
你有困难，可以相告，替你设法解决。
此复。祝你身体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日

[1] 毛泽荣，毛泽东的堂弟。

澤榮賀軍

、四月八日寄我的信及惠贈食品，
均已收到，謝：你。

因你眼睛有病，路上行動恐怕
不方便，似乎不必來京見我。倘有
困難，可以相告，替你設法解決。
此覆。祝你身體健康！

毛澤東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日

毛泽东致毛泽榮信的手稿。



1953年，毛泽东等和毛泽荣合影。左起：江青、李敏、毛远新、毛泽荣、毛泽东、李讷。

关于解决任务与政策的矛盾的批语^[1]

(1953年5月3日)

根据此件^[2]，只要认真去做，任务与政策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就是说，只有彻底执行政策，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1953年5月3日转发华北区税务管理局关于1952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报告的摘要给所属并报中财委、总理、中央的通知上。

[2] 指华北区税务管理局1953年4月20日关于1952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的综合报告。报告中说，1952年所得税的汇算清交工作，我们按照中央指示的多赚多征，少赚少征，不赚不征的方针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强调注意干部作风，防止强迫命令现象。在做法上，采用查征户（指重点征税户）逐户查账；民评户（指采用民主评定方式确定征税等级的户）各划类型等级，扩大典型户，并进行广泛的反复协商；对自报及评议提出的亏损户，未经查清一律暂不征收。因此这次工作比过去都稳当细致，工商业者一致反映良好。在这次工作中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一）工作有布置，有检查，上下通气，认真贯彻政策。对政策不仅逐级认真传达，使之为大家掌握，并且组织领导干部参加工作队、检查组，深入现场指导实际工作。（二）抓住重点，加强查征，慎选典型，改进民评，因而税收增加，工作主动。（三）充分发扬民主，广泛进行协商。

关于搜集敌战俘营中 我伤病人员情况的电报

(1953年5月4日)

李克农^[1]同志，并金首相、彭司令员^[2]：

五月四日零时卅分来电和简报均悉。同意来电所提各点意见和发言稿。你们五月三日十六时四十分简报称，据归俘谈，济州岛敌第八战俘营中仍有大批我伤病人员。按第八战俘营是坚持遣返的战俘营。望立即就归俘此项报告进行详细调查，搜集证据和材料，以便在必要时反击敌人。

毛泽东

五月四日五时

[1]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书记。

[2] 金首相，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司令员，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关于大批减免西南灾区公粮 和农业税的批语^[1]

(1953年5月5日)

薄一波^[2]同志：

像报告内所说的那些地方，应当放手大批减，大批免，不应再有犹豫。

毛泽东

五月五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央政法党组转报的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副部长王一夫1953年4月25日关于西南灾情和公粮征收中的一些问题给谢觉哉并报政法党组及彭真的报告上。报告中说，造成西南灾荒的主要原因，除了贫瘠山区生产落后，收入微薄外，还有征收农业税超过群众负担能力的问题。一般干部存有超额完成任务的思想，本应减免的不减免，也有评产时有意提高产量，造成超征。目前西南山区的情况是：一方面政府所存大批陈粮与死角粮不能使用，另一方面山区许多灾民没有粮食需要救济，群众对此非常不满。报告提出，为解决这一问题：（一）对山区公粮应当少征，提高农业税起征点，发还超征公粮。（二）将仓储陈粮、死角粮无息贷给临近的灾区群众，解决灾民口粮困难；收购可以推销的土特产，将陈粮、死角粮作为收购资金；用死角粮就地以工代赈，进行农田水利交通等建设。

[2]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关于全国财政会议的议题和准备工作 给陈云^[1]等的信

(1953年5月6日)

陈云、一波、富春^[2]同志：

五月二十日开始的财政会议，应讨论些什么问题，请你们考虑一下，并在发开会通知中写进去，使各地有所准备。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杨立三^[3]应参加），均应有所讨论，除由你们对每项问题准备方案外，各大区财委最好能在本月中旬召开一次财政会议，收集意见带来（已开者如西南当然不要召开）。是否可行，请酌定。

毛泽东

五月六日

[1] 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2] 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3] 杨立三，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勤部副部长。

对贾拓夫^[1]关于 工业情况的报告稿的批语

(1953年5月6日)

高岗^[2]同志：

此件^[3]看过，可用。我只作了一些文字性质的修改，请即送贾

[1] 贾拓夫，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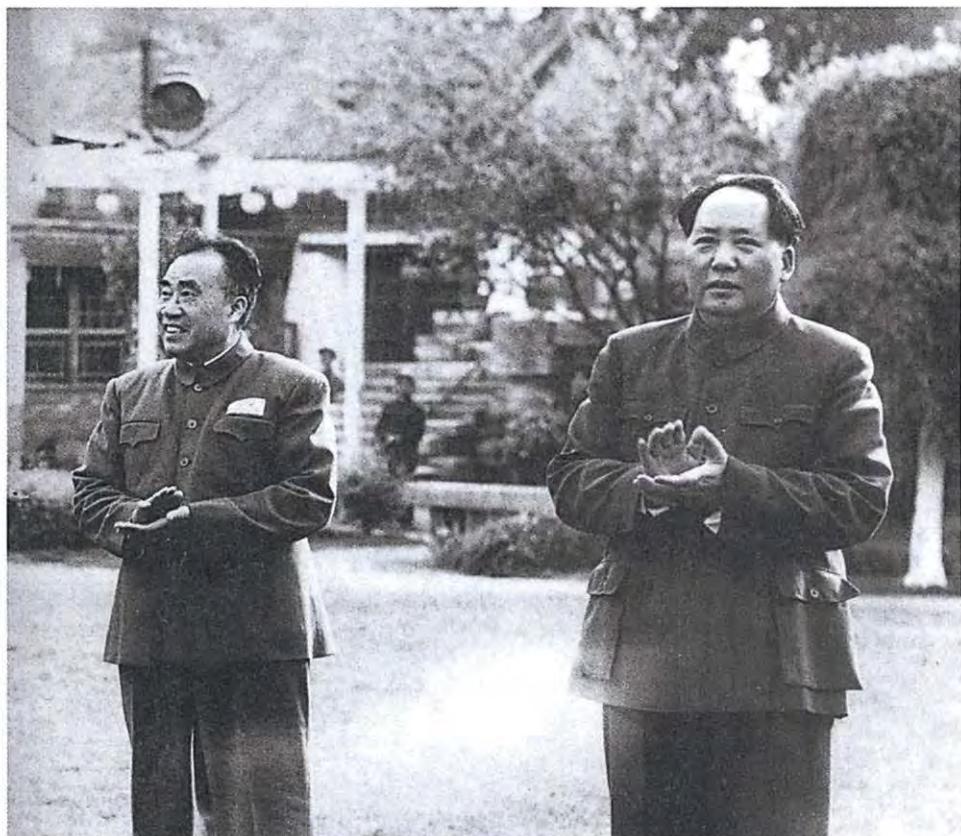
[2] 高岗，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3] 指贾拓夫准备向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的关于工业情况的报告稿。这个报告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国民经济的恢复。到1952年，我国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大多已超过历史最高年产量，胜利地完成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我国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有增长。在现代工业中，国营工业的比重已达到百分之六十左右。以上情况表明，我国现在不但有必要、而且已有可能使国民经济走上国家计划的轨道。（二）新的建设任务。从1953年开始，我国已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在于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为国家的工业化建立基础，并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在这一总的目标下，相应地发展轻工业，积极地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有步骤地促进其合作化，正确地发挥私营工业的作用，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三）目前国营厂矿企业管理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为了把管理工业的水平提高一步，目前应特别注意建立与加强计划管理，建立与健全责任制度，大力提倡学习苏联和推广先进经验，逐步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度。

拓夫同志照此去讲。

毛泽东
五月六日上午十二时

刚才又接到恩来同志的修改稿，他比我看得更仔细，我同意他的修改意见，请高统一加以修改，再交拓夫去讲。毛泽东又及



1953年5月，毛泽东和朱德接见工会七大代表。

关于就战俘遣返方案 同印度协商的意见^[1]

(1953年5月6日)

周恩来同志：

请于今日晚间（距板门店开会要提前一较长时间为宜），找印度大使到你处，正式告他我方将于七日十一时提印度为中立国委员会五国之一，并将新方案交给他。并告他，我方四月二十六日方案仍然保留，如美方对我新方案态度恶劣，我们仍将回到老案，那时并将提名印度一国为接管战俘的唯一中立国。希望印度暂时不要在这两个方案中宣布单独欣赏第二方案，而对第一方案则认为不妥，因为美国甚狡猾，如它不接受我第二方案，则我仍将回到第一方案去。实际上，将战俘送到印度去，不会使印度发生很大麻烦，相反，可能大多数战俘会迅速被遣返，剩下的不过少数。印度最近一星期对我第一方案采取暂不表示态度的方针是好的，希望今后也不要将第一方案堵死。亚洲国家应当团结互助，帝国主义对我们总是没有好心的，中国对印度则是信任的。以上请酌处。

毛泽东

五月六日

[1] 这是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

中央关于基本同意西北军区 甘青剿匪指挥部的布告的电报

(1953年5月8日)

西北局，西北军区政治部，并转甘、青省委，并告西南局：

基本上同意西北局五月二日修改补充后的甘青剿匪指布告。只是
(一) 第三条^[1]“幡然归来”，改为“诚意回来”，较为通俗易懂；
(二) 第五条^[2]最后一句：“对坚决为匪到底者则坚决消灭之”，应删去，不绝匪首自新之路。

中央
五月八日

[1] 经西北局补充修改后的布告第三条，原文是：“一切因受骗或被迫为匪的部落头人，僧俗群众，只要幡然归来，各安生产，一律既往不咎，并保障其生命财产及以往之地位。”

[2] 经西北局补充修改后的布告第五条，原文是：“无论匪首匪众，凡向人民政府及人民解放军投诚自新者，一律从宽处理；凡脱离匪众，并积极协助剿匪者，允许将功折罪；对坚决为匪到底者，则坚决消灭之。”



1953年5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波兰马佐夫舍歌舞团演出，向伴奏的乐队挥手致意。

对中央关于限期完成购粮计划的 指示稿的批语^[1]

(1953年5月10日)

周总理：

为了得粮，使富农、小贩得些好处是可以的，文尾数句^[2]可删去。

毛泽东
五月十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1953年5月10日关于限期完成购粮计划给东北局并告各中央局，中财委、中央商业部、粮食部党组的指示稿上。

[2] 指中共中央指示稿中最后一段话，这段话是：“中央同时同意你们采取卖粮买货者给以九七折优待办法，但对个体农民结合合同方式集中卖粮二吨以上者给以百分之五的优待，是否会有利富农、小贩，而使零散卖粮的农民得不到好处？请考虑。”毛泽东在审阅时删去了这段话。

给张澜、黄炎培^[1]的信

(1953年5月13日)

张副主席、黄副总理：

五月五日惠书^[2]及周孝怀^[3]先生意见书，收到，阅悉；并已转付有关各部门负责同志阅看。其中有些问题，已请周总理酌处。便时尚希转告孝怀先生。此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三日

周书奉还。

[1] 张澜，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黄炎培，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2] 指张澜、黄炎培1953年5月5日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信中说：“周孝怀君从上海来信，大意是：希望政府考虑明令三反五反总结束，安慰受冤，释放无问题被拘者，扭转人心。附笺还谈到农业税等问题。我们会商一下，认为这些都在政府慎重处理之中，孝怀此函，自是一片忠爱热诚的流露，将原笺送陈，以供参考。”

[3] 周孝怀，当时任上海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

给黄炎培、陈叔通^[1]的信

(1953年5月15日)

任之、叔通先生：

此两件有些材料，可以一阅，请予掷还为盼。私营问题的中心，和公营一样，是民主改革与增产节约，这个问题解决了，劳资关系等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

毛泽东

五月十五日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政务院副总理。陈叔通，当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给黄炎培的信

(1953年5月17日)

任之先生：

五月十六日惠书^[1]及附件^[2]收到，甚谢。解决问题，应当由各有关方面先行协商，然后由政府加以择决；并且希望在不久时间内，对工商界未解问题作成一个草案，此事大概是可能的。此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七日

[1] 指黄炎培1953年5月16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中国民主建国会于4月13日至30日召开了12个地方组织的工商情况汇报会，从汇报中看出各地工商业情况已有显著的好转，但好转的情况不平衡，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建议注意两点：一、必须有组织有领导地帮助各地工商业解决一切问题，这里所谓有组织、有领导，就是包括党委、政府、工会、税务、银行、工商联、民主团体等，把这些单位集合在一处，在党政根据总的方针指导下，任何问题都不难解决。二、处理任何问题，只有环绕着一个中心——搞好生产来活动，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2] 指中国民主建国会召开的地方工商情况汇报会根据各地材料汇集的《资料简报》和《资料提要》。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高教、 教育两部的请示报告上的指示^[1]

(1953年5月17日)

毛主席指出，办好学校，首先要解决学校的领导骨干问题，而且首先要解决大学的领导骨干问题。同意总理意见，从宣传部门与青年团抽调一批干部，去充实大学的领导。关于中、小学的领导骨干，应该由地方在几年内逐渐加以解决。毛主席认为训练与提高中学领导骨干很重要，东北的经验是好的。毛主席说：有了坚强的校长，就会产生好的教员。

毛主席对教材问题特别重视，认为目前三十个编辑太少了，增加到三百人也不算多。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一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教材。确定补充一百五十个编辑干部，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决配备。

所谓教学改革，就是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因此应该改编教材，编辑教学法。

关于整顿小学问题，毛主席认为，“整顿巩固、保证质量、重点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很好，但是整不要整过了头。

[1] 这是对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高教、教育两部的请示报告上的指示的传达。

□□同志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也发展不平衡，不可能把全国小学都办成一样，不可能整齐划一，不应该过分强调正规化。农村小学可分为三类：一、中心小学；二、不正规的小学；三、速成小学，编速成教材。农村小学应该便于农民子女上学。毛主席同意□□同志的意见，并指出应该容许私塾式、改良式、不正规的小学存在。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只要不进行反革命宣传，就可以给他一本教科书去教。甚至和尚、尼姑，只要不宣传迷信，也可以让他们教书。

用多种多样办法办学，不强求一律。

关于超龄生问题，中央同志都认为不能把超龄生送出学校。毛主席说：“你们对七八岁儿童这么爱好，对超龄生就可以不管？”并且说：“应首先把超龄生教好，让七八岁孩子迟几年上学并不大要紧。”这就告诉我们先教育超龄生，对发展生产有利。适龄儿童迟几年上学，影响不太大。

小学城乡比例一样，不对。城市小学比例应该大些。

关于小学经费问题，毛主席指出，税种税率必须统一，收支也必须由国家统一掌管。不能像过去那样，搞什么教育经费独立，指定一定的税作教育经费。毛主席同意中央统一支援，预算由省市县拟造。

民办小学，毛主席说，可以容许。不限定几年，能办几年就办几年，横直公家不出钱。学田，也可以允许留，但是要在有机动土地的地方，并有可能拿出来的条件下，才能给学田。

学费也可以收。

小学教育，应该强调劳动教育。关于五年一贯制问题，毛主席认为既然贯彻不下去，只好缓行。五年一贯制的文件，并不错，只是

实行过早，应该推迟。

毛主席对青年健康非常注意，指示增加大、中学生助学金。学生健康不好的原因，是伙食不好，卫生不好，功课重，课外负担过重，太忙。毛主席认为要增进学生健康，要增加营养，搞好卫生，减少负担，少紧张些。毛主席说，要吃得饱，学得太多，可少学点，要克服忙的现象。要一方面增加收入，一方面减少消耗。因此，要增加助学金，改善伙食，另一方面克服忙乱现象。因此，决定大学生增加到十七万元，高中生除少数有钱子女外，一律发给助学金。初中生也增加助学金。

关于设置重点中学问题，毛主席认为要办，具体数字要按实际情况办。可以研究一下。留苏预备学校十所，要分配到各大区。办留苏预备学校，并不是说排除其他学校学生投考留苏；同时，留苏预备学校学生也并不一定全体一律留苏，还要经过考试和审查。重点学校一百五十至二百所。

毛主席指出：“培养工人出身的干部要特别着重一些。”周总理指示，可以从部队机关抽调干部学习。

初中招生，毛主席和□□同志都认为，能多招一些，就多招一些。今年还是招六十五万人。

对陈叔通^[1]来信的复信和批语

(1953年5月18日、19日)

—

叔通先生：

五月九日惠书^[2]及附件数份，均已收到，甚为感谢。承示各点，我以为是正确的。此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八日

[1] 陈叔通，当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 指陈叔通1953年5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送呈上月召集六省工商联秘书长汇报资料一份，又参考资料第十期至第十二期共三份，请备查阅。现在是到了要求得解决的阶段。税收方面，政府已作很大的努力。劳资关系，经过这次总工会第七次大会，必有很大的改善。同时，资方应该改造思想，求其在己。至于资金问题，只要公私、劳资关系搞好，可能有办法，即游资、睡资亦可能投入。打通销路，积压亦得到解决。依赖贷款不是办法。总的说来，国营要加强领导，私营要先了解政策。”

上書通先生
五月九日
書事有及
甚。數
往。均已收
到。甚為之
喜。不
敢不
告。此
事。一
切。如
前。所
謂。不
敢。不
告。也。
順。致。此。
此。事。

毛泽东致陈叔通信的手稿。

二

周总理、小平^[1]同志阅，交李维汉^[2]同志：

此数件阅后，请维汉登入《零讯》。原件用后还我。

毛泽东

五月十九日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

[2]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关于用中央名义 发文件、电报问题的信和批语^[1]

(1953年5月19日)

—

少奇同志及尚昆^[2]同志：

(一) 华南分局报告及方方^[3]的检讨，应加印分发彭真、习仲勋、高岗、薄一波、陈伯达、罗瑞卿、洛甫、贺龙^[4]及其他参加中

[1] 本篇一是写给刘少奇、杨尚昆的信；本篇二是在杨尚昆关于处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等文件的情况和意见给毛泽东的报告上写的批语。杨尚昆在报告中说：“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的决定，每次是由我整理的，送少奇、恩来两同志审查后，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的，遵照来示精神，今后亦应送你阅后再发。过去未送，是应由我负责的。现将五月十四日政治局会议决定的通知送上，请即审阅，以便发出。”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4]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北京市委书记。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西北局第二书记。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罗瑞卿，当时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公安部部长。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

央会议的同志，准备讨论。嗣后，有关较重大的问题的文电，都应如此办。（二）贺龙同志未离京前，应邀他参加中央的各次会议。（三）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毛泽东
五月十九日

二

少奇、恩来、德怀^[1]同志阅后，交尚昆同志：

（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三）十四号通知照发。

毛泽东
五月十九日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对邓子恢^[1]报告中关于基本完成 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时间的 传达问题的批语^[2]

(1953年5月19日)

邓子恢同志：

此事^[3]有通知各地之必要，请考虑加按语转发此电，或另拟一电，送我一阅为盼。

毛泽东

五月十九日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东北局1953年5月16日关于传达邓子恢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时应注意事项给所属的电报上。

[3] 中共中央东北局在给所属的电报中说：各地在传达邓子恢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时，对其中“十年至十五年或更多些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一语，在中央未指示如何传达以前，只可传达到县委书记一级干部，并应嘱咐他们暂不下达，亦不向群众宣传，以免引起部分群众不必要的思想混乱。

对总政布置调查美军虐待俘虏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3年5月21日)

—

周、彭^[1]再阅，加了一条^[2]。

毛泽东

—

调查应本实事求是原则，有则有，无则无，多则多，少则少，力避主观夸大，但也不要故意缩小。

[1] 周，指周恩来。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指毛泽东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1953年5月20日关于调查美军虐待俘虏暴行工作的初步布置给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的报告稿上加写的第四条，即本篇二。

三

各组调查采取实事求是方针，不夸大，不缩小。¹¹¹

[1] 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1953年5月21日关于调查美军虐俘暴行工作的意见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电报稿上加写的一段文字。

给马叙伦^[1]的信

(1953年5月22日)

马部长：

此件^[2]由胡乔木^[3]同志从尊处转来，因给一些同志传阅，耽搁〈搁〉了很多时间，兹特奉还。如要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请照修改样式^[4]为荷！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五月廿二日

[1] 马叙伦，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部长、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任。

[2] 指送审的关于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举行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的新闻稿。这个新闻稿经毛泽东审改后分两次刊载于《中国语文》1953年5月号和6月号上。

[3]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委员。

[4] 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主要内容是新闻稿中转述的他对文字改革意见的一

段文字。这段文字的原文是：“林汉达秘书主任根据胡乔木委员的叙述，传达了毛主席对文字改革工作的重要指示，毛主席指出，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不可操切从事，要继续深入研究，多方征求意见。毛主席认为去年拟出的拼音字母，在拼音的方法上虽然简单了，但笔划还是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更难写。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那样的体势不便于书写，尤其不便于速写。汉字就因为笔划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书，草字就是打破方块体势的。毛主席认为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划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尽量向着一个方向（‘一边倒’），不要复杂；方案要多多征求意见加以改进，必须真正做到简单容易，才能推行。毛主席指出：过去拟出的七百个简体字还不够简。作基本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成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减缩。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毛泽东将这一段文字的开头改写为：“接着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大家认为这样的意见是可以作为本会研究的基本方向的。即是说，中国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以下文字除删去文内两处“毛主席认为”和两处“毛主席指出”外，未作其他改动。这段文字的全文刊载于《中国语文》1953年6月号，题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讨论记录摘要》。林汉达传达的毛泽东关于文字改革的意见中所说的“去年拟出的拼音字母”，指1952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拼音方案组召开的第六次会议通过的一个汉语拼音字母表，其中声母24个，韵母37个。

关于邀请刘澜涛^[1]参加 中央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的批语

(1953年5月24日)

尚昆^[2]同志：

嗣后中央讨论经济工作（工业及其他）的时候，请邀刘澜涛同志到会，并将文件预发他看。星期一讨论高岗同志的两个议程^[3]，请即照此办理。

毛泽东
五月廿四日

[1] 刘澜涛，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中央政治局会议准备讨论的两个议题：（一）第一机械工业部关于目前国营机械工业的情况及今后工作部署的指示（草稿）。（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关于同意苏联方面三年建成长春汽车厂的建议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

关于付印三大条令草案的批语^[1]

(1953年5月24日)

肖克同志：

(一) 可以付印；(二) 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如内务条令11页)

毛泽东
五月廿四日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训练部部长肖克1953年5月15日报送经军委例会通过的《内务条令（草案）》《纪律条令（草案）》《队列条令（草案）》报告的批语。

在中央会议中应有军委议程

(1953年5月27日)

彭德怀^[1]同志，并黄克诚^[2]同志：

在中央会议中，每月或每两月，应有一次军委的议程。例如早几天克诚同志要和我谈的后勤会议的情况，即可向中央会议作一次报告，其办法是用文字简明地写出来，交杨尚昆^[3]同志印发各同志，列入议程，开会时由黄再作简单说明。其他各部门重要事项，准此类推。如同意，请照办。

毛泽东

五月二十七日

[1] 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2] 黄克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3]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王德祥同志：昨顧問用宋刻
金經紙寫的，請一傳，
請一傳，
第一本右下在加，
獨立及越南人民風情習慣，
民族，越南勞動人民與人民
永遠，
領袖同志明同志
紅軍者共著出，並將上列文句
再加註，為盼！
即此。五月七日

毛泽东致王稼祥信的手稿。



1953年5月，毛泽东观看空军航校教学模型展览。

关于修改顾问工作守则 给王稼祥^[1]的信

(1953年5月27日)

王稼祥同志：

在给越南工作同志的《顾问守则》^[2]中，第一条，“热爱越南人民及其一草一木”句之下，应加“尊重越南民族独立及越南人民的风俗习惯，拥护越南劳动党及越南党与人民的领袖胡志明^[3]同志”。

如该件尚未发出，请将上列文句加进去，为盼！

毛泽东

五月廿七日

[1] 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2] 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1953年5月制订的驻越南顾问团工作守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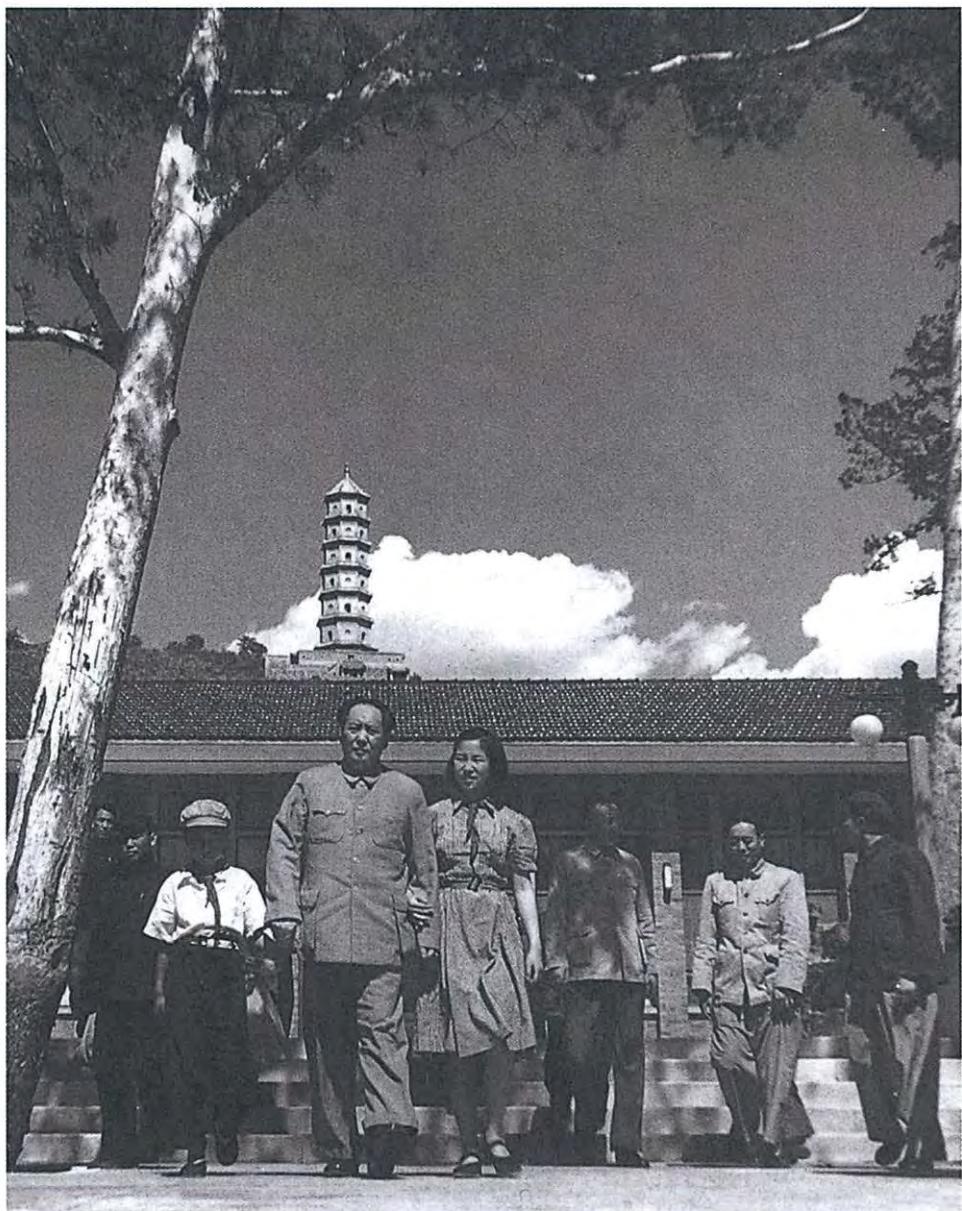
[3]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1953年5月30日，毛泽东和李敏、李讷、刘松林及身边工作人员在北京玉泉山。



1953年5月30日，毛泽东和李敏、李讷等在北京玉泉山散步。



1953年5月30日，毛泽东和李讷及身边工作人员在北京玉泉山散步。

中央转发华北局、新疆分局 关于加强党对政府工作领导的 决定的批语

(1953年6月2日)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

(一) 这里有两个文件，发给你们参考。一个是华北局关于加强华北行政委员会各部门向华北局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华北局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规定^[1]，又一个是新疆分局关于加强省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分局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分局对省人民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2]。(二) 对于这个问题尚未作出决定的大区及省市，望迅速作出决定报来。

中央
六月二日

[1] 中共中央华北局1953年5月21日给华北行政委员会党组并蒙绥分局、各省委、各市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并报中央的这一规定中说：根据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的精神和华北的具体情况，为了加强华北局对政府工作的领导，保证党中央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的正确贯彻执行，避

免与克服分散主义和各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决定撤销华北行政委员会总党组，再行精简华北行政委员会机构，并规定了政府各党组向华北局的请示报告制度和华北局各同志分工负责，加强对政府工作的领导等。

[2] 中共中央新疆分局 1953年5月20日做出的这一决定提出：为了切实加强政府向分局的请示报告制度和加强分局对政府工作的领导，防止和克服可能发生或曾经发生的某些无组织、无纪律及各自为政的现象，规定：省人民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首先经由分局讨论决定或批准，然后通过政府去贯彻执行。政府系统各部门党组，应定期向分局作综合报告，省政府主席、副主席（党员）应负责向分局作政府系统各部门工作的综合报告；政府系统各部门召开的专业会议，必须事先报告，并经批准后始可召开，凡属确定方针、政策性等重大问题者，均应将会议精神与决定等报告分局；撤销省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担任政府工作的几位主要负责人进行分工，直接向分局负责。进一步健全每周一次的分局党委会议，坚持与改进集体阅报与办报制度。分局书记实行具体分工负责，充实办公厅工作，并改善工作制度。

对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队 第二期教育计划的批语

(1953年6月4日)

彭德怀^[1]同志：

此件^[2]还你。未细看，望了一下，有几处修改^[3]。另关于每天九小时半学习时间，似太多，改为八小时如何？尤其夏天，学生吃不消。

毛泽东
六月四日

[1] 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2] 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军校管理部1953年5月1日制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队第二期教育计划。

[3] 毛泽东对这个教育计划稿作了三处修改：一是将训练要求的第一条“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一句话中的“毛泽东思想”五个字删去；二是将这一条中“了解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和道路”一句，改为“了解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和道路”；三是在“每天学习时间定为九小时半：正课六小时；复习射击教练、队列教练一小时；自习二小时半”一句中的“九小时半”处划了横线和问号，并在旁边批注：“似以八小时为好，即正课五小时，操练一小时，自习二小时。”

关于印发有关新税制问题的 几个文件的批语

(1953年6月5日)

尚昆^[1]同志：

此五件^[2]请印发各同志。总题目为：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二月间关于新税制问题的几个文件。

毛泽东
六月五日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关于新税制问题的五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关于在执行新税制过程中物价调整草率造成市场混乱的情况的电报；北京市委关于新税制施行的反映；毛泽东关于新税制问题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的信；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的回信；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吴波等关于新旧税制的利弊及此次物价波动的原因的报告。

中央转发华南分局关于加强集体领导 与各部门分工负责的决定的批语

(1953年6月8日)

各中央局、分局，转各省市委：

中央批准华南分局六月一日关于加强分局集体领导与各个部门分工负责的决定^[1]，并将此件发给各省市委参照办理。

中央
六月八日

[1]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决定中说：华南地区正处在由改革到建设的转变时期，为了做好当前的转变和今后的各种建设工作，关键在于加强分局领导——建立强有力的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制度。在分局集中统一领导下，加强各个部门，特别是对政府工作的具体领导，将各种工作，尤其是财经、文教与政法工作，真正抓起来，克服过去曾经存在着的某些分散和无组织的状态。为此，分局做出了几项具体的规定。

对陈叔通、黃炎培^[1]来信 和附件的批语和复信

(1953年6月14日)

—

周总理、李维汉^[2]同志：

此两信及两附件^[3]可一阅，并可登入《零讯》。这是资方集中表示意见的一次，大都是应当注意解决的。

毛泽东

六月十四日

[1] 陈叔通，当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黃炎培，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2]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

[3] 两信，指陈叔通、黃炎培1953年6月12日关于全国工商联、民主建国会召开工商问题座谈会情况给毛泽东的信，和黃炎培1953年6月13日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遣俘问题达成协议后民主建国会召集京津两地工商界举行座谈会情况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两附件，指中国民主建国会1953年6月12日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后的座谈会情况的通讯和6月13日关于私营工商界现存问题和解决办法的建议。

二

任之先生：

六月十三日惠书及附件收到，甚谢。民建会通知所述各点^[1]，是适当的。私营企业问题已交财委研究。此复。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四日

[1] 指中国民主建国会1953年6月12日座谈会通讯中记述的由黄炎培根据会上反映的问题和意见归纳的几点看法。（一）由于朝中方面的重大努力，以我方建议为基础的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协议终于签订了，这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重要步骤。对于这样的胜利形势，我们的信心自然愈加提高，但不应盲目乐观。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建设，一方面还要加强国防。（二）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以及现已取得的辉煌成就，都是“严明界限，分清敌我”这一正确的政策，在国内外贯彻执行的结果。今后，我们要从现在的胜利走上更大的胜利，就必须人在认识上和实践上都坚持这一政策。（三）我们应该把抗美援朝的革命精神贯彻到我们国家建设的所有工作环节中去，在工商业界，就应该更加提高经营积极性，克服困难，改进业务，配合国家经济建设，以期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加速完成。（四）在国际情况新的变化之下，不论商业、工业和一切私营企业，必须严肃地遵守国家法令，警惕五毒，根据国家经济计划，有领导有组织地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作用。（五）必须加强学习，学习时事，学习政策法令，民建会员尤须以正确的行动来加强在工商业者中的骨干作用。

三

叔通、任之先生：

六月十二日惠书^[1]及附件收到，甚谢。此事，现正研究中，大约可以获得若干解决方案。此复。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四日

[1] 陈叔通、黄炎培1953年6月12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最近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召开了北京、天津等12个城市的工商问题座谈会，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加工订货、收购包销问题，劳资问题，小工业及手工业问题，税务问题，均已递交财政经济委员会工商行政管理局。大家一致认为，由于中央及各级工商联、各地民主建国会和中央及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联系不够，问题是不可能一次就彻底解决的，新问题还会发生，最好中央及大中小城市经常举行不定期座谈，以协商方式交换意见。各地有这样做的，效果都很好。因此建议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指示各地工商行政部门及有关各方面参照执行。

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953年6月15日)

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

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

几点错误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确保私有财产。

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

逐步

对于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1953年6月15日)

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什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过渡时期的时间多长？考虑来考虑去，讲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比较合适。根据几年来的经验，大概十年到十五年是一定需要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包括两部分性质：（一）工业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要超过农业。现在我国工业很落后，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许多机器不能造。工业与农业的比重，现在说工业已占百分之二十八，是否真达到了，我还有些怀疑。什么叫国家基本工业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至少要达到百分之五十一，或者达到百分之六十吧！按照苏联的经验，工业的比重要达到百分之七十才算工业化，我们现在还差百分之四十二。我国的工业化，工业比重也要达到百分之七十。（二）社会主义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何时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间不好定，因此也不要宣布。但是，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十

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肯定可以完成。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现在基本建设、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都有急躁情绪，比如急于要多搞合作社，“五反”后对资本家进攻没有停止，使工人阶级自己处于进退两难地位。

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

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要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十二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过渡时期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用逐步过渡的方法。这对农业和手工业的集体化、合作化，比较容易懂。如何将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好多人不懂。我认为，社会主义因素是逐年增长的，不是说到第十六个年头上突然没收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根据过去四年的经验，资本主义企业中社会主义因素是逐年增长的。私营商业，可以逐年挤掉。零售每年挤掉百分之五，九年挤掉百分之四十五，加上现在已挤掉的百分之三十，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达到挤掉百分之七十五；零售过渡时间长，但有十年也基本挤掉了。批发的主要部分挤掉也快，只要六七年即可办到。向两边挤：（一）商业资本家向工业挤，他们剩下的钱可以搞工业；（二）店员我们接收过来，先救济后就业。私营工业，社会主义因素也可以逐年增长。两种国家资本主义，都有社会主义因素。高级的是公私合营，是半社会主义性质，或者社会主义因素更多一点。低级的是加工订货，两头和中间都卡住了。两头即原料和购销已卡掉；中间有工缴费、品种规格检验、工会、党支部、劳资协商等，也卡得很厉害。今年我们忙不过来，明年就要抓一批私营大厂，我们派干部去。不要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十五年原封不动，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是逐年增长的。不要总把资本主义经济看成一块铁板，看成是不变化的。

每个城市要好好做几个大资本家的工作，我自己也在做。几年

来经验证明，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或者说多数，是可以教育的。他们是民主人士，可以教育。荣毅仁^[1]说，资本家分三种人，一是自愿进社会主义的，二是被拉进社会主义的，三是被社会主义扫掉的。他希望头两种人多些。

“有所不同，一视同仁。”这是公司企业拿来相比较。有所不同，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因此，在对它们的政策方面也有所不同。一视同仁，是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核算、工资待遇、劳动条件等方面，公私企业大体上相同，总目标是增产节约，减少成本。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因为所有权的关系，不能讲完全相同，完全相同是不可能的。你看工人嘛，在私营企业不安心，一到国营企业就安心了。不能抹杀它们之间的不同，但也可大体相同，基本上做到差不多。如果说不可能做到大体相同，那就是没有看到上面有政权在工人阶级手里，下面有党和工会的组织嘛，而只看见资本家！那就会将工人阶级分成两部分嘛！如果私营企业生产不能增长，工资不能提高，工人生活不能得到改善，同国营企业相比，岂不是一部分工人倒霉，一部分工人神气？

资本主义企业的数量不可忽视，其作用是不小的。它有工人和店员三百八十万，而国营企业也只有工人和店员四百二十万，超过它不多。资本主义企业数量很多，目前少不了它，而我们又有办法逐年把它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目前一脚踢开资本主义企业是不行的，我们也没有资格。现在，我们飞机、坦克、汽车、拖拉机等都不能造，就想把资本主义企业一脚踢开，是不对的，不应急躁冒

[1] 荣毅仁，当时任申新纺织公司管理处总经理，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

进。我们应该第一要向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做工作，第二要向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做工作。统筹兼顾完全必要，以便我们集中主要精力做国营企业的工作，集中力量搞国防，搞重工业。对资本主义企业不是置之不管，而是要做教育工作，使资产阶级削尖脑袋要来找我们，可以逐步改造。

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和商业的改组是不相同的。对私营工业的改造，是采用加工订货、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加强党支部和工会的工作，加强对资产阶级基本部分的教育。对私营商业的改造，向商业资本家做教育工作是可以的，但目的是逐年把它挤掉，使商业资本家转为工业家，我们把店员接收过来。

要把资产阶级看成是一个敌对阶级，不这样看就要犯错误。另方面，要看到资产阶级分子是可以改造的。不要忘记一个政治条件，就是政权在我们手里，因而我们有本领有能力来改造他们。对五种反革命分子，用了强制的办法去改造，也是可以改造过来的，反动会道门头子一百零八万正在改造嘛！对资产阶级分子则可用文明的方法加以改造。如果这方面估计不到，就会很怕资产阶级。另外，不要忘记一个经济条件，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胜。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这一点已经清清楚楚地给人民看到了。这是资本家自己讲的嘛！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比较好些？就是劳动生产率比较高，技术提高很快，生产发展很快，又快又好。这说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胜。我们还要有生产改革，主要提高技术。斯大林讲，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不断扩大生产，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1]斯大林是讲“高度

[1] 参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原文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改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9页。

技术”，我们的技术还是低度的。但是，我国在提高生产技术的基础上，不断扩大生产和满足人们的需求，这几年的工作不能说没有成绩。我国的国营工厂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提高了，增加了工人，增加了机器。总之，劳动生产率要提高，人和机器要增加，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要提高，其中主要是技术要提高，这需要做许多工作。

我们已经有了半社会主义的公私合营的经验，这给了资本家一个榜样。过去我们是汉文帝的办法，西向让三，南向让再，不得已做了皇帝。^[1]今后公私合营每年都要发展。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在经济上大为优胜，就有可能吸引大批资本家要求合营。现在有了政治条件和经济优势这两条，使得资本家不能不服我们，不能不接受我们的领导，愿意同我们合作，愿意接受合营。现在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需要统一领导，免得政出多门。

[1] 汉文帝刘恒原封为代王。据《史记·孝文本纪第十》记载，在吕后去世、吕氏亲族叛乱被平定后，朝廷众大臣迎立代王刘恒为皇帝，“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最后推辞不过，“遂即天子位”。乡，即向。

有关停战事务问题需早作准备^[1]

(1953年6月17日)

金日成同志：

鉴于停战协定即将签字，一些有关停战事务问题需早作准备，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 机场。根据停战协定，我区共须修建五个机场，即：板门店、新安州、新义州、兴南、清津。为了工程准备、施工、管理等工作的方便迅速，最好兴南、清津两机场请朝鲜方面负责，若有困难，中国当予协助。板门店、新安州、新义州机场则以中国为主负责修建，请朝鲜予以协助。各机场的管理机构仍以朝中两方同志联合组成。至于停战后朝鲜空军返回朝境内所需机场，则拟由中国空军司令部、空联司^[2]与朝鲜空军司令部共同研究计划报您批准后实施之，所需器材及施工部队，中国将尽力予以协助。

(二) 铁路。拟在停战后首先修复新幕至开城段，和新高山至平康段，其他线路则仍按朝中协议进行。为保证停战小组及中立国视察小组工作的需要，拟由中国调拨清油机车、公事车、软席车等入朝备用。这些车辆徽号，应改为朝鲜徽号。车中的招待人员，中国拟选派一批去协助。

[1] 这是毛泽东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的电报。

[2] 空联司，即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和朝鲜人民军空军联合司令部。

(三) 通信。各中立小组均拟设三套器材：有线电话、无线电话、电台，电台及无线电话机由中国负责调配，有线电话的线路的修复建设，已派志司^[1]通讯处长张凯与中国军委通讯部科长张文东两同志前去平壤与朝鲜政府有关部门商办。

(四) 开城、板门店及各口岸中立国人员住房的修建，如材料与人工有困难时可由中国协助解决。中立国人员食宿用具等物，中国已作准备。翻译、招待、警卫人员拟以朝鲜同志为主，中国选派一批人去协助。

(五) 停战小组与中立国各委员会所需的汽车、司机、汽油等可由中国负责抽调。

上述各项，若你同意，我方即将进行布置。各项工作的管辖关系，待彭德怀^[2]同志来平壤时与你面谈。如何，盼复。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

[1] 志司，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停战签字必须推迟

(1953年6月21日)

彭德怀^[1]同志：

六月二十日二十二时电^[2]悉。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毛泽东

六月二十一日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指1953年6月20日22时彭德怀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根据目前情况，停战签字须推迟至月底似较有利，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15000人。

在警卫战士回乡探亲的 调查报告上的批语^[1]

(1953年6月22日)

写得还好。

文字应通俗些。

要研究社会情况，学得经验。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1] 这个批语写在毛泽东身边的警卫战士张仙朋1953年回乡探亲时写的山东省福山县宫家岛乡调查报告上。毛泽东为了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曾指示他的卫士们在回乡探亲时每人写一份探家报告，并亲自进行批改，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和文化水平。

写得还好。
文字应通俗些。
要研究社会情况，写得深些。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日

毛泽东在张仙朋调查报告上的批语的手稿。

给毛泽连^[1]的信

(1953年6月23日)

润发贤弟：

五月八日的信收到。

你的眼病脚病未好，甚念。仍以在家养治为宜，不要来京。因为湘雅医院诊不好，北京也不见得能诊好。此复。

毛泽东

六月二十三日

[1] 毛泽连，号润发，毛泽东的堂弟。

中央转发莱阳地委 关于物资供应工作总结报告的批语^[1]

(1953年6月24日)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中央农业部党组，合作总社党组，并转各地委县委及政府农业部门和合作社党组：

中央曾经发出指示，在农村工作中，一方面，必须照顾小农经济特点，党和政府不可对农民干涉太多，即必须废止各项主观主义的和命令主义的办法；另一方面，为了适当地和有力地指导农业生产，党和政府必须按照农民和国家的需要和可能，进行必要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现有山东材料一件，证明中央此种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山东莱阳地委根据合作社供应农具、肥料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认真领导合作干部，依照农民的需要和可能情况，深入群众，进行耐心的宣传解释，使群众亲眼看到新农具的好处，结合技术传授，教会群众如何使用，代群众修理，解决了群众使用新农具中所发生的困难，并在工作中进行自我批评，改正已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因而使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在克服了强迫摊派

[1] 这是毛泽东修改的中央转发莱阳地委关于物资供应工作总结报告给各中央局等的批语，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之后，转而成为群众所需要所欢迎的工作。从事此项工作的干部，去掉命令主义之后也变为群众所喜欢的干部。这一经验是很值得各地重视的。推销农具、肥料等工作中的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是必须反对的。因为不根据当时当地群众的需要，千篇一律地把根本不适合当地群众需要的东西，或者把虽属对群众有利，但群众尚未学会使用新农具的技术，尚未证明化学肥料的好处，而一时尚不愿接受的东西，强迫群众接受，结果把好事办成坏事，这是必须反对的。但这绝不是说党和政府不要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推广新式农具、化学肥料等工作。一切对群众有利的，可用的，能为群众所接受的事情，还必须积极地去办。办法不对，要改办法。

今后各地合作社干部必须学习莱阳的经验，学会使用新式农具肥料的技术，下乡去当农民的技术教员，将教技术和销货物结合在一起进行。今后县、区、乡干部也要认真学习农业技术，充当农民的教员，方能有效地领导农民群众。望各地参照莱阳地委的方法改进农村工作。

兹将莱阳地委的报告及山东分局的批示转发你们研究仿行。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对《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批语和修改^[1]

(1953年6月28日)

—

(一) 现在的资本主义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和社会主义经济『兼』联系着的并受其领导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

(二) 对于党和工人阶级仍以国民党时代的态度对付资本主义企业的批判。

(三) 对于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解释。在此原则下的“公私兼

[1] 《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是提交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在中央统战部1953年5月向中央报送的《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写成的。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过程中，毛泽东曾提出将其改写为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正式决议，但后来没有形成正式文件。本篇收入了毛泽东对这个文件的两个批语和加写的一段文字，本篇一是在胡乔木1953年6月27日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讲话稿的意见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上的批语，本篇二是在《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修改稿）》1953年6月21日打印件的封面上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为《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修改稿）》加写的说明。

顾、劳资两利”方针的解释。

(四) 排挤应改为逐步消灭。

(五) 对于商业劳资的安排。

(六) 改为『中央』中国共产党第某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草案，加以修改。

(七) 集中于党中央级〈央〉及各级党委，日常工作委托统战部。

(八) 修改过去法令，创制一些法令。

工人提高政治水平问题。

第六种经济形态。

还有相当力量，应警惕。

二

即送尚昆^[1]办。

此件及附件印发上次参加讨论此问题的各同志，并列入星期一的议程。印件应于今日下午送到各人手里，并通知他们阅读。

毛泽东

六月廿八日上午四时

三

一九五三年七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先在党刊上登载，交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批语和修改

各级党委讨论，俟收集意见，准备提交将来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或其他适当的会议上去讨论和决定。其中有许多当前要争取时机迅速解决的问题应予即行解决，要做的工作应即动手去做。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

(1953年6月30日)

青年团对党闹独立性的问题早已过去了。现在的问题是缺乏团的独立工作，而不是闹独立性。

青年团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但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当中，要有自己的独立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九五二年我同团中央的同志谈话，出了两个题目要团中央研究，一个是党如何领导团的工作，一个是团如何做工作。两个题目，都包含了如何照顾青年的特点。各地方党委反映，对青年团的工作是满意的，满意就在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现在要来个不满意，就是说青年团的工作还没有适合青年的特点，搞些独立的活动。党和团的领导机关，都要学会领导团的工作，善于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照顾青年特点，组织和教育广大青年群众。

青年团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方面的革命工作，作出了很大成绩。无论工厂、农村、军队、学校的革命事业，没有青年就不能胜利。中国青年是很有纪律的，他们完成了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现在朝鲜议和，土地改革结束，国内工作的重点正在转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要学习。青年团要学会领导青年，

[1] 这是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的谈话。

和成年人一道，在农村把农业搞好，在城市把工业搞好，在学校把学习搞好，在机关把工作做好，在军队把国防军练好，成为现代化军队。

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要学会成年人已经学会了的许多东西。但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负担都不能过重。尤其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青年，劳动强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样。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跳跳蹦蹦，不然他们就不高兴。以后还要恋爱、结婚。这些都和成年人不同。

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

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

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现在要保证大家身体好，保证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干部都要身体好。当然，身体好并不一定学习好，学习要有一些办法。

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工农兵青年们，是在工作中学习，工作学习和娱乐休息睡眠两方面也要充分兼顾。

两头都要抓紧，学习工作要抓紧，睡眠休息娱乐也要抓紧。过

去只抓紧了一头，另一头抓不紧或者没有抓。现在要搞些娱乐，要有时间，有设备，这一头也要来个抓紧。党中央已经决定减少会议次数和学习时间，你们要监督执行。有什么人不执行，就要质问他们。

总之，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有些领导同志只要青年工作，不照顾青年的身体，你们就用这句话顶他们一下。理由很充分，就是为了保护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长。我们这一代吃了亏，大人不照顾孩子。大人吃饭有桌子，小人没有。娃娃在家里没有发言权，哭了就是一巴掌。现在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青少年设想。

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自然不能统统按年龄，还要按能力。团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三十岁以下的原来只有九个，现在经过党中央讨论，增加到六十几个，也只占四分之一多一点。三十岁以上的还占差不多四分之三，有的同志还说少了。我说不少。六十几个青年人是否都十分称职，有的同志说没有把握。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个别人可能不称职，也不用怕，以后可以改选掉。这样做，基本方向是不会错的。青年人不比我们弱。老年人有经验，当然强，但生理机能在逐渐退化，眼睛耳朵不那么灵了，手脚也不如青年敏捷。这是自然规律。要说服那些不赞成的同志。

青年团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要有自己的系统的工作，同时又要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并不是什么新发明，老早就有了的，马克思

主义历来就是这么讲的。这是从实际出发。青年就是青年，不然，何必要搞青年团呢？青年人和成年人不同，女青年和男青年也不同，不照顾这些特点，就会脱离群众。你们现在有九百万团员，如果不注意青年的特点，也许就只有一百万拥护你们，八百万不拥护你们。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多数，同时注意先进青年。这样，可能有些先进分子不过瘾，他们要求对全体团员都严一些。这就不那么适当，要说服他们。团章草案规定的义务多了，权利少了，要放宽一点，使多数人能跟上去。重点要放在多数，不要只看到少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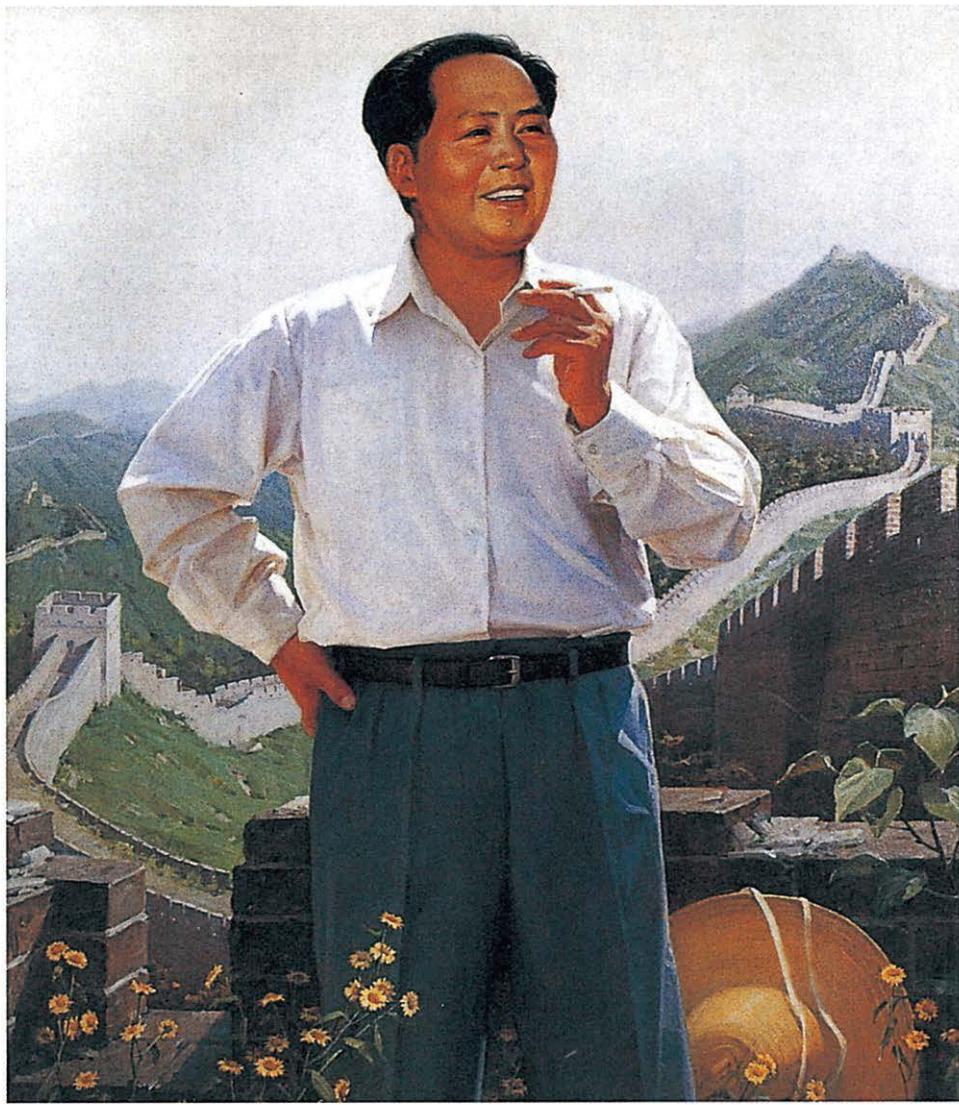
你们的团章草案规定，四个月不参加组织生活就算自动脱团，这太严了。党章还规定六个月，你们也规定六个月不行吗？办不到的事，或者只有一百万人能办到，八百万人办不到的，都不要在团章上规定。原则性要灵活执行。应当是那样，实际是这样，中间有个距离。有些法律条文要真正实行，也还得几年。比如婚姻法的许多条文，是带着纲领性的，要彻底实行至少要三个五年计划。“不要背后乱讲”这一条，原则上是对的，但是不必写在团章上。反对自由主义是长期的，党内自由主义也还不少。不准人家在背后骂一句话，事实上办不到。不要把框子搞得太小，主要是敌我界限要分明。

威信是逐渐建立的。过去军队里面有人编歌谣骂人，我们不禁也不查，军队还是没有垮。我们只抓住一些大的，比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队伍就慢慢上了轨道。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实践中了解。真正了解，才能相信。现在团中央威信已经相当高。有些人还不佩服，慢慢会佩服的。小伙子刚上台，威信不高，不要着急，不受点批评不挨点骂是不可能的。有“小广播”，是因为

“大广播”不发达。只要民主生活充分，当面揭了疮疤，让人家“小广播”，他还会说没时间，要休息了。但是问题总是会有的，不要以为一下都能解决，今天有，将来还会有。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十五年。一年一小步，五年一大步，三个大步就差不多了。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讲基本上完成，是谨慎的讲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谨慎一点好。

中国农业现在大部分是个体经济，要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要坚持自愿原则。不去发展，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右倾。搞猛了也不行，那是“左”倾。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我们历来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之仗。过去打蒋介石，开始有些人犯主观主义错误，后来经过整风，反掉了主观主义，就打了胜仗。现在是打社会主义之仗，要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青年团如何执行这个总任务，你们应当按照青年的特点，作出适当的规定。



《毛主席在长城》(油画)

对青年团二大的指示

(1953年6月)

团中央委员候选名单中，三十岁以下的只有七个，太少了，女的也太少了。老一点的成熟一点的党员参加领导是需要的，但必须增加些青年，不要搞成老年人专政，不要搞成青年老年团。

要一批一批地割韭菜，不割就不好吃了，老干部还有一万吗？可以再调出五千。

团代会的报告，有人反映有些空，是不是要求的高了。我看是满意的。三十岁以上的人不满意，二十五岁以下的看不懂。

几个文件党把的紧紧的，我看在党的领导下，团要有独立活动。几个文件都是讲中心工作，一天天干巴巴的，搞的太严了。纪律要有，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要有纪律，那就不要用纪律了。

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中心工作，守纪律，青年向成年学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青年要有自由活动的一面。一方面老成，另一方面不老成，天天老成是不好过的。有严格的一面，也要有不太严格的一面。

要教育青年活泼点，不是少年老成，而是生动活泼，这是原则问题。这是党同广大群众的联系问题，不然要脱离群众。

太政治化了，太老成化了，变成青年成年团了。搞的下面没条件了（指系统领导），没有独立活动了。

今天我们指导你们搞独立活动，监督你们搞独立活动。

“向歧视妇女现象作斗争”，斗争太多了。婚姻法的贯彻得十年到十五年。要教育不要斗争。

“不要自由主义！”（文件中的一句话）社会上要允许自由主义，党内要反对自由主义。背后讲是发表意见的一种方式。在广大群众中禁止这一条是办不到的。

“对上级指示，不执行不发表意见”（文件中一句话）。指示要执行，至于不发表意见，我们这个会议也有一部分发言，一部分不发言。

对青年不要管得太紧，小孩子打架，只要不打瞎眼睛，出点血没关系。鲁迅的儿子批评鲁迅说你不像个爸爸。

叫我讲什么？我就讲打架、闹。



1953年6月28日，毛泽东和李讷等在北京安定门外看孩子们捉蝉。



1953年6月28日，毛泽东和孩子们在北京安定门外小憩。

今冬明春农闲季节 应集中力量解决区乡新三反问题^[1]

(1953年7月1日)

各地在今冬明春的农闲季节内，除完成乡选任务外，应集中力量解决区乡新三反问题，并着重地注意解决落后乡问题。但在新区至少须要两三年时间才能全部解决这个问题。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1953年7月1日批转福建省委关于落后乡的工作报告给各地的指示稿时加写的一段话。

接受蒙古驻华大使奥其巴特尔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3年7月2日)

大使同志：

我很高兴地接受您所呈递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的国书，并衷心感谢您的祝贺。

三年多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和巩固。中蒙两国政府去年签订的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不但进一步加强了我们两国之间的这种友好合作关系，并且大大地促进了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幸福。

蒙古人民已经在建设工作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一向为中国人民所深切关怀和赞扬。我深信：中蒙两国人民之间日益紧密的团结必然会加强我们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的力量，并使以伟大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更加巩固。

大使同志，我热烈地欢迎您出任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巩固中蒙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谨祝您在工作中获得完全的成功。

为迁移马克思墓捐款给波立特的信^[1]

(1953年7月4日)

亲爱的波立特同志：

您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六日的来信收到了。

我们极为同意你们对卡尔·马克思墓的处理办法。为表示我们对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的生平和工作的关怀，中共中央认为帮助这一工作顺利进行是自己的光荣任务，特为移墓所需费用募款七千美元（折合二千五百英镑）。此款请苏共中央代为转去。致以兄弟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七月四日

[1] 毛泽东给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波立特的这封信，是中共中央1953年7月4日用电缆发给苏共中央，请他们转交的。

对苏联一篇文章中 批评“对立的统一”提法的批语^[1]

(1953年7月)

陈伯达^[2]同志阅，退乔木。

我认为这种批评^[3]是错误的。

[1] 毛泽东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1953年7月6日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本期《学习译丛》末篇第100页至101页提到对于“对立的统一”的批评，请参考。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3] 《学习译丛》1953年第六期刊载苏联Л·巴热诺夫的文章，题为《评罗森塔尔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文内说：我们认为罗森塔尔教授所用的“对立的统一”及“对立的统一和斗争的法则”等名词是不妥当的。斯大林在其经典著作《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已规定发展即对立的斗争。在我们的哲学著作中所见到的对立的“同一”或对立的“统一”等名词，是黑格尔的表述方式的残余。在哲学著作中应当用“对立的斗争”这个名词，因为它最确切地表达了这一法则的实质。在斯大林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就是把这一法则说成对立的斗争法则。作者应当根据斯大林的精确的措词来阐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第四个特征，因为这样的措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最新成就。

给符定一^[1]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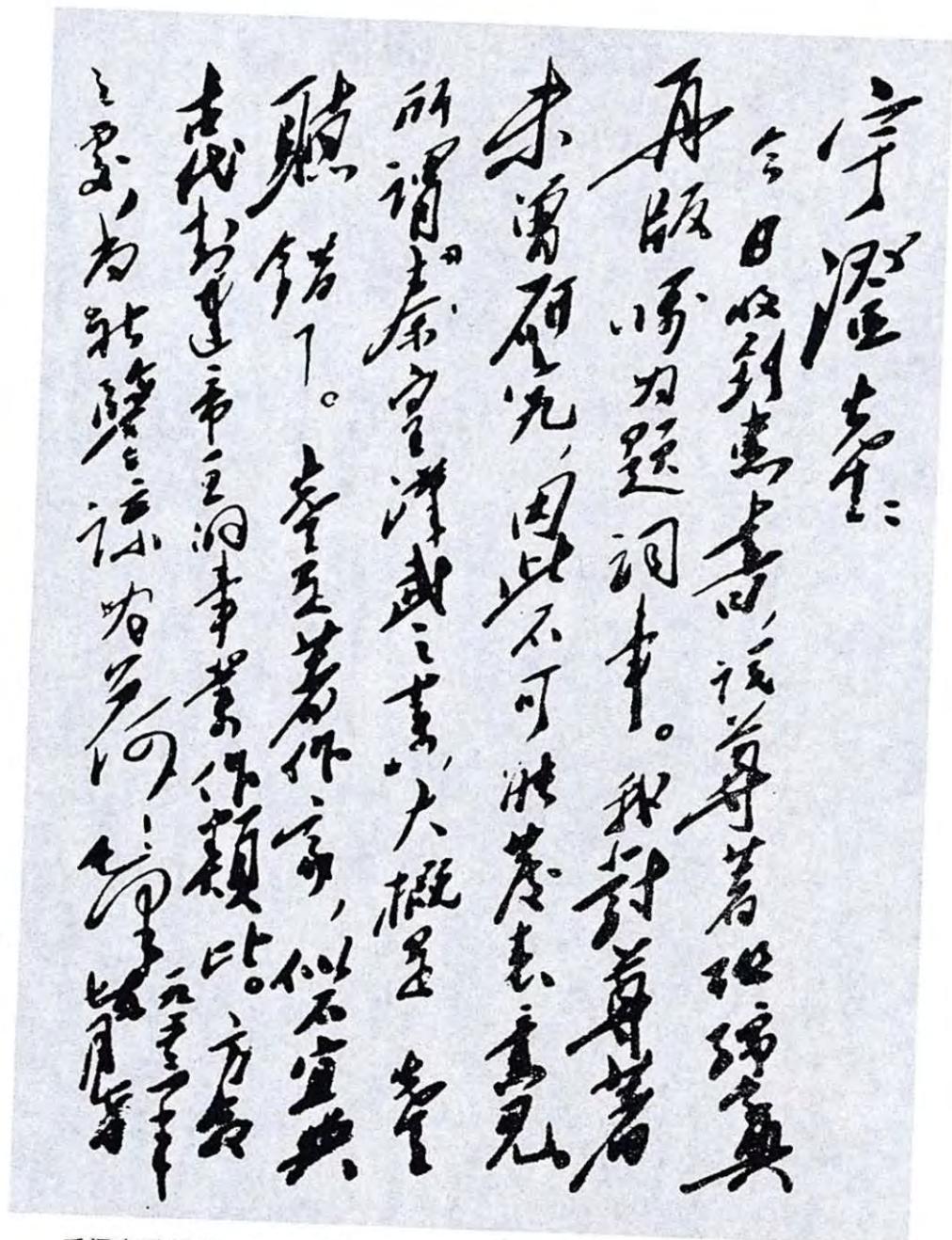
(1953年7月7日)

宇澄先生：

今日收到惠书，说尊著《联绵字典》再版嘱为题词事。我对尊著未曾研究，因此不可能发表意见。所谓“秦皇汉武之业”，大概是先生听错了。先生是著作家，似不宜与古代封建帝王的事业作类比。方命之处，尚祈鉴谅为荷！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

[1] 符定一，字宇澄，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毛泽东致符定一信的手稿。



毛泽东为符定一的《联绵
字典》题写的书名。

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掌握主动争取停战^[1]

(1953年7月8日)

彭司令员，并告金首相、李克农^[2]同志：

七月七日午来电悉，并转发平壤。同意将修正军分线^[3]问题暂不向对方提出，而推迟到十八日左右看军事进展情况再定。如果到十八日左右原定的军分线无甚变动，即可不提此问题。如果届时攻夺金城以南的任务基本上完成，即应提出修正军分线，使之符合于当时实际情况。对方若坚持不肯，我们可以退一步，主张以新占地区为非军事区，而将军分线划在这个地区内，若对方继续坚持反对，我们还是要争至适当时机，仍在六月十七日的军分线上确定下来。自复会至十八日左右期间，可就有关停战协定的实施的其他各种问题与对方进行讨论，并尽可能取得对方对这些问题的肯定答复。因此，停战签字日期如无新的变化亦须推迟到七月二十日以后。

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掌握主动，争取停战。如果能争取停战签字，则不论李承晚^[4]参加停战与否或参加了而在停战后还要进行破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金首相，指金日成，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负责人。

[3] 军分线，即军事分界线。

[4] 李承晚，当时任大韩民国总统。

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掌握主动争取停战

坏，我们均可以停战协定的签订来瓦解“联合国军”阵营和美李军队的士气。如果不能签字，则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中，可以继续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击敌人。

毛泽东

七月八日三时半

给张澜的信

(1953年7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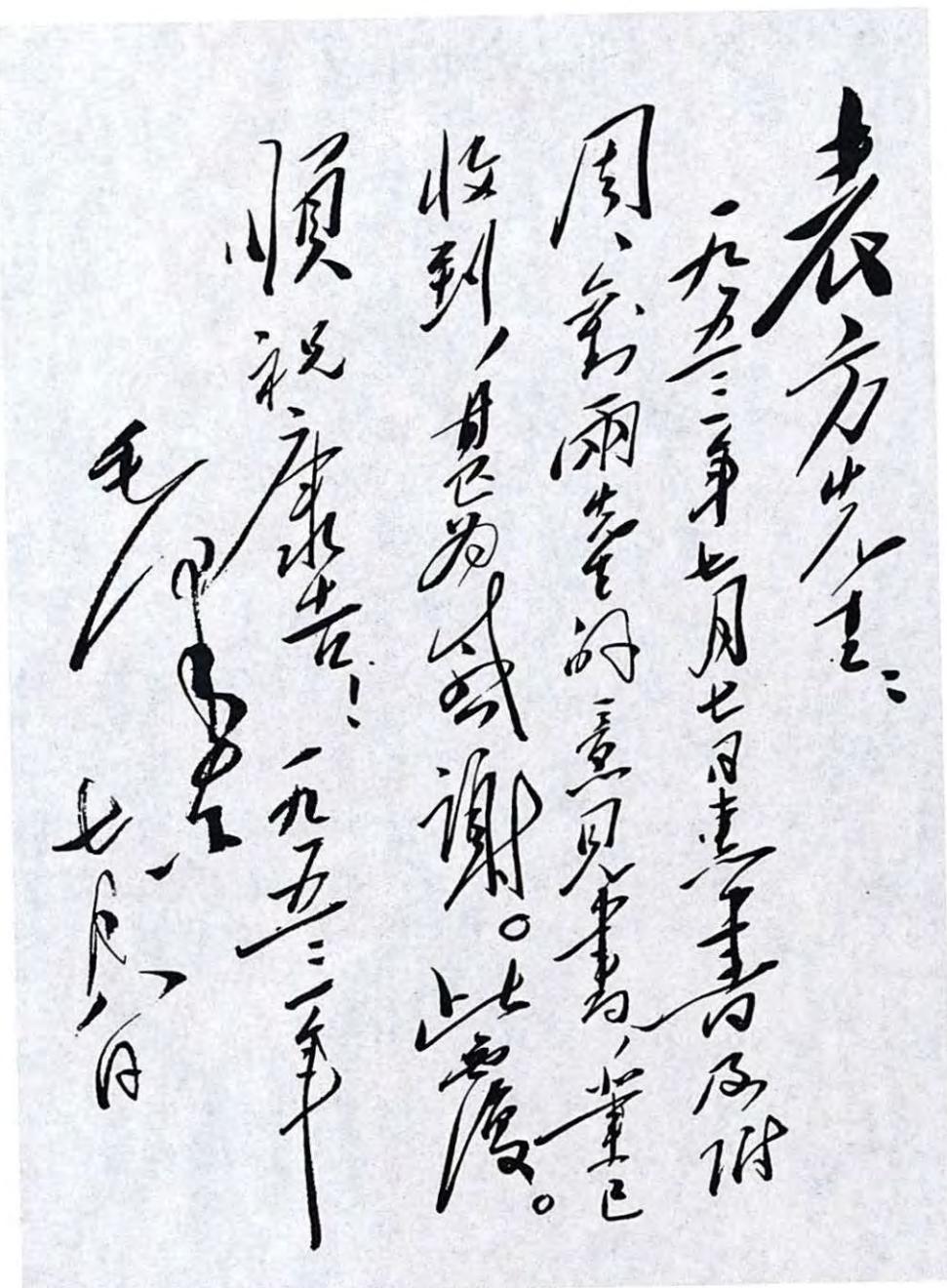
表方先生：

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惠书及附周、刘两先生的意见书，业已收到，甚为感谢。此复。

顺祝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七月八日



毛泽东致张澜信的手稿。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1]

(1953年7月9日)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1] 这是毛泽东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一个文件上的批语。

关于复会后的谈判应分两个步骤进行

致李克农^[1]电

(1953年7月9日)

李克农同志，并告金首相、彭司令员^[2]：

七月八日二时来电悉。此次复会后的谈判应分两个步骤进行。首先应讨论有关停战协定实施的各种保证，然后再谈签字前的准备工作。因此，十日会上的发言不要提及各种小会，而应表示在停战协定的实施保证尚未商妥前，无法进行签字准备工作。修正军分线问题不应在现在提出，而要按七月八日三时半去电办理。二万七千人^[3]提交政治会议问题现在讲出过早，应争到快要进行签字时再提出。发言稿我们已加修改，现发来，准备在十日会上争取先发言提出。如果对方答复蛮横或强词夺理，应当场予以驳斥。如果答复属解释性质，态度不坏，即应表示我们需考虑，建议休会。如果对方提出问题，表示带回研究，并建议休会。根据新闻反应，华盛顿正

[1]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书记。

[2] 金首相，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司令员，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3] 指南朝鲜李承晚政府悍然破坏双方已经签字的停战协议，强迫扣留2.7万余名我方被俘人员一事。

指示克拉克^[1]再来一信。如果十日会上，在我方尚未能抢先发言之前，对方即已宣读此信，则不问其内容如何，我们仍应首先宣读发言稿，然后视对方来信内容如何予以简单答复，告以改日再予全面回答。如果与二十九日内容基本相似，应表示不能完全满意，请对方研究我发言并提出答复。若来信比前信较有具体保证，则表示将带回研究。若来信强调进行签字准备工作，则应重申我发言稿末了一段，请对方郑重考虑，提出答复。

毛泽东
七月九日廿二时

[1] 克拉克，当时任侵朝的“联合国军”总司令。

中央关于小土地出租者、富农和地主 贷款问题复西南局电

(1953年7月10日)

西南局，并告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

一九五三年五月九日人民银行西南区行关于农业贷款问题的报告和西南局的意见阅悉，中央同意西南局的关于在贷款问题上对待小土地出租者、富农和地主的各项意见^[1]。惟对土地改革后确已从事农业，并服从政府法令的地主分子，如其生产确有困难或遇疾病等意外灾害时，在当地群众同意的条件下，在农业贷款

[1] 中共中央西南局1953年5月9日给中财委党组并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关于贷款给小土地出租者、富农和地主的问题，意见是：（一）农贷不贷给地主和富农，这一原则应坚持。至于可否贷给小土地出租者，我们认为应从具体情况出发，凡是从事农业生产确有困难者，可以贷给农贷，否则应以其他方式解决他们的困难，免使农贷变成社会救济。（二）地主在生产和生活中确实存在困难者，我们不应采取不理态度，不理对整个社会不利，要根据不同情况具体进行。（三）对待富农问题，应该很好地进行分析。一般说，因西南土改中对富农经济采取保存的政策，富农无法生产和生活的情况是基本上不存在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富农生产上没有问题，他们的生产情绪不高也可能是事实。因此，对富农基本上是稳定其生产情绪的问题，如有个别划错成分或遭到意外灾害者，当可按特殊情况具体处理。

中，亦可予以适当照顾。如当地群众反对贷款给地主分子，则不要贷给他们。

中央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日



1953年，毛泽东在北京郊区农村。

关于缩减在辽东等地 修建国防工事计划的批语

(1953年7月11日)

黄克诚^[1]同志：

赞成你的缩减计划^[2]，这是很必要的，望照此部署。

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

[1] 黄克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2] 指黄克诚1953年7月11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的缩减在辽东等地修建国防工事的计划。报告中说，鉴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如财力、物力、技术、技术领导均缺乏，领导干部和施工部队又无近代筑城经验，5年完成原计划确有很大困难。因此，拟对整个计划重新研究一下，采取稳步修建的方针，即前3年少修，求得锻炼干部，取得经验后再逐年增加。

给邹普勋^[1]的信

(1953年7月11日)

普勋兄：

七月一日的信收到。你的生活提高一些，甚慰，为你庆贺。

秋收以后，如你愿意来北京一游，可以偕李漱清^[2]先生一道来京住个把月。李漱清先生去年来信想来北京一次，但不知他今年尚有此种兴趣否，他的身体能出远门否？

顺祝

安吉

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

[1] 邹普勋，毛泽东少年时的私塾同学和邻居。

[2] 李漱清，毛泽东少年时的老师，大革命时期曾协助毛泽东在广州办过《政治周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涉及广大群众利益的事项 未经允许不得下达^[1]

(1953年7月13日)

鉴于今年未经中央正式决定，即已将拟于七月一日增加工资的计划普遍传达下去的情况，今后关于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事项，凡尚属拟议，未经正式决定并允许下达者，一律不得下达。

[1] 这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政治局会议决定事项的通知稿时改写的一段话。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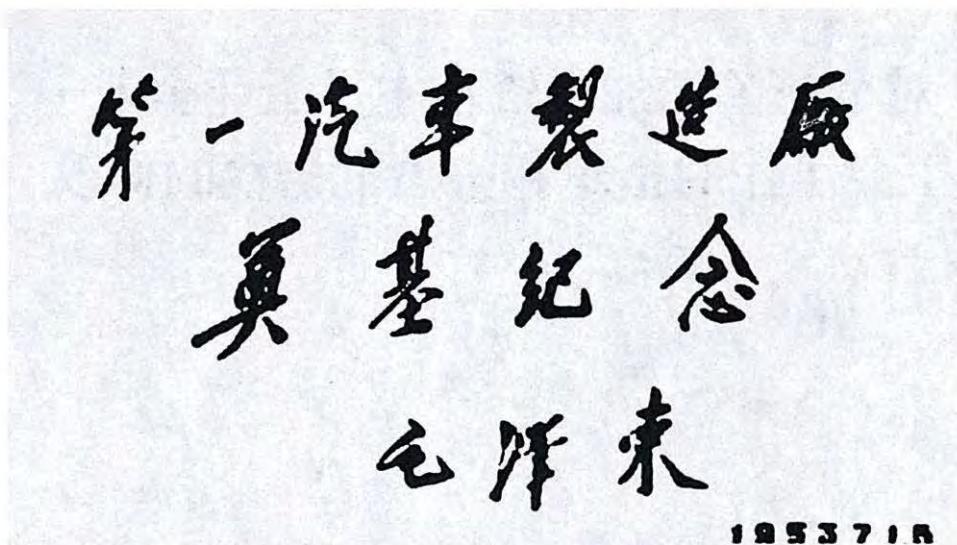
为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题词^[1]

(1953年7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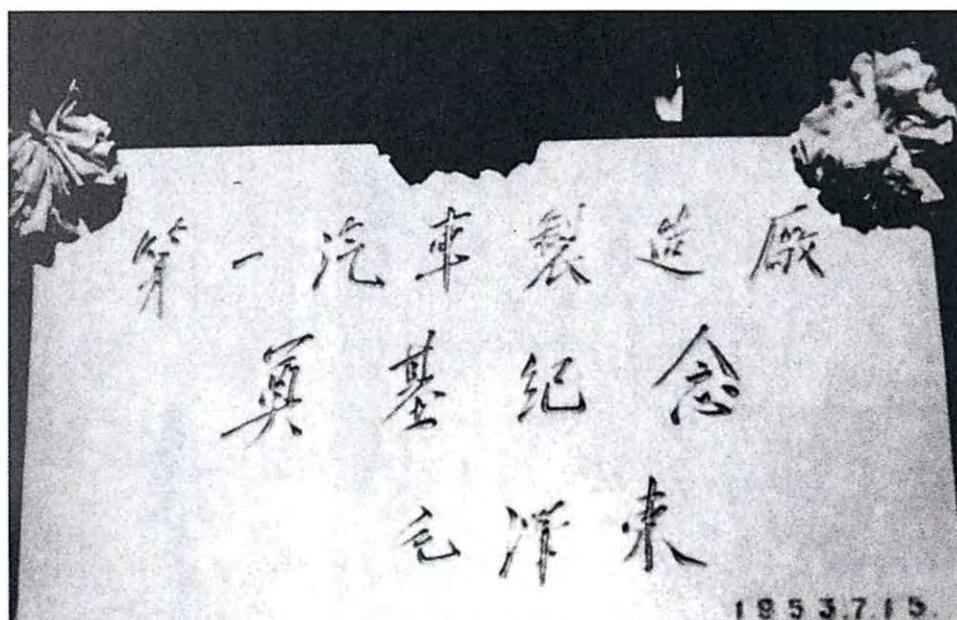
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

毛泽东

[1] 1953年6月，毛泽东亲自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1953年7月，第一汽车制造厂隆重举行奠基典礼。毛泽东题词“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汉白玉基石放置在厂区中心广场。第一汽车制造厂破土动工。



毛泽东为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的题词。



1953年7月15日，我国第一座汽车制造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毛泽东为奠基仪式题词。图为刻有毛泽东题词的汉白玉基石。

对全总关于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中工会工作的指示和中央批语稿的修改^[1]

(1953年7月)

—

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工会工作，必须贯彻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这里所说的改造还不是指取消资本家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那种最后的改造步骤。这里所说的改造，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的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解放以前的那种资本主义，它主要地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的，资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图。当然，工人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是这一部分利润，在整个企业盈利中不过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占了四分之三左右的盈利的主要部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中的工会工作的指示所作的修改。这个指示是全总党组 1953 年 7 月 14 日报送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本篇二是毛泽东对中央转发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中的工会工作的指示的批语稿所作的修改，这个批语稿落款时间为 1953 年 7 月 20 日。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分，是为国家（所得税）为工人（福利费）和为扩大企业设备（公积金，这里包含了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一个小的成份）而生产的。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即是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它是带了若干（有几种程度不同的情况）社会主义性质的。必须指出，目前并不是一切或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工厂已经做到了这一步，还没有，还需要几年的努力才可以做到这一步，但是一定可以做到这一步的。

二

指示中所指出的“四马分肥”的比例，是适合于多数资本主义工厂企业的，但是如果某些工厂资本家所得超过指示中所指出的比例，只要他们的所得部分是依靠正当经营而不是依靠五毒或其他不法行为，也是可以允许的。资方所得，不及此比例的工厂企业要达到此比例，须在向工人说清楚取得工人同意后，方能实行。

在黄克诚关于歼灭登陆之敌 的部署的报告上的批语

(1953年7月17日)

退黄克诚同志，处置^①很好。

毛泽东

七月十七日上午五时

要防敌以另一部在他处登陆。

[1] 指黄克诚1953年7月16日19时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报告中关于歼灭登陆之敌的部署。报告中说，今晨4时50分，蒋军两个团附坦克一部在其海军掩护下，在福建南部的东山岛登陆，与此同时，敌伞兵300名在飞机30架掩护下，在东山岛的后林地区降落。截至12时30分，我守岛部队公安八十团两个营（缺一个连），已退守该岛的东北角和西北角的东山、五里亭山，与敌展开激战。为粉碎登陆之敌，福建军区今晨5时已按原定计划将漳浦地区待机的三十一军二十二团调往东山增援（57公里），其先头部队已乘汽车于今日上午10时赶至陈岱，并即进入东山岛，现该岛东北、西北要点均在我控制中。在东山岛后林地区降落的伞兵，已被我大部消灭。中南军区在潮汕地区的四十一军一二二师，亦按原定计划赶往增援，其先头团可于今日19时赶至梅州，增援该岛，准备歼灭登陆之敌。为粉碎敌人的阴谋，除已告情报部门严密掌握敌情变化，通讯部门确实保证中南、华东军用电话畅通，中南、华东通令各海防部队提高警惕防敌可能袭扰外，并已告中南四十一军、华东二七二团，到达后应即坚决消灭登陆之敌，使其今后不敢狂妄行动。

关于停战后工作安排和志愿军参加各委员会代表人选的问题^[1]

(1953年7月20日)

李克农同志，并告彭司令员^[2]：

六月十九日来电，并六月十六日及七月十八日两电均悉。一般同意来电各点意见。停战委员会中国代表应由丁国钰及柴成文^[3]二同志担任，杜平^[4]同志负责中国的停战委员会代表内部与志司^[5]联系事项。红十字小组的南、北、中三组，以及朝中方面参加该项小组工作的人员，均应集中进行联合训练。他们因需与敌方人员在一起工作，且需到南朝鲜去，故训练必须加强。他们的访问工作结束后，应全部参加解释工作组以资运用经验。红十字小组及解释组准备带去的告被俘人员书等文件，待审阅后另电告。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负责人李克农的电报。

[2] 彭司令员，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丁国钰，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柴成文，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

[4] 杜平，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参与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领导工作。

[5] 志司，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遣俘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同意以王健^[1]担任。所有伪俘遣返问题的处理，均由朝鲜人民军负责，故我们应将凡在我手中的伪俘派遣得力人员移送朝方，并将有关这些伪俘的全部情况，详告朝方。至于外俘，则由志愿军统一处理。此议须取得南日^[2]同志同意。关于不愿遣返的外俘问题俟黄远^[3]回北京汇报后再作决定。

停战后的朝中领导核心，不应采取统一两党的形式来组织，致妨碍兄弟党各自的独立组织系统。停战后，谈判代表团改为停战代表团，内部仍应朝中各保有同等人数的代表团，依照谈判开始时与金首相^[4]的协议，由李克农同志负总的责任，一切问题由朝中双方代表集体协商解决。中方代表即由李克农、杜平、乔冠华^[5]三同志担任。此议如你们同意，当再征求金首相意见。

中方参加五个口岸^[6]的工作人员，如尚未解决，望速与志司直接商洽调遣，以免迟误。关于供应、行政、机场、铁路等问题，已由总后、外交部、公安部、空司、联运司^[7]等负责处理，并已与你们直接联系。

此外，印度向我们提出两个问题：（一）印拟派一个三至四人的小组于停战后经东京去朝鲜访问“联合国军”司令部，人民军、志

[1] 王健，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办公室主任。

[2] 南日，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方面首席谈判代表。

[3] 黄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

[4] 金首相，指金日成，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

[5] 乔冠华，当时参加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的领导工作。

[6] 五个口岸，分别在朝鲜新义州、满浦、新安州、清津、兴南。

[7] 空司，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联运司，即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

关于停战后工作安排和志愿军参加各委员会代表人选的问题

愿军司令部，接触实况，以便准备工作。我们考虑此事似不便于拒绝，但我方拟只让其访问平壤总部，志司可派人参加，而不让其至志司。（二）美向印表示，印度部队只须二千五百人，我们认为可提出三千人。望将此二问题，与南日同志研究，并电告你们的意见。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日

关于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安排 等问题的指示^[1]

(1953年7月21日)

李克农同志，并告金首相、彭司令员^[2]：

七月二十日二时及二十一日一时半来电均悉。

一、关于军分线^[3]，应与志司^[4]联系并取得其同意，按实际情况与对方确定之。

二、关于不直接遣返的剩余战俘，由对方指定在板门店以南对方管理下的非军事区拘留问题，原则可以同意，但应声明对方必须注意如下三点：

(一) 我方绝不承认李承晚^[5]政府所谓不容许印度、波兰、捷克人员和印度武装部队、印度红十字会及我方解释代表进入南朝鲜境的声明，因为这是违反职权范围的规定的。我并将通知印度、波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负责人李克农的电报。

[2] 金首相，指金日成，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彭司令员，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军分线，即军事分界线。

[4] 志司，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5] 李承晚，当时任大韩民国总统。

兰、捷克、瑞士、瑞典五个中立国家，告以在接管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的工作上，他们有权通过南朝鲜，并有权受到“联合国军”包括南朝鲜军的保护。

(二) 要求对方告知我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的总数，其中包括已被追回的经南朝鲜强迫扣留的战俘的数目。我并须声明在此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中，除哈利逊^[1]将军已经声明将不予释放的真正战俘之外，凡李承晚、蒋介石所派特务均不得继续混充战俘营管理员、教员、翻译或其他职司，并不得跟随战俘来到非军事区。

(三) 对停战协定(七)(八)(九)(十)等款只能作临时补充协议，仅在处理此项战俘时适用，并规定只有真正战俘才能被准许进入上述被指定的非军事区看管战俘地点。其他任何人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人员、印度部队、印度红十字会人员和我方解释人员及双方代表之外，一律不许进入该非军事区。我方将提出对案，今晚电告。

三、关于除第十二款外的全部停战协定条款生效日期，我们应主动按照对方所提出、经我方同意的六十三款，定在签字后十二小时内停火生效期间以后，其开始时间应为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人员在停火后进入朝鲜，并自板门店到达各自后方口岸后开始执行监督与视察任务的时间。此项停战协定全部生效的时间与停火生效的时间之距离约为五天，望你们再加以精确计算后提出。

四、签字日期估计各种准备工作，包括校正军事分界线，印地图及修建等在内的完成时间，不会早于七月二十六日。如你们估计有此可能，可与对方定签字日期为二十六日。我们应坚持金、彭及

[1] 哈利逊，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联合国军”方面首席谈判代表。

克拉克^[1]不参加签字仪式，而应将文本送签。至参加仪式人数，既然金、彭不到场可以同意对方所提的数目。

五、关于停委会^[2]的办事细则尚待审查，望你们提出审查意见电告。

六、关于战俘遣返总数的交换，同意来电意见，我方除旧俘外，另加新来伪俘一千人。

毛泽东

七月二十一日九时

[1] 克拉克，当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2] 停委会，即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

坚决制止滥发统计报表

(1953年7月22日)

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

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杨士杰同志的报告^[1]极好，中央一级，大区一级，省市一级，专区一级和县一级，共五级科长以上负责干部，均应当好好地读一遍。县以上党、政、民各级机关所发统计报表，在农村中已泛滥成灾，达到了完全不能容忍的程度。为此，中央责成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主要责成国家统计局），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在接到本指示以后，迅即仿照华北局的办法对于统计报表问题指定专人加以调查分析，分别宣布停用、保留和改进，并规定简化报表及控制报表的可行办法，坚决制

[1] 指杨士杰1953年5月23日关于检查农村统计报表情况给华北局的报告。报告说，目前农村报表繁多复杂的混乱状况，确已达到不能容忍的程度。主要表现在：（一）表格繁多，分量过重。（二）内容复杂，毫无重点，面面俱到，无奇不有，用处却极少。（三）要求过高，脱离实际，时限太急，无法填报。（四）上面乱发，下面乱填，捏造、估计，很不真实。农村表格太多，是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的直接产物，是农村“五多”的重要项目之一。因此，要把纠正这种混乱情况当作“新三反”（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重要内容，与反对农村的“五多”同时进行。除必要的普查项目外，一般采用开调查会辅之以典型抽查的方法。要建立正确的统计报表制度，并严加控制，删繁就简。

止滥发统计报表的严重现象。处理滥发统计报表一项问题，应联系“五多”问题中其他四项问题去处理。城市中的滥发统计报表问题，亦应同时注意处理。

本指示及附件应登党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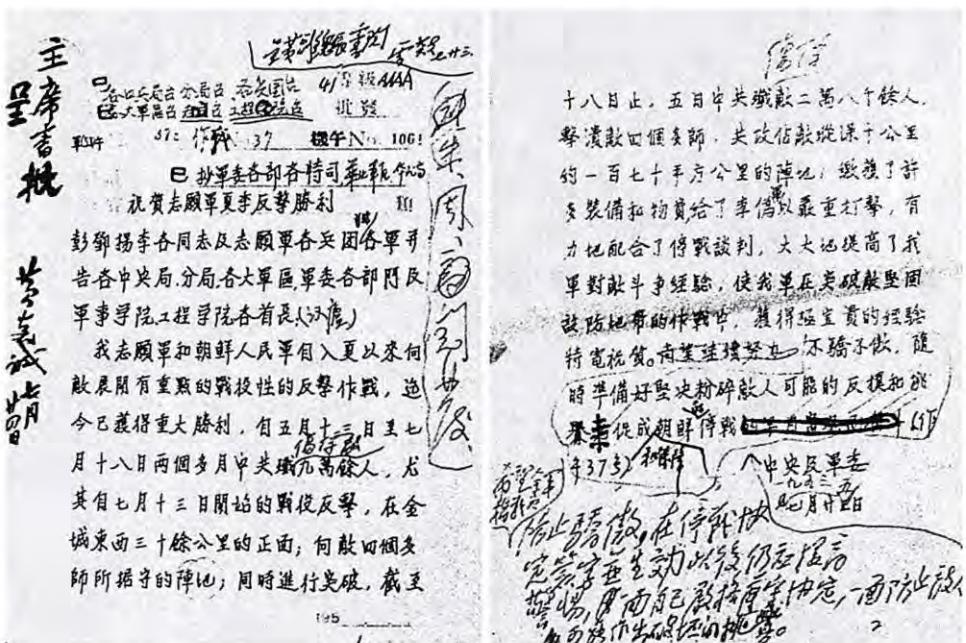
中央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停战协定签字后志愿军仍应提高警惕^[1]

(1953年7月25日)

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以后，仍应提高警惕，一面自己严格遵守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作出破坏的挑衅。



1953年7月25日，毛泽东签发电报祝贺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最后一战中取得胜利，并要求全军在停战协议签字生效后仍要提高警惕。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和军委1953年7月25日祝贺志愿军夏季反击胜利的电报稿上加写的一段话。

在中央关于处理湖东县 劳改队看守打死群众事件的 电报稿上加写的话

(1953年7月27日)

全国共有劳改犯人口口口万人左右，与民争利事各地一定还有，如不检查纠正，类似安庆湖东县三星圩事件^[1]，势必还要发生。为此通知你们，望加注意。

[1] 中共中央华东局1953年7月7日关于湖东县三星圩事件给安徽省委并山东分局、各省市市委并报中央的通报中说，湖东县三星圩劳改队农场干部在当地发生水灾后，不但不从维护群众利益出发，主动破堤放水，反而不顾群众死活，阻止破堤放水，乃至发展到劳改队看守鸣枪，造成流血事件。

对彭德怀谈话稿的修改意见^[1]

(1953年7月27日)

李克农同志，并告金首相、彭司令员：

七月二十六日二十四时来电和简报均悉。同意来电所提各点意见。彭司令员既不出席签字，谈话稿可改在二十八日下午五时金首相告全国人民书发表后再行广播。现将此稿所做改动电告你们：标题应改为“彭德怀司令员在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发表的谈话”，标题下应加注“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于朝鲜前线”。原稿第一段应改为：“朝鲜停战协定已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在板门店签字。自协定签字后十二小时起，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已经完全停止，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鲜停战已经实现了。”第五段原稿最后两句“现在谈判双方业已达成了光荣协议，签定了今天的停战协定”应改为：“谈判双方最后才达成了光荣协议，并在昨天签订了停战协定。”原稿第八段、第九段、第十段、第十一段的第一句“在停战协定签字的今天”，皆应改为“现在”两个字。

以上均望照改。具体广播时间二十七日晚电告。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三时半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负责人李克农的电报。

关于朝鲜停战后空军作战 等问题的批语^[1]

(1953年7月27日)

照办。^[2]

毛泽东
七月二十七日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勤务部部长黄克诚1953年7月27日19时报告的批语。

[2] 黄克诚的报告说：空军司令部请示朝鲜停战后空军作战的有关问题，我们的意见，敌机如仍继续侵越北朝鲜及我东北领空，是敌破坏停战协议的行为，我则拟坚决给予歼灭打击。为此，我空军仍须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战斗。报告还就空联司机构的撤销等问题提出建议。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历时3年多的朝鲜战争结束。图为彭德怀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1953年7月27日，美军上将克拉克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53年7月29日)

一、在过渡时期，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性质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相同的，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但实行的办法则有很多不同。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指出的这条道路，我们实行了。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对资产阶级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他们。使独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变为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大的进攻，只有有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这五个条件，加上社会主义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才能这样搞。

二、国家资本主义是带有进攻性质的，但在总的进攻中有部分退却，如对资本家的“三权”^[1]和利润分配。现在资本家的“三权”已经不全，虽然所有权未取消，但管理权公方已经插进去了，他们的“三权”就受到了限制。现在要让一下，特别是在红利上，要给资本家让利，使他们有所得，这就是进攻中的部分退却。所得过少，他们就不愿意来。这里又牵涉到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我

[1] 指资本家对其企业的所有权、用人权和经营管理权。

对他们说：“你们不应唯利是图，而要两利是图，劳资两利，一利不行。”“五反”中进攻得太远了，资本家躺下了，要给他一定的利益叫他起来，这就是百分之二十五的红利。应当说服工人作这个让步，以换得国家资本主义；如果不让这一步，资本家无利可图，无利可得，就不能换得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调整商业后，商业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也退却了，退到三比七^[1]。工业方面还要让一步，才能解决。李立三^[2]同志说灵活运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是对的，但不完全。在我们的社会里，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经济法则，所谓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就是剥削剩余价值，说穿了，就是唯利是图，这一条已经受到了限制。但是现在有些工厂让资本家剥削得太少了，这就不能换来国家资本主义。

三、现在所说的改造，还不是取消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最后改造步骤，而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和合作的、受工人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这种资本主义企业，已经不是解放前的那种资本主义企业，它们主要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资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图。当然，工人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部分利润，在整个盈利中至多占百分之二十五；而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盈利部分，是为国家（所得税）、为工人（福利费）和为扩大企业设备（公积金——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

[1] 这里指全国公营商业和私营商业在零售方面商品流转总额的大体比例。

[2] 李立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是普通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特殊的、新式的资本主义，即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它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有几种程度不同的情况。必须指出，目前不是一切或大多数的资本主义企业已做到了这一步，还需要经过几年努力才可以做到这一步，但是一定可以做到这一步。在国家资本主义中，公私合营是有社会主义成分的，它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把一切国家资本主义，比如接受加工订货，都叫做半社会主义是不妥当的，应该说它是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

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靠什么条件？第一，社会主义的几千个大工厂；第二，农业合作化，要有计划地、稳步地、积极地、自愿地搞互助合作；第三，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条件，包括党组织和工会，加上我们的领导，可以保证企业转到社会主义，取消资本家的所有权，同时把他们安排好。在这里，头一步是变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把独立的、不受限制的、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变为不独立、受限制、没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由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消灭阶级。

四、对私营企业“有所不同、一视同仁”问题。在所有权方面是一视同仁的，工人所得可以自由支配，资本家分到的红利也可以自由支配。在原料供应、贷款、运输等方面，“不看僧面看佛面”，“佛面”是工人阶级，为了工人，对资本家也需要给以必要的照顾。工资待遇一般原则也是“一视同仁”，高的一般不降，低的也不一定都提，要看具体条件和技术水平。“一视同仁”里面还包括资本家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这方面，形式上是每人一票，但因为工人人数多，实际上工人占优势。

五、国家重点搞重工业，但还必须搞地方国营工业（不要盲目

性)，搞国家资本主义，搞手工业合作化。手工业是洋，不是海。手工业一般要有发展，也有一部分要淘汰。搞手工业合作化比农业合作化还要难，这两者又都比搞国家资本主义困难，对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农业不能采用剥夺的办法，因为他们是脚踏实地的劳动者，既不是资本家，下面又没有工人。对于他们，只能经过劝说，启发自愿，准备劝多少年，一步一步地实现。不搞地方国营工业，不搞国家资本主义，不搞手工业合作化，就不能完成重点建设。

六、我们党内有人反映了资本家的一种意见，即国家专搞重工业，轻工业让私人去搞。我们不能采取这种路线，不能是国家搞原料，资本家搞制造。有大批私营轻工业厂要走国家资本主义的路，同时还必须发展地方国营工业，如纱厂、金笔厂等轻工业。人民新增的购买力，要靠国营企业主要是地方国营企业来满足，私营企业只能占去一小部分。国家资本主义也是积累资金的来源之一，如税收等，也可以训练干部、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搞地方国营工业。现在地方工业上缴九万亿元^[1]的利润太高，应降下来，以利地方工业的发展。地方工业上缴利润太多，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就太少了，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七、对“三高”即物价高、利息高、利润高政策的批评，不能过分，要分析。降低工业品价格是工业的根本路线，但是要逐步地降低。物价还是受供求关系制约的。现在的毛病是应降的未降，应提的未提如粮价。糖降价后又脱销了，要提价。降低物价时要谨慎，要按情况用分析的方法解决问题。私商往往会钻物价的空子，

[1] 这里是按当时流通的人民币计算的。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旧人民币。按规定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

而且价格降了再提高就比较难，群众会不满意。因此，不要笼统地批评“三高”政策。要看到物价有高有低，有的今天高，明天应当降，也有明天应当提高的。工资也不能提得过高，提高容易降则难。

八、要有准备地搞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准备则不要搞。搞国家资本主义要有条件，包括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条件。要像过去打仗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干部要就地取材，培养训练工厂的工会主席和支部书记。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变私人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大体上要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完成。

九、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支配下，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领导作用的经济法则。但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则当然存在，不能消灭；事物受了限制，法则也受限制。不执行劳资两利，把它变为一利，就是不了解这个法则。

十、从国营贸易企业批发商品并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的私营零售商，可以也应该算在国家资本主义之内。它是国营贸易的手和足，现在虽然财产还是你的，将来可以改为由国贸企业发薪金。从国贸企业批发商品而又转批发给别人的私商，算不算国家资本主义？我不作定论，由你们去讨论。其他私商，同国营企业没有联系，跑自由市场，自由泛滥的，不能算国家资本主义。

十一、再讨论一次价值法则的问题。看本子看不下去，还是按问题讨论的方式好。九月间把材料整理出来，发至各地。

给黃炎培^[1]的信

(1953年7月30日)

任之先生：

临行一信，近日一信，均已收读。时局好转，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先生读马克思著作有心得，可为祝贺。天热，可在海滨多待一些时候。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七月卅日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答谢马林科夫、莫洛托夫 祝贺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电报

(1953年7月31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同志：

衷心感谢苏联各族人民和您们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之际所表示的祝贺。

朝鲜停战的实现是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伟大胜利。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所作的不懈努力，对于朝鲜战争的结束起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人民将与伟大的苏联人民、英雄的朝鲜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永远团结在一起，为巩固与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的事业而继续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北京

给李济深^[1]的信

(1953年7月31日)

任潮先生：

七月廿八日惠书^[2]，并转来李玉麟、陈文运、丁锦、李炳之、张联棻五位先生的长信^[3]一封，业已收读，甚为感谢，便时尚祈转达五位先生为荷！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七月卅一日

[1] 李济深，字任潮，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2] 指李济深1953年7月28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兹有李玉麟同志等五人，都是我的旧同学、同事。去冬，主席着办失业军人就业，蒙主席照顾，他们都得派在各部服务，生活也得到安定，非常佩服和感激主席。迄届八一建军节，他们在无限感佩中，对于时事作野人献芹的贡献，托代转呈。”

[3] 李玉麟，曾在北洋军阀时期任北洋政府将军府戢威将军。陈文运，曾在北洋军阀时期任北洋政府库伦办事大臣。丁锦，曾在北洋军阀时期任北洋政府陆军部参事。李炳之，曾在北洋军阀时期任北洋政府将军府祐威将军。张联棻，曾在北洋军阀时期任北洋政府参谋本部第三局局长。1953年八一建军节之际，他们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谈了他们对《共同纲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认识和感想。

任深先生
七月廿八日奉书，並請
李玉麟、徐一達、李炳文、
張繼善、任澤生的長信一封，
甚已煩煩，甚而致歉，勿復！
為計付去。不復書。力
頤政之言。
毛泽东
七月廿八日

毛泽东致李济深信的手稿。

关于国营企业中的工资、年终双薪、 年休假问题的批语^[1]

(1953年7月)

- (一) 通过两个文件^[2]，由中央和政务院速发通知。
- (二) 鉴于今年情况，嗣后应依正式命令办事。
- (三) 应充分估计可能发生的不利情况，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党组1953年7月4日关于国营企业中的工资、年终双薪、年休假问题的处理办法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上。除这3条批语外，毛泽东在报告上还批有“计时和计件”“适当照顾农民”“灾荒和朝战”等文字。

[2] 指中共中央1953年7月9日关于国营企业中的工资、年终双薪、年休假问题的指示和中共中央1953年7月30日关于国营企业中的工资和年终双薪问题的宣传指示。中央指示中说，今年国内农村灾情相当严重，截至5月，受灾面积已达一亿一千多亩，灾民有4000余万人，须予以必要的救济；抗美援朝战争虽有暂时停火希望，但停战并不等于获得和平，志愿军还无法迅速撤回，国防费用还不可能有多大减少；加上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必须积累必要资金投入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建设。因此中央决定在国营企业中，不进行全面调整工资，标准工资一般不动，并取消年终双薪（或

年终奖金）制度和暂缓普遍实行年休假制度。中央宣传指示中说：中央决定今年国营企业中不进行普遍的工资调整，并取消年终双薪（或年终奖金）制度和暂缓实行年休假制度，完全是从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出发的。但是由于这些措施使工人群众的一部分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不能得到满足，如果采取简单命令的方法来执行，一定会有许多困难。因此，必须依靠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来贯彻这些措施。只要向所有干部和工人群众进行广泛和深入的宣传解释工作，这些措施的执行就不仅不致引起工人群众的不满，而且能更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和劳动热情。

关于不要劝龙云^[1]献出 其公馆内浮财的批语^[2]

(1953年8月2日)

不但不要劝他献出，他自己愿献，也不要接收，免处被动。

毛泽东

八月二日

[1] 龙云，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齐燕铭1953年7月20日关于龙云在土地改革中的退押赔偿问题的处理意见中以下一段文字旁边：对龙云在其公馆“‘震庄’内所存古玩珍藏汽车等浮财，云南省委统战部意见拟在其自愿原则之下，劝其献给政府。我们认为不动为好，他如愿自己出卖时听之”。

对黄克诚^[1]关于英国商船 要求我护航的报告的批语

(1953年8月4日)

请周^[2]酌处。似只能这样办^[3]。

毛泽东

八月四日

[1] 黄克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2] 周，指周恩来。

[3] 黄克诚1953年8月4日给毛泽东、周恩来的报告中说：据华东军区报告，现有英国轮船数艘因遭蒋军袭击逃至我福建闽江待避，英商要求福建军区护航并准予在我领海内航行。此事经我们考虑，似可通知有关部队，在这些商船遭到袭击，我舰艇和岸炮可能和有把握的情况下，可主动地予以支援。

在中央关于西南文委机关 反分散主义斗争的通报^[1]中加写的话

(1953年8月5日)

报告^[2]中“一切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改为“一切从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出发”，“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均改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改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改为“资产阶级思想”。

[1] 指中共中央1953年8月5日转发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张子意关于西南文委机关反分散主义斗争的基本总结的通报。

[2] 指张子意1953年6月25日在西南文委机关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西南文委机关反分散主义斗争的总结报告。

总政转发中南军区党委关于 召开高干会议检查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1953年8月5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各特种兵、各学院、各学校、各直属部门的党
委和政治部：

兹将中南军区党委会七月九日关于在该军区高干会议上检查工
作的报告摘要^[1]转发你们，其中所提出的问题，极为重要，是全军
所共有的问题。请各军区、各兵种、各部门同样研究这些问题，并
予以解决。中南解决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各处均可参照执行。

军委总政治部

八月五日

[1] 指中共中南军区委员会1953年7月9日关于在高干会议上检查工作的情况给毛泽东并军委、总政治部、中南局的报告的摘要。摘要中说，为了总结与解决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提出出来的一些问题，用以提高领导、教育干部、改进工作、改善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和上下级关系，军区召开了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中提出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意见是：(一) 关于连队工作忙乱与领导问题。造成连队工作忙乱，除工作安排的原因外，还有领导机关作风的问题，即加重连队负担的所谓“五多”(临时任务

多，会议多，指示文件多，向下面要的书面报告、表册统计多，连队组织形式多）。这是各级机关部门不明了下情的一种通病。因此，解决连队的忙乱问题，必须从克服机关部门的主观、片面、急躁，改善领导作风与领导方法着手。（二）关于老战士问题。老战士是连队的骨干，可是现在对待老战士的态度很不好，有错误不教育，进行讽刺打击，有的因年龄大不提拔，不吸收入党。为了纠正这种倾向，对老战士须有一个适宜而积极的政策，使其发挥积极性，成为新兵中传统作风的传播者。对老战士的复员应有计划地分批实施。（三）关于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在工农战士中不信任知识分子和排斥歧视知识分子的风气虽然已经消失，但在干部与领导机关里却没有完全解决，对知识分子仍存有成见，盲目的不予信任。对此已指示各部检查纠正。（四）关于自杀和思想斗争问题。许多领导机关对待自杀事件是很不严肃的，只从自杀者方面找原因，不从领导方面找原因，所以得不出真正的经验教训。通过这次会议的检讨，得出以下几点：第一，对落后分子，要采取循循诱导、逐步改造的方针，不可操之过急。第二，要爱护病人，给病人以关心体贴与勤勤恳恳的照料，反对冷酷无情。第三，对待机关人员中一些不合婚姻法规定的男女间的恋爱关系，要采取适当的办法去处理，不可强行拆散或开会斗争。第四，要使连队干部学会运用思想斗争这个武器去进行思想教育，注意方式和效果。（五）关于军民关系、军队与地方关系问题。部队解除工作队的任务后，同人民同地方的关系逐渐疏远，过去的一些好的制度事实上已经取消或接近取消。必须在部队经常进行依靠人民爱护人民的教育；定期检查纪律，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经常同地方机关联系，征询和听取他们对军队的意见；农忙季节要以必要人力帮助农民劳作。

对周恩来关于中德贸易问题 复格罗提渥^[1]的信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3年8月10日)

—

照办。

毛泽东
八月十日

加了一句^[2]，请考虑是否可以？

—

只是我们感觉帮助的数目太小，这是因为目前中国的情况还有许多困难，不能以更大的数目帮助你们的缘故。

[1] 格罗提渥，当时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

[2] 即本篇二。这句话加在周恩来信中以下一句话之后：“为了中德人民的友谊，为了战胜美国帝国主义和西德法西斯匪徒给德国人民造成的暂时困难，我们认为帮助德国人民是我们的责任，并引以为荣。”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

(1953年8月)

—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

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

[1] 本篇一是经毛泽东审改过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第一次正式的文字表述。这个表述出现在周恩来1953年8月11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中。本篇二是毛泽东审阅周恩来的上述结论时加写的一段文字。本篇三是毛泽东在修改《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加写的一段文字。

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

三

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



毛泽东修改过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的手稿。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1]

(1953年8月12日)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周总理的结论也作得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党内有两种性质的错误。一种是一般性的错误，如“五多”，大家都可能犯，什么时候都可能犯。“五多”的错误也可以变成“五少”的错误。另一种是原则性的错误，如资本主义倾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问题。

“三反”“五反”运动，是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很大打击。但是，当时仅仅给了贪污浪费这方面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基本打击，而对在路线问题上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并没有解决。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不仅财经工作中有，而且政法、文教和其他工作中也有，中央同志中和地方同志中都有。

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

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按照党的总路线，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期的斗争的。

[1] 这是毛泽东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1]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就思想状况来说，党内有三种人：有的同志是坚定的，没有动摇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有一部分同志，基本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夹杂着一些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少数人是不好的，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对薄一波错误思想的批判中，有人说，薄一波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是不妥当的。主要应当批判他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样的批判才是对的。我们说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党内的反映，那是在和资产阶级决裂时期发生的。在和资产阶级合作的三个时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目前这个时期，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了党内一部分人，他们动摇了。薄一波的错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犯的。

薄一波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中央有，在大区和省市两级也有。各大区和省市要开一次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这次会议的结论，检查自己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

最近，我去武汉、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况，很有益处。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外走走。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有的东西，地方上已经制成成品，中央领导机关就可以在全国加以推广。比如老“三反”和新

[1] 张子善，曾担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由于受资产阶级腐蚀，堕落成为大贪污犯，在“三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

“三反”^[1]，都是地方上先搞的。中央各部乱发指示。本来中央各部发出的东西，应当是上品，现在是次品，并且有大量产品根本没有使用价值，大批报废。大区和省市的领导机关，是制造思想产品的地方工厂，也要出上品。

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我们依靠谁？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资产阶级？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早已讲清楚了：“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决议还说，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上，必须确定：国营工业生产第一，私营工业生产第二，手工业生产第三。重点是工业，工业中的重点是重工业，这是国营的。在我国目前的五种经济成份中，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资本主义工商业要逐渐引向国家资本主义。

二中全会决议讲，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不注意这一点，薄一波就是代表。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发展生产上，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福利不可不谋，不可多谋，不谋不行。现在，不顾人民生活，不顾人民死活的干部还不少。贵州有一个团曾经占了农民的大量田地，这是严重侵犯人民利益的行为。不顾人民生活是不对的，但是重点还是要放在生产建设上。

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二中全会也讲得很清楚。决议上说，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社会主

[1] 老“三反”，指1951年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新“三反”，指1953年开展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

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限制和反限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现在，新税制讲“公私一律平等”，这就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的路线。

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二中全会决议分明说：“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使得我们的合作社运动的推广和发展大感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上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这是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当作新闻，其实是旧闻。薄一波写了《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他说：个体农民经过互助合作到集体化的道路，“是一种完全的空想，因为目前的互助组是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到集体农场，更不能经由这样的道路在全体规模上使农业集体化。”这是违反党的决议的。

现在有两种统一战线，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这是基础。一种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农民是劳动者，不是剥削者，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长期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农民是有矛盾的。我们应当按照自愿的原则，把农民由个体所有制逐步引导到集体所有制。将来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

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

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他的错误，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宣传新税制的社论，资产阶级拍掌，薄一波高兴了。关于新税制，他事先征求了资产阶级的意见，和资产阶级订了君子协定，却没有向中央报告。当时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不赞成，轻工业部也不满意。财经贸易系统的一百一十万干部和职工，绝大多数是好的，有少数人是不好的。这些不好的人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应当清除；一部分是犯错误的革命者，包括党员和非党工作人员，应当用批评教育的方法来改造他们。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各大区和省市要在适当时机召集有地委书记、专员参加的会议，展开批评讨论，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

我们现在要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犯过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右的也有“左”的。陈独秀、张国焘是右的，王明是先“左”后右。延安整风的时候，集中反了教条主义，附带反了经验主义，二者都是主观主义。理论与实际不结合，革命就不能胜利。整风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正确的。这次对薄一波实行坚决的彻底的批评，是为了使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进行。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主观主义。急躁冒进或保守，都是不按实际情况办事，都

是主观主义。不反掉主观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不会成功。民主革命时期，对主观主义的错误，用整风的办法解决了，团结了全党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和犯过错误的同志，大家从延安出发，奔赴各个战场，全党一个劲，取得了全国胜利。现在，干部比较成熟了，水平提高了，希望不要用很长的时期，基本上把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反掉，努力使主观与客观相适合。

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是巩固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我们历来是反对分散主义的。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中央给各中央局、各将领发出指示，规定凡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和对内指示，必须事先请示中央。五月间，中央发布了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对外宣传的指示。同年七月一日，在纪念党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中央发布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着重反对分散主义。一九四八年，中央发的反对分散主义的指示更多了。一月七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三月，又发了补充指示。同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作了关于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九月二十日，中央作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中央作了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

集中与分散是经常矛盾的。进城以来，分散主义有发展。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比如，在天安门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拆除北京城墙这些大问题，就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次要的问题，可以由政府部门的党组去办，一切问题都由中央包下来就不行。反对分散主义，是最得人心的，因为党内大多数同志是关心集体领导的。对待集体领导的态度，党内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关心集

体领导。第二种人不甚关心，认为党委对他最好不管，管也可以。“最好不管”是缺乏党性，“管也可以”是还有党性。我们要抓他“管也可以”，对缺乏党性要说服教育。不然，各部都各搞各的，中央管不了各部，部长管不了司局长，处长管不了科长，谁也管不了谁，于是王国甚多，八百诸侯。第三种人是极少数，他们坚决反对集体领导。认为最好永远不管。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强调要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多数服从少数，这个少数是代表多数的）。有意见请提，破坏党的团结是最没有脸的。只有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保证党的队伍的不可动摇的团结一致。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全国有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最后一点，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

要坚忍。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

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是大

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傲，妄自尊大，这是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要在出国人员中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时，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

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总之，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

为祝贺朝鲜解放八周年致金科奉电

(1953年8月12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科奉同志：

值此朝鲜解放八周年之际，请接受我对全体朝鲜人民及您的衷心祝贺。

祝战胜了美国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英雄的朝鲜人民，在努力防止侵略战争之再起和建立和平、统一、独立的新朝鲜的事业中获得伟大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于北京

在中央给罗贵波、 邓一凡^[1]的电报稿上的批语

(1953年8月14日)

退王稼祥^[2]同志照发。第三条中的一句^[3]，应改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革命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
八月即日

[1] 罗贵波，当时任中国驻越南顾问团总顾问。邓一凡，当时任中国驻越南顾问团副团长。

[2] 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3] 中共中央1953年8月14日给罗贵波、邓一凡的电报稿第三条中这句话的原文是：“劳动党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与越南革命实践的结合作为党的一切行动的思想基础和指南针’。”毛泽东审阅时将这句话中的“恩格斯”“斯大林”“及毛泽东思想”等字删去。

在刘景范^[1]来信上的批语

(1953年8月16日)

高岗^[2]同志阅，退刘景范同志。

对此人^[3]要慎重。这类一贯不满我们的人各地都有，如此人没有秘密活动，只是公开表示他的反动意见，还宜先从教育入手，批判他，孤立他。此外，周总理的意见^[4]是值得注意的。

毛泽东

八月十六日

[1] 刘景范，当时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2] 高岗，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3] 指刘景范1953年7月20日给周恩来并转毛泽东的信中谈到的给监委写信的吉林省工业厅某职员。信中说，该职员在信内肆意诽谤和污蔑我党的政策，并提出许多无理要求，显系反革命分子的恶意攻击和破坏活动。据了解，该职员过去参加过三青团和国民党，解放后一贯对共产党不满，拟与公安部协商查处。

[4] 周恩来在刘景范来信上批的意见是：“景范同志：同意你的意见。但此人敢于公开来信，除你所谈的政治背景外，还须注意到他所说某些具体事情，特别显著的是吉林省工业厅管理下的三个从上海迁过去的公私合营工厂问题。”

给叶恭绰^[1]的信

(1953年8月16日)

誉虎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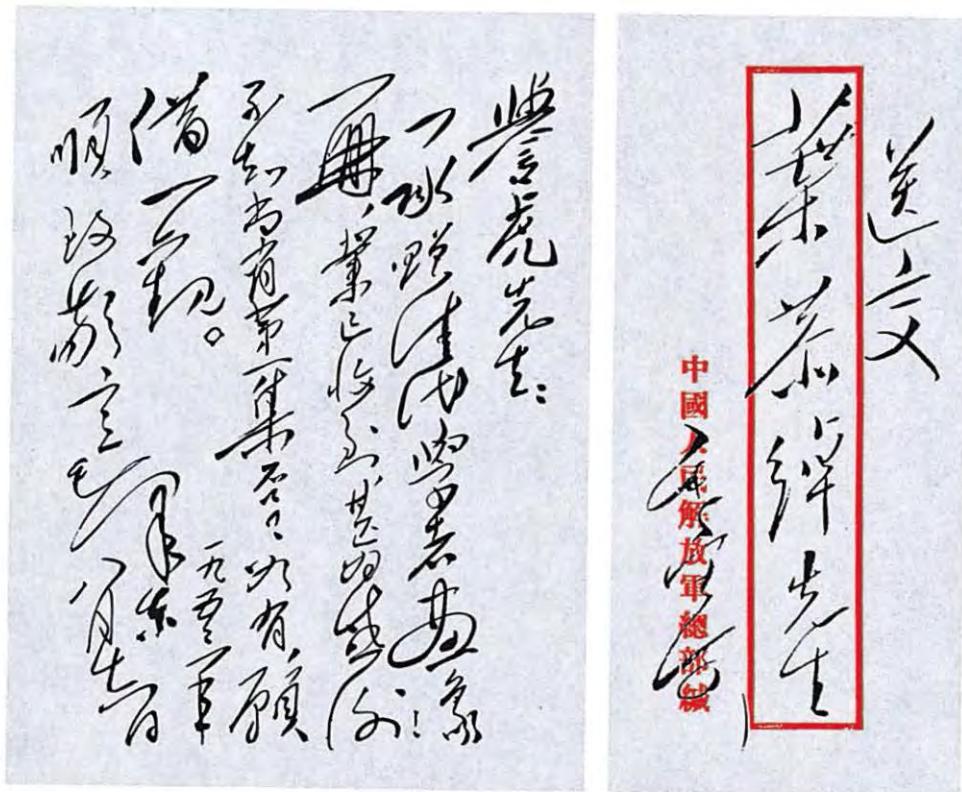
承赠清代学者画像一册，业已收到，甚为感谢！不知尚有第一集否？如有，愿借一观。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六日

[1] 叶恭绰，字誉虎，当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北京中国画院院长。



毛泽东致叶恭绰信的手稿和信封。

关于海军执行运粮任务问题^[1]

(1953年8月17日)

劲光同志：

八月七日电^[2]悉。健康情况好转并已开始工作，甚慰。

关于五舰队运粮任务减免问题，经海司^[3]、粮食部、交通部等单位共同研究后，已本兼顾救灾和海军建设的原则予以解决，即海军在长江中下游运粮的舰艇，再运输一次即解除运粮任务；现在上游尚能担任运粮任务的舰艇，须继续运粮至八月底始可解除运粮任务。以上除已通知有关单位执行外，特告。

毛泽东

八月十七日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的电报。

[2] 指肖劲光1953年8月7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据华东海军报告，他们以五舰队全力担负运粮任务。因为船只损坏严重，华东海军要求将剩余的重庆到宜昌段一万余吨运粮任务减免。请主席考虑，如果情况许可，减免此任务甚好。

[3] 海司，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

对“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 口号的意见^[1]

(1953年8月21日)

但在指出“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这种说法不甚确切时，不要使工人们觉得今后好像只要生产，不要福利了，而要说明这句话不如“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工人的生活”这样说较为确切些。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引用毛主席或中央其他负责同志言论应注意事项的规定》时加写的一段文字。1953年7月22日，中国公路运输工会主席、全总执行委员安力夫给全国总工会党组并中央写信，提出用传为毛泽东讲的“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的口号，来表明生产与福利、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是不够完整不够确切的，提议用“要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工人的生活”来代替这种说法。7月30日，全总党组就此向毛泽东并党中央请示。中央为此做出了上述规定。规定中说：“‘生产长一寸’这句话，毛主席是说过的，而‘福利长一分’这句话，则是别人加上去的，把这两句话连接起来，编成口号，把它当作全是毛主席讲的，加以引证，乃是一种在政治上不严肃的表现。”毛泽东加写的文字紧接在这段文字之后。

征询对告我方被俘人员书的意见^[1]

(1953年8月22日)

金首相：

兹发上告我方被俘人员书草稿^[2]，准备于九月中旬以后由我方解释工作代表带往战俘被看管的地点，发给我方不直接遣返的被俘

[1] 这是毛泽东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的电报。

[2] 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名义发给朝中方面不直接遣返被俘人员的公开信草稿内容是：“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的同志们：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与对方谈判中，根据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一贯坚持在停战后你们有返回各自祖国回家过和平生活的权利，并曾于1952年4月6日发表声明，完全欢迎你们回到祖国怀抱。现在朝鲜停战已经实现，你们返回祖国的时机已经到来。根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职权范围’的规定，任何人都不容威胁你们并阻挠你们实现返回祖国的愿望。我们深切了解你们对于祖国的想念和被俘后的不幸遭遇。你们之中有些人在被拘留期间，被迫在臂上刺过字，写过某种文件，参加过某种组织，在对方战俘营中担任过职务，或有其他类似行为，我们认为这些都不是出于你们的自愿，不应由你们自己负责。我们特此郑重负责宣布：凡我方被俘人员，不管他在对方战俘营中有何种上述行为，回到祖国后，一律不咎既往。一切归国人员，均将与家人团聚，参加祖国建设事业，度过和平生活。兹派代表前来慰问你们，通知你们返回祖国的有关事项，并迎接你们返回祖国。我们和朝中两国全体人民都在关怀着你们，切望你们归来。”

人员。如您同意此稿，请即电复，以便印好备用。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1]

(1953年8月26日)

军事工程学院陈院长^[2]和全体教授、助教、学员、工作人员同志们：

当你们开学的时候，我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在此时机，我并向热诚帮助我们计划和创办这个学院的苏联政府、苏联顾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对于我国的国防事业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业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

向苏联学习，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部门，都应当如此。这点，对于你们这个学院，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学习苏联军事工程建设的丰富经验，学习苏联顾问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学习苏联顾问同志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学习上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

[2] 陈院长，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陈赓。

应该是虚心诚恳，不要学到一点就自满和骄傲。

保持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这在你们的学院，是和全军一样，必须充分领会和一刻也不可忘记的。

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办好学院，尊重顾问，努力学习，为完成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给予你们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对中央转发陕西省委传达 全国财经会议精神的报告 的批语和修改^[1]

(1953年8月27日、30日)

—

少奇同志：

此件^[2]请考虑可否转发各地参考？

毛泽东

八月廿七日

—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

陕西省委关于一九五三年全国第二次财经会议传达的报告很好，特转发给各地党委参考。中央八月二十八日紧急指示^[3]中曾规定关于全国财经会议的传达，时间要短，三天至五天就够，至于详细讨论及检讨本地财经工作，应在春节前后去做。所谓春节前后，

时间是很宽裕的，各地可以自行规定适当时间，以不妨碍今年工作为原则。

中央

一九五三年八月三十日

[1] 本篇二是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转发陕西省委关于传达第二次全国财经会议精神的报告的批语，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2] 指中共陕西省委1953年8月22日关于传达第二次全国财经会议精神给马文瑞并西北局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8月20日省委常委会议上传达了第二次全国财经会议的精神，并讨论了向下传达的内容、方法步骤和时间问题：（一）传达的内容，确定以周恩来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所作的结论、毛主席的讲话精神和几个问题的决议草案为限。（二）在方法上，根据财经会议精神，联系我省实际情况，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出今后意见。在步骤上，首先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进行传达，组织阅读文件，进行综合讨论，然后由省委委员分工主持，分为若干小组，联系文件精神检查工作。而后召开地委书记联席会议进行传达，以便由下而上进一步检查工作，解决存在问题。（三）关于传达时间，省委扩大会议拟于8月25日开始；地委书记联席会议，拟在10月下旬召开。

[3] 指中共中央1953年8月28日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

给李漱清^[1]的信

(1953年8月27日)

漱清先生：

别后来信久已收到，甚谢。乡间情形，便时尚希告我一二。并望保重身体。此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八月廿七日

[1] 李漱清，毛泽东少年时的老师，大革命时期曾协助毛泽东在广州办过《政治周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激。李漱清。別後事多忙，收到甚誠。
鄉間情形，請勿寄告。新
一二。此望你早回。此。震。
順。此。元。年。

毛泽东致李漱清信的手稿。

给毛宇居^[1]的信

(1953年8月2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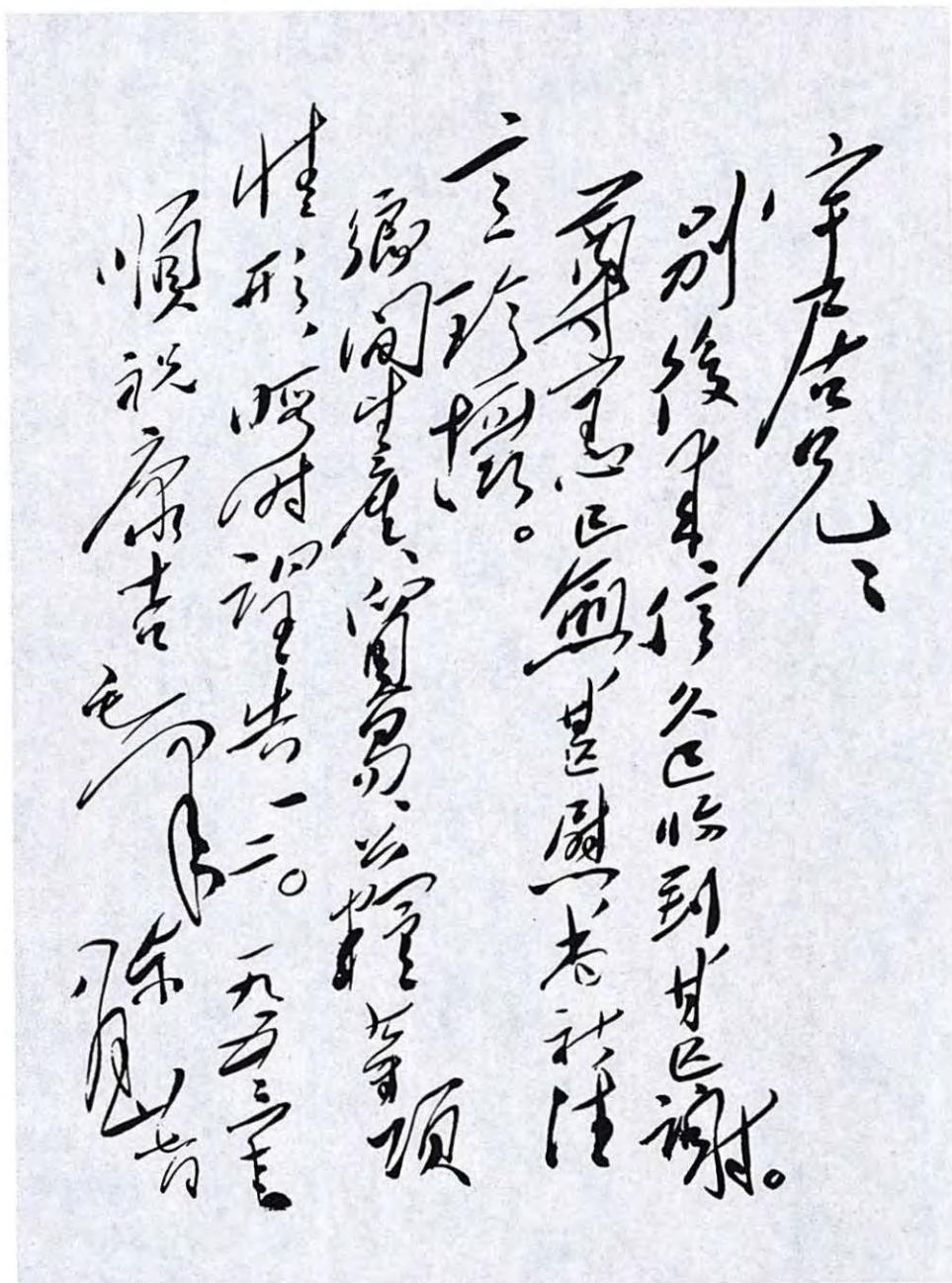
宇居兄：

别后来信久已收到，甚谢。尊恙已愈，甚慰，尚祈注意珍摄。
乡间生产、贸易、公粮等项情形，暇时望告一二。
顺祝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八月廿七日

[1] 毛宇居，毛泽东的堂兄和少年时的私塾老师。



毛泽东致毛宇居信的手稿。

给邹普勋^[1]的信

(1953年8月27日)

普勋兄：

前后数信，均已收到。

托件办妥，甚慰。

你的病宜静养，不宜劳作，望加注意。

致李漱清、毛禹居^[2]两位的信，烦便时转交为盼！

顺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八月廿七日

[1] 邹普勋，毛泽东少年时的私塾同学和邻居。

[2] 李漱清，毛泽东少年时的老师，大革命时期曾协助毛泽东在广州办过《政治周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毛禹居，即毛宇居，毛泽东的堂兄和少年时的私塾老师。

在审阅中央关于增加生产、 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 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稿时 加写的话

(1953年8月28日)

中央各部委党组与各级党委，收到本指示后，望在十天内传达到各有关系统一切适当单位的负责同志，使他们一体知晓坚决执行，并望从九月十五日起，每半月将执行情况扼要上报中央一次，今年共须有七次报告。

缩短主观主义时间的办法^[1]

(1953年)

缩短主观主义时间的办法

- (1) 批判分散主义，实行集体领导。
- (2) 将各财经、文教、政法部门一个一个列入议程，加以讨论，作出决定，每次都要有简的文件，每年每一部讨论两次。
- (3) 主要干部亲到现场检查工作。

[1] 初步分析，毛泽东这篇手稿写于1953年6月至8月全国财经会议期间。

为公安部队首届功臣模范 代表大会题词^[1]

(1953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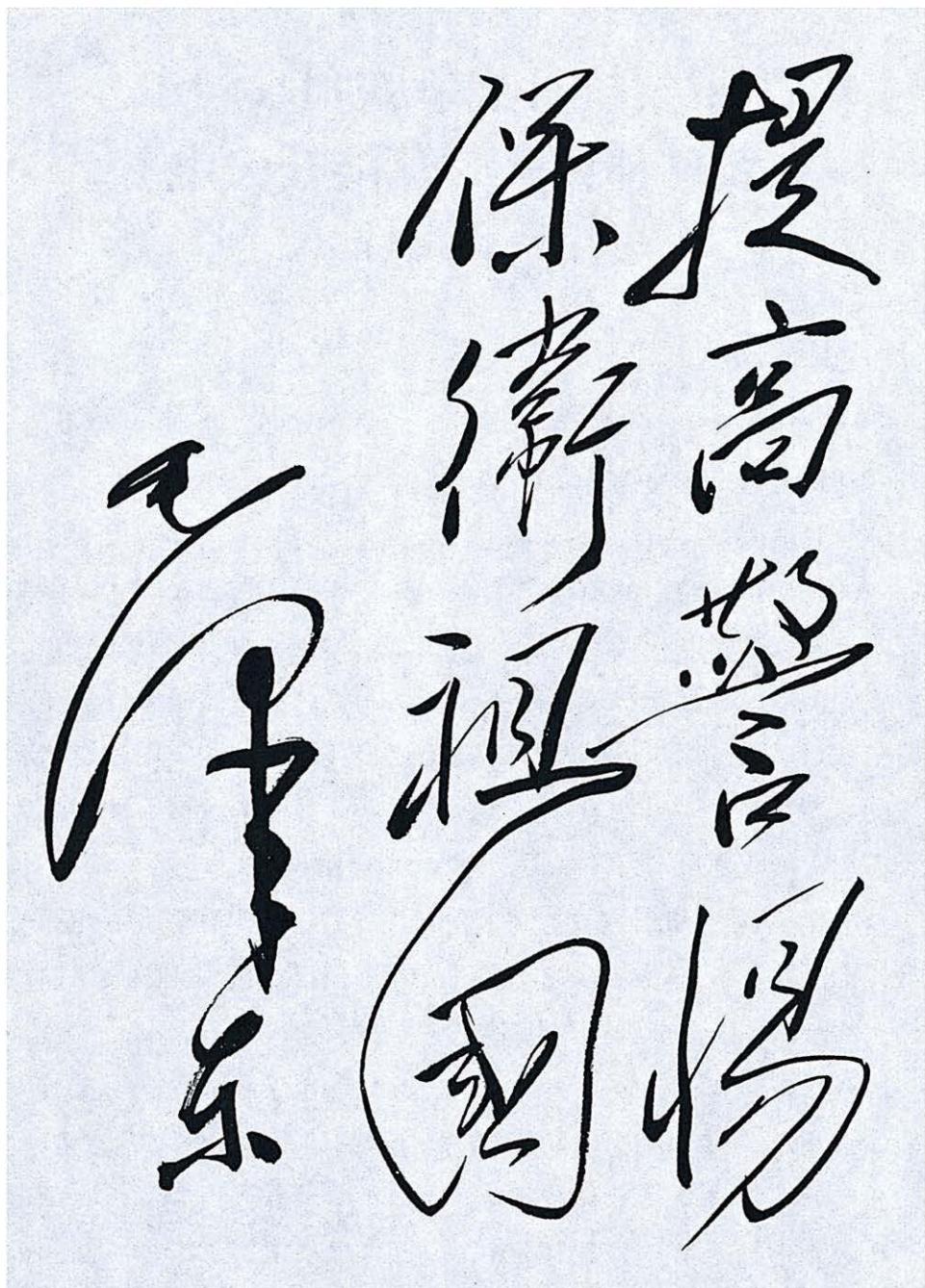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毛泽东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宣传画）

[1] 这是毛泽东为1953年8月10日开幕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大会题的词。



毛泽东为公安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大会的题词。

为祝贺抗日战争胜利八周年 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电

(1953年9月2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同志：

当此抗日战争胜利的第八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武装部队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长期艰苦战争中以及在最后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中，自始至终获得了苏联人民的支持和援助。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因为苏联武装部队的参战，和中国人民一起，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国与苏联牢不可破的友谊已经并正在日益巩固和发展。这种伟大的友谊现在已成为远东和平与世界和平的坚强保证。

在这里，我们还要提到的，就是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帮助，乃是中国经济迅速恢复和走上有计划建设道路的重要因素。

最近，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显然是整个和平民主阵营在争取和平、制止新战争的努力中所获得的新的重大的成就。这一新的重大的成就业已有助于整个世界形势的开始和缓，同时，也将有助于日本人民要求与远东各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努力，以便防止日本帝国

为祝贺抗日战争胜利八周年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电

主义侵略之再起。

中苏两国在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正义事业中永久合作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日于北京

对陈云^[1]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六次 会议上的报告要点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3年9月4日)

—

预算的收支基本仍是正确的。^[2]

—

政策与任务必须一致，此点继续执行不变。^[3]

—

但是所谓工业为重点，并不是说对目前的民生不加照顾，相

[1] 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2] 这个批语写在陈云报告要点中“关于财政预算方面的错误、缺点”一段文字的上方。

[3] 这个批语写在陈云报告要点中“关于修正税制办法中的错误”一项的上方。

反，是应当照顾的。^[1]

四

有什么阶级存在，就有什么阶级的思想。^[2]

五

我们的一切工作，围绕一个总目的，这就是要达到：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在正确地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过程中，稳步地完成过渡时期建设和改造我们国家的伟大任务，即是说，我们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须要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发扬正确的思想，批判错误的思想。只要我们大家了解，做法适当，我们是有信心逐步地完成这个任务的。^[3]

[1] 这段文字，加写在陈云报告要点中以下一段话之后：“目前的重点只能放在国家工业建设，只有走这条路，达到改善民生的目的会更快些。”

[2] 这段文字，加写在陈云报告要点中以下一段话之后：“这并不是否认目前存在着的中国资产阶级有他们自己一套的资产阶级思想。”

[3] 这段文字，加写在陈云报告要点的末尾。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

(1953年9月7日)

(1) 过去三年多，做了一些工作，但忙别的去了，用力不多，现在起要多做些工作。

(2) 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

(3) 《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1]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4) 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

(5) 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订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三种形式。

[1] 《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

(6) [私营] 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

(7) 占有大约三百八十万工人、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

(8) 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有一个表：

所得税 34.5%

福利费 15%

公积金 30%

资方红利 20.5%

[总计] 100.0%

(9) 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

(10) 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11) 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了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三年至五年，这种进步将更

大，所以三年至五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国营企业的优胜，则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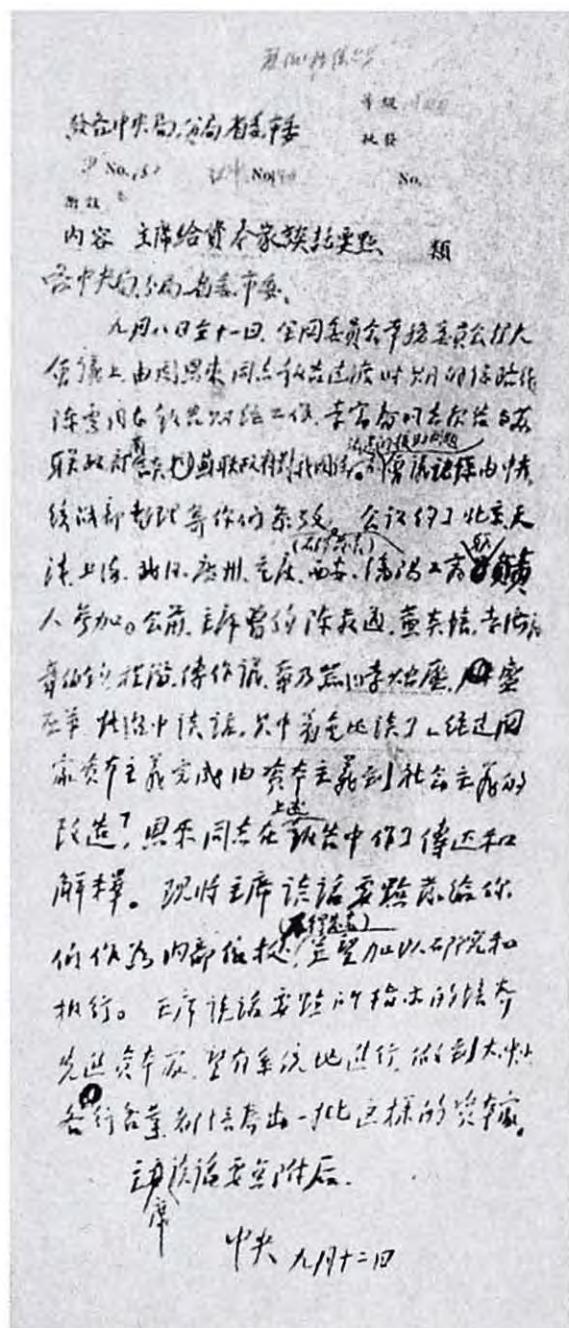
(12) 没有所谓“小五反”，也没有所谓“突然”，这点应当说清楚。

(13) 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14) 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⑩，因此可以和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

(15) 现在多数公私合营厂的缺点（主要是资方无权和不发红利）必须改正，否则将阻塞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学民生公司的榜样。

[1] 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是从走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私营工商业来说的。



中共中央批发的毛泽东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的谈话要点通知。

给文润泉^[1]的信

(1953年9月8日)

润泉兄：

惠书收到。

承告乡情，甚谢。

来京及去上海等地游览事，今年有所不便，请不要来。赵某^[2]求学事，我不便介绍，应另想法。此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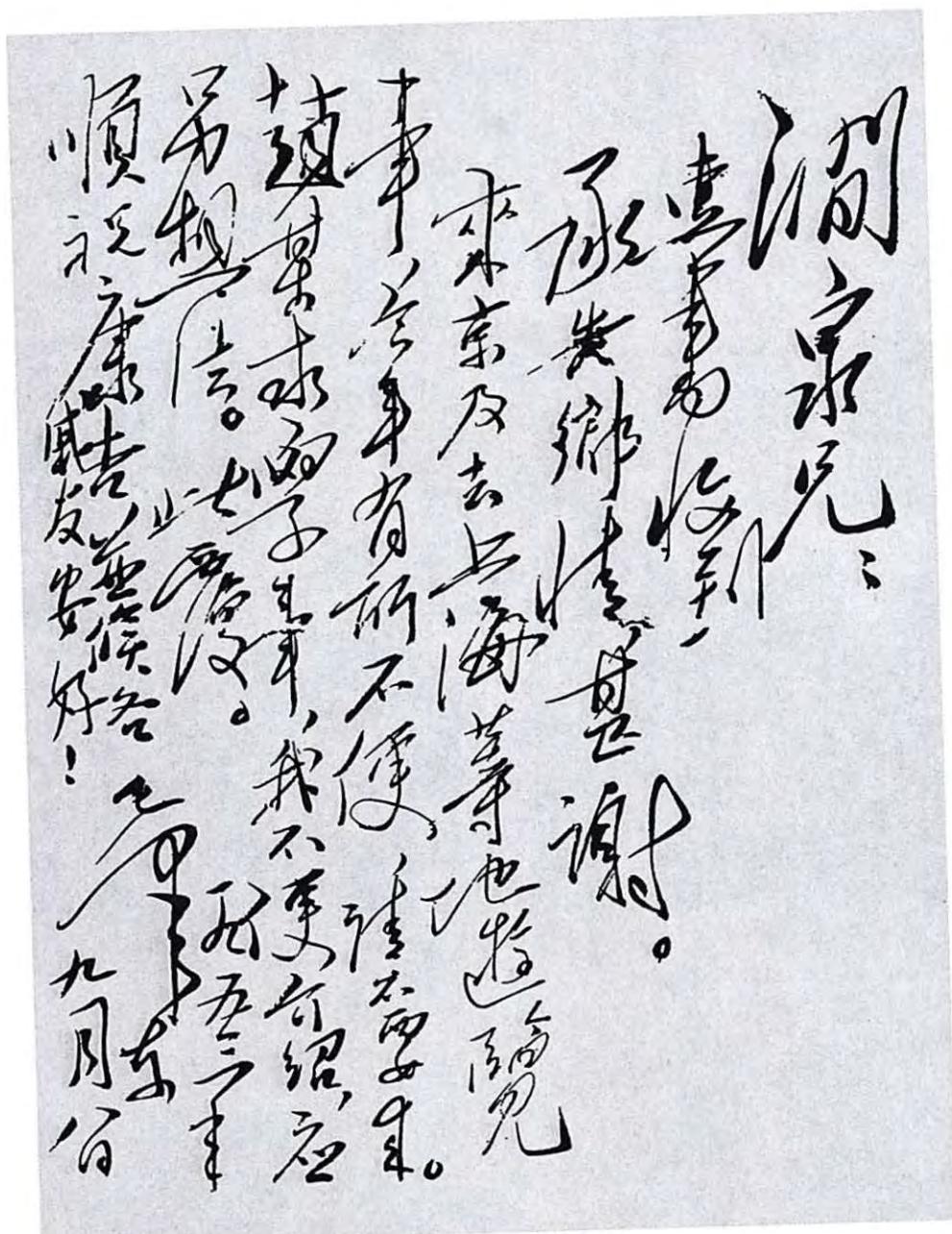
顺祝康吉，并候各戚友安好！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

[1] 文润泉，毛泽东的表兄。

[2] 赵某，可能是毛泽覃的妻子赵先桂的亲属。



毛泽东致文润泉信的手稿。



1953年，毛泽东和外祖文家表兄嫂等在中南海合影。

给张四维^[1]的信

(1953年9月8日)

四维兄：

八月十七日的信收到。

有成^[2]兄病逝，深为悼念。

你来京事，今年仍不要来，将来再说罢。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

[1] 张四维，毛泽东少年时的邻居。早年曾同毛泽东一起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农民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在湖南省盐务运销局工作。

[2] 有成，即张有成，张四维的表兄。早年曾同毛泽东一起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农民运动。1952年在湖南逝世。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上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报告提纲

(1953年9月)

英雄的人民战争。

(1) 能不能打? (2) 能不能守? (3) 能不能保证供应? (4) 能不能打败细菌战。

胜利: (1) 三八线; (2) 军事经验; (3) 政治觉悟; (4) 推迟了大战的时间。如敌人再要打, 我们现在就更可以打了。

一件事不做则已, 做则必做到底, 做到最后胜利。

死人, 用钱。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1]

(1953年9月12日)

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

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

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国侵略军却怕死，他们的军官也比较呆板，不那么灵活。他们的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

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

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不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一百零九万人。当然，我们也付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我

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今后，敌人还可能打，就是不打，也一定要用各种办法来捣乱，比如派遣特务进行破坏。他们在台湾、香港和日本这些地方，都设有庞大的特务机构。可是，我们在抗美援朝中得到了经验，只要发动群众，依靠人民，我们是有办法来对付他们的。

我们现在的情况，同一九五〇年冬季的情况不同了。那时候，

美国侵略者是不是在三八线那边呢？不是，他们是在鸭绿江、图们江那边。我们有没有对美国侵略者作战的经验呢？没有。对于美国军队熟悉不熟悉呢？不熟悉。现在这些情况都变了。如果美帝国主义不推迟新的侵略战争，他说，我要打！我们就用前三条对付他。如果说，我不打了！那末我们就有了第四条。这也证明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

我们是不是去侵略别人呢？任何地方我们都不要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

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踊跃报名参军。对报名参军的人挑得很严，百里挑一，人们说比挑女婿还严。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

打仗要用钱。可是，抗美援朝战争用的钱也不十分多。打了这几年，用了还不到一年的工商业税。当然，能够不打仗，不用这些钱，那就更好。因为现在建设方面要用钱，农民的生活也还有困难。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说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像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我们赞成不赞成这种意见呢？我们是不赞成的。当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农民说来，对全国人民说来，是生活暂时困难一点，争取胜利对他们有利，还是不抗美援朝，不用这几个钱对他们有利呢？当然，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他们有利。去年和前年，我们多收了一点农业税，就是因为抗美援朝要用钱。今年就不同了，农业税没有增加，我们把税额稳定下来了。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

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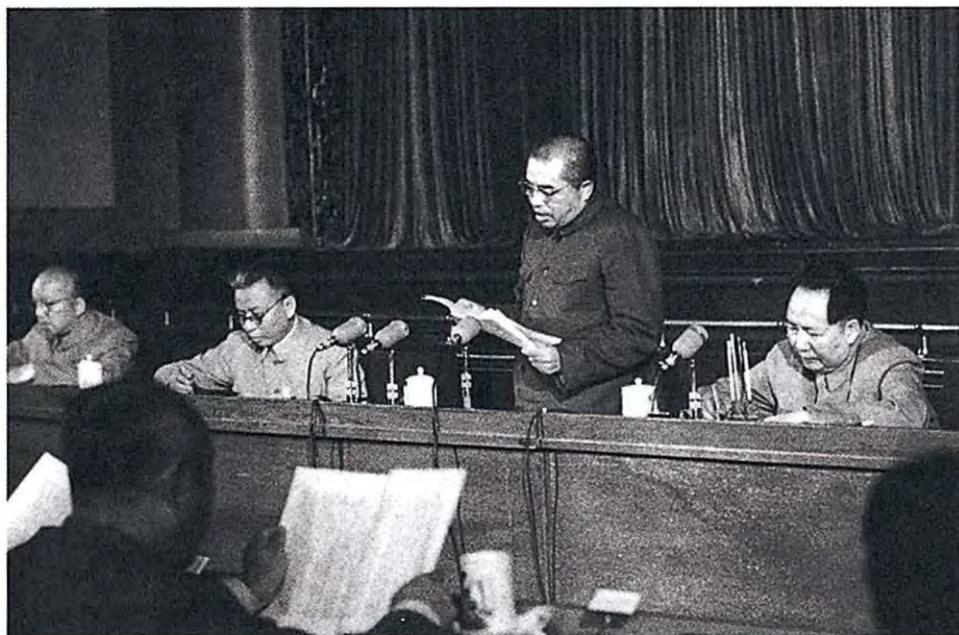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这种思想共产党里边也有，在延安就碰到过。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征了二十万石公粮，一些人就哇哇叫，说共产党不体贴农民。共产党的个别领导干部也提出所谓施仁政问题。那时我就批评了这种思想。当时最大的仁政是什么呢？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少征公粮，就要缩小八路军、新四军，那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的。所以，这种意见，实际上是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帮日本帝国主义忙的。

现在，抗美援朝已经告一段落，如果美国还要打，我们还是打。要打就要征粮，就要在农民中做工作，说服农民出点东西。这才是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哇哇叫，实际上是代表美帝国主义。

道理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每年应当提高一步，但是不能提得太高。如果提得过多，抗美援朝战争就不能打了，或者不能那样认真地打。我们是彻底地认真地全力地打，只要我们有，朝鲜前线要什么就给什么。这几年，我们就是这样干的。



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



1953年9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



《探索》(中国画)

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慰问电^[1]

(1953年9月12日)

彭德怀司令员并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听取了彭德怀司令员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对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抵抗侵略，保卫和平的辉煌战绩及在这个基础上坚持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停战谈判，并获得朝鲜停战的光荣胜利，表示完全满意。中央人民政府感谢你们在这一正义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并对你们致热烈的祝贺和慰问。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五日，正在美国侵略军大举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逼近我国东北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严重地威胁我国安全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地开往朝鲜，支援朝鲜人民军抵抗美国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在两年零九个月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秉承着祖国人民的意志，与朝鲜人民军一道，在中朝人民的全力支援之下，在以伟大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各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热烈同情和支持之下，顽强战斗，坚持谈判，终于打退了敌人的疯狂侵略，揭露了敌人残暴好战的真面目，使敌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道义上都遭受了严重失败而不得不接受停战。中国人民志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慰问电。

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的业绩，树立了中朝人民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光辉榜样，表现了我们和平民主阵营的坚强团结和不可战胜的力量，赢得了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尊敬和赞誉。

朝鲜停战的胜利，根本粉碎了美国帝国主义并吞全部朝鲜进而侵略我国东北的狂妄计划，保卫了中朝两国及远东的和平与安全，打败了侵略者的凶焰，大大鼓舞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争取持久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勇气和信心。中国人民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及其军队一道，以自己的胜利的榜样向全世界人民昭示了一个真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阴谋是必须击败和能够击败的；只要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侵略战争，坚持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际问题的争端，那么，和平就一定能够得到保证。

朝鲜停战的胜利，是全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运动的胜利。但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还只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问题在朝鲜人民自己处理自己问题的精神下的和平解决，尚有待于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去协商解决。中国人民是一贯主张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中国人民愿为和平解决国际问题做坚强的后盾。

鉴于美国好战分子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正在进行着种种预谋，企图阻挠和破坏政治会议，并进一步破坏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全体同志必须提高警惕，继续努力，提高军事政治水平，加强战斗力量，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更紧密地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坚守阵地，防止来自对方的任何侵袭和挑衅行动。

全国人民将以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加强国防力量，继续深入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将尽力来帮助英雄的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平生活。

我们深信：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同志在祖国人民的鼓舞和支持之下，必能不负祖国人民的期望，为保障朝鲜停战协定的彻底实施，为争取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为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而继续努力！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中朝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永久友谊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



1953年9月，毛泽东和李讷一起赏荷花。



1953年9月，毛泽东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扑克牌。

关于感谢苏联政府 援助我国经济建设的电报^[1]

(1953年9月15日)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五日举行的会议上，满意地听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代表李富春同志所作的关于与苏联政府商谈苏联政府对我国经济建设援助问题的报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致认为，由于伟大的苏联政府同意在建设和改建中国的九十一个企业以及正在建设和改建的五十个企业中给以系统的经济的和技术的援助，中国人民将能够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和最新技术成就的努力之下，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重工业，这对于中国工业化、使中国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壮大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

[1] 本篇一是毛泽东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的电报，对苏联政府援助我国经济建设表示感谢。本篇二是毛泽东给张闻天的电报。

两个国家在一次商谈中解决了九十个企业的建设问题，解决了长期的援助问题，这在历史上是创举，完全体现了伟大的斯大林所说的真理：“这个合作的经验表明，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像苏联那样给予各人民民主国家以真正的帮助和技术精湛的帮助。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帮助是极度便宜的，技术上是头等的。问题首先在于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

在商谈过程中，苏联政府根据它三十多年来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对于我国五年计划任务提出了各项原则的和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将帮助我们在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尽可能地避免许多错误和少走许多弯路。

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于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这种伟大的、全面的、长期的、无私的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愿以自己的不懈的努力来加强苏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和友好同盟，以利为世界和平事业的共同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五日于北京

—

张闻天^[1]同志：

今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以我的名义致马林科夫同志关

[1] 张闻天，当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于感谢苏联政府援助我国建设问题的电文，现随电发去。请你面见马林科夫同志，并以中文为正本，俄文为副本亲递上述电报，以资郑重。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五日

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1]

(1953年9月16日至18日)

(一) 梁漱溟先生是不是“有骨气的人”？他在和平谈判中演了什么角色？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榘、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交代嘛！他们都是你的密切朋友，我就没有这么多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哪一党哪一派！不仅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

从周总理刚才的发言中，大家可以看出，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蒋介石同意和平谈判是假的。今天在座的还有来北京和谈的代表，他们都知道蒋介石的“和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对梁漱溟的批判的一部分。这次会议于1953年9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列席了这次会议。

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二) 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人民政府是否能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

(三) 梁先生“要求多知道一些计划的内容”。我也不赞成。相反，对于梁先生这种人，应当使他少知道一些机密，越少越好。

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让别人多知道一点机密，对你就不行。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的会议，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参加。

(四) 梁先生又要求我们不要把他划入不进步的一类，相反，他是属于进步一类的人。对于这一点怎么办呢？我以为应当谨慎，不可轻易答应。否则就要上当。

(五) 梁先生把他自己的像画得很美，他是在几十年前就有计划建国的伟大梦想，据他自己说，很接近于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

果然这样美吗？不见得。我同他比较熟，没有一次见面我不批评他的错误思想。我曾当面向他说过，我是从不相信你那一套的。

什么“中国没有阶级”，什么“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什么“无色透明政府”^[1]，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这回又听见什么“九天九地”的高论，什么“共产党丢了农民”“共产党不如工商联可靠”等等高论，这一切能使我相信吗？不能。我对他说过：中国的特点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你不承认这点，你就帮助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以，什么人也不相信你那一套，人民都相信了共产党，你的书没有人看，你的话没有人听，除非反动分子，或者一些头脑糊涂的人们。他好象也不反蒋，究竟梁先生有没有公开表明过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的国民党，我没有看过或听过他的所有文章和谈话，请大家研究。

对于这样的人，有资格要求人民的国家让他与闻更多的计划和机密吗？我看是没有这种资格的。我们应当允许他的这个要求吗？我看是不应当允许的。

(六) 梁先生又提出要求，要我们把他划入进步派或革命派一类，而不要把他划入不进步派，或者反动派一类。这是一个“划成份”的问题，怎么处理呢？在上述那种情形之下，我们能够把他划入进步或革命类型吗？他的进步在哪里？他哪一年参加过革命？因此，这个要求也不宜轻易答应，看一看再讲。

(七) 几年来，我接到一些人民来信，也听到一些谈论，提出了一个问题：共产党为什么和反动分子合作呢？他们所谓反动分子，是指那些从来不愿意在报纸上和公开场所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国民党，没有当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起码的立场的人。这些人特别不愿意反对蒋介石，所以台湾的广

[1] 梁漱溟的所谓“无色透明政府”就是宣扬政府不能带有党派色彩，应当成为超阶级的“无色透明体”。

播和香港的报纸对于这些人特别表示好感，从来不骂，而且说是在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其中就有梁漱溟。而对有些朋友则放肆地污蔑谩骂。被台湾不骂，或者吹捧的人，当然是少数，但是很值得注意。

有一些人，直到现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话他还可以说，反对蒋介石的话，死也不肯说出来。在报纸上，在公开的言论中，他就不敢讲过去，对于过去还有一面之情。这样的人，我看相当有几个。

爱国主义有三种：一种是真爱国主义，一种是假爱国主义，一种是半真半假、动摇的爱国主义。各人心中有数，梁漱溟的心中也是有数的。真正同帝国主义和台湾方面断绝关系的，不管他怎样落后，我们也欢迎。这一类是真爱国主义。假爱国主义，外面装得那么隐蔽，里头是另一套。还有一种，是动摇分子，半真半假，看势办事。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打，蒋介石不来，那末，就跟共产党走下去。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他就另打主意。多数人是哪一种呢？多数人是真爱国主义。几年来，真爱国主义多了起来；半真半假的，有一小部分；假爱国主义是很少的，但是有。这个分析究竟恰当不恰当，大家可以研究。

(八) 我认为梁漱溟应当做一件工作。这件工作不是由他“代表农民”向人民政府“呼吁解放”，而是由他交代清楚他的反人民的反动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过去是怎样代表地主反共反人民的，现在又如何由代表地主的立场转到“代表农民”的立场上来了，他能说明这个变化过程，并使人们信服，那时方能确定究竟应当把他归入哪一类。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从来不考虑改变他的反动立场的。但我建议，为着治病救人，应当给他一个反省的时间，并把这件事移交给政协去做。此次不做结论。

(九)“羞恶之心，人皆有之”^①，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意味。他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还不滑稽吗？

出了这么多的“农民代表”，究竟是代表谁呢？是不是代表农民的呢？我看不象，农民看也不象。他们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是帮地主阶级忙的。其中最突出的，花言巧语的，实际上帮助敌人的，是梁漱溟。其他有些人是思想糊涂，说了一些糊涂话，但他们还是爱国主义者，他们的心还是为了中国，这是一类。梁漱溟是另一类。还有跟梁漱溟差不多的人，冒充“农民代表”。冒充的事，实际上是有，现在就碰到了。那些人有狐狸尾巴，大家会看得出来的。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十) 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是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因此，我提议移交政协双

[1] 参见《孟子·告子章句上》。

周座谈会去讨论这个问题，同时我又要警告诸位，切记不可以认为真正有解决问题的希望。决不可能的，结果还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无结果而散”。虽然如此，我还是劝大家举行双周座谈会试一试看，这比“派两个人”去听他说教要好。

(十一) 我们是不是要借此机会和他绝交，从此不和他来往了呢？也不。只要他自己愿意同我们来往，我们还是准备和他来往。在第二届政协全会上，我还希望他当选为委员。其原因是：因为还有一些人愿意受他的欺骗，还不了解他，他还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所以他还有资格当选为委员，除非他自己不愿意借政协的讲坛散布他的反动思想了。

前面我讲了，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个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

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十二) 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

的精神，有点像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1]“三盈三虚”^[2]“三月而诛少正卯”^[3]，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

（十三）照梁先生提高的纲，中国不但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且要亡党（共产党及其他）亡国。他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但薄一波比梁漱溟好。

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事实如何呢？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还有困难。用什么办法来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梁漱溟有办法吗？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4]。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这个亡党，你们不要以为仅仅是亡共产党，民主党派也有份。

你说工人在“九天之上”，那你梁漱溟在哪一天之上呢？你在十天之上、十一天之上、十二天、十三天之上，因为你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资多得多嘛！你不是提议首先降低你的薪水，而是提议首先降低工人的工资，我看这是不公道的。要是讲公道，那要首先降低你的薪水，因为你不只是在“九天之上”嘛！

我们党讲了三十几年工农联盟。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讲工农联

[1] 参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2] 参见王充《论衡·讲瑞》。

[3] 参见《史记·孔子世家》。

[4] 参见《论语·季氏第十六》。

盟，工农合作。中国现在有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资本家、大学教授、高级技术人员、起义将军、宗教首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盟。这两种联盟都是需要的，而且要继续下去。哪一种联盟是基础，是最重要的呢？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是基础，是最重要的。梁漱溟说，工农联盟破坏了，国家建设没有希望了。就是说，如果不采纳梁漱溟的意见，就没有希望搞好工农联盟，就办不好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没有希望了！梁漱溟所说的那种“工农联盟”，确是没有希望的。你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实行你的，结果就要亡国，中国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北京就要开会欢迎蒋介石、艾森豪威尔。我再说一遍，我们绝不采纳你的路线！

梁漱溟说，我们进了城市，“忘掉”了农村，农村“空虚”了。这是挑拨。过去三年，我们的主要力量是放在农村工作方面。今年，大批的主要干部才开始转到城市工作方面来，但是，大多数干部还是在县、区、乡工作。怎么能说我们忘掉了农村呢！

梁漱溟又攻击我们的农村工作“落后”，下级干部“违法乱纪”。现在乡村里面，所谓落后乡确是有的。有多少呢？只有百分之十。为什么落后呢？主要是因为反动分子、宪兵特务、会道门头子、流氓地痞、地主富农混进来当了干部，把持了乡村政权，有些人还钻到共产党里来了。在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当中，这些人占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其他还有些是蜕化变质的干部。所以，在落后乡，主要是打击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对于蜕化变质的干部也要清理。在全国，好的和比较好的乡是多少呢？是百分之九十。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心中有数：不要上梁漱溟的当。

（十四）是不是拒谏饰非呢？如果梁先生的这类意见也可以称作

“谏”，我声明：确是“拒谏”。饰非则不是。我们是坚持无产阶级对于一切问题的领导权（工人，农民，工商业者，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民众团体，工业、农业、政治、军事，总之一切），又团结，又斗争。如果想摸底，这又是一个底，这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底。是一件小事吗？

（十五）他的问题带全国性，应照薄一波的问题一样，在全党和全国去讨论。找典型，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全国讨论总路线。

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梁漱溟，我们实行哪一条呢？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批判梁漱溟，不是对他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他代表的这种反动思想。梁漱溟是反动的，但我们还是把他的问题放在思想改造的范畴里头。他能不能改造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可能他是不能改造的。不能改造也不要紧，就是这么一个人嘛！但是，同他辩论是有益处的，不要以为是小题大作，不值得辩论。跟他辩论可以把问题搞清楚。要说他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现在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我们大家是有益处的。



1953年9月，毛泽东接见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



1953年，毛泽东和新华社记者王波清在一起。

对军委办公厅摘要报送空军安全会议 情况报告的批语^[1]

(1953年9月20日)

这种摘要办法很有用。

毛泽东
九月廿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1953年9月18日给毛泽东、彭德怀的报告上。报告说：“空军党委1953年9月10日关于空军安全会议情况报告，已经直呈。因原文较长，兹送上一份摘要。”

悼念布曼增迪^[1]的电报

(1953年9月24日)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

我以悲痛的心情获悉冈奇金·布曼增迪同志逝世的消息。冈奇金·布曼增迪同志是蒙古人民革命运动杰出的战士、乔巴山元帅的亲密战友，他为蒙古人民的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生命。

冈奇金·布曼增迪同志的逝世是蒙古人民的重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并以我自己的名义，谨向您们，并通过您们向蒙古人民致最深切的哀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于北京

[1] 布曼增迪，即冈奇金·布曼增迪，逝世前任蒙古人民革命党政治局委员、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

在朱德总司令国庆阅兵 命令稿上加写的话

(1953年9月26日)

我国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之间的友谊，亦已有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

在世界范围内，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我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亦正在一天一天地发展着。

这一切都证明，在国际上我们不是孤立的。

关于阅处高岗^[1]起草的 致苏联政府文件的批语

(1953年9月27日)

周总理：

此件^[2]是高岗同志根据他于今年去苏时和苏联当局的谈话起草的一个致苏联政府的文件，请你加以审查，以说帖方式，于你休假以前，交与库大使^[3]，请他转致苏联政府。

毛泽东

九月廿七日

[1] 高岗，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2] 指高岗起草的给苏联政府的文件。主要内容是对1952年8月11日签订的《苏联在1953年至1955年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恢复与改建鞍山钢铁公司方面以技术援助的议定书》所规定的设计和设备交付期限，提出我方的意见，请苏联政府予以考虑，以便我国于1956年和1957年相当地增加轧钢能力，并基本上消灭炼钢能力和轧钢能力的不平衡现象，从而保证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钢材的供应。

[3] 指苏联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

关于一切文电必须将发文 年月日写齐的批语^[1]

(1953年9月27日)

彭^[2]，并告肖向荣^[3]同志：

(一) 此件^[4]照办。(二) 军委及所属各部门各系统文电，至今仍只写月日，不写年份，仅见刘少文写的这个电报，写了“一九五三”，也缺一个“年”字。请你们通知所属，嗣后一切文电均必须将发文年月日写齐，不可只写月日，不写年份。

毛泽东

九月廿七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四部代部长刘少文1953年9月23日关于西藏地区某些机构精简问题给彭德怀并报中央的报告上。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3] 肖向荣，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4] 指刘少文为中共中央及军委起草的1953年9月27日关于西藏地区某些机构精简问题给西藏工委并西南局、西南军区的电报。

给沈钧儒^[1]的信

(1953年9月27日)

沈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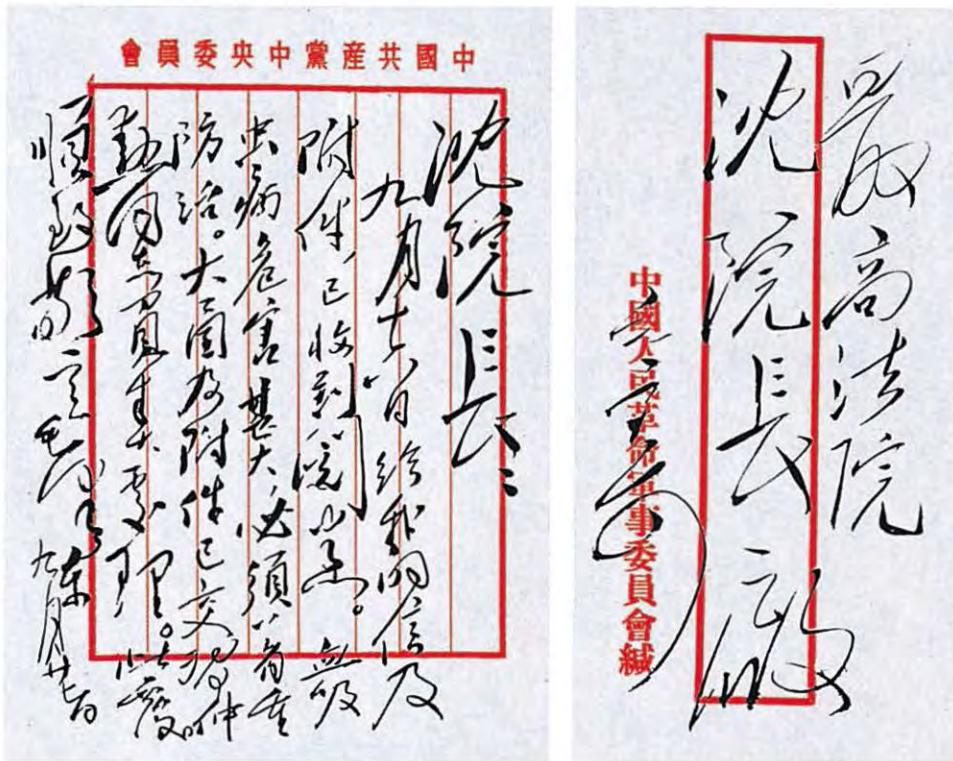
九月十六日给我的信及附件，已收到阅悉。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2]同志负责处理。此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九月廿七日

[1] 沈钧儒，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 习仲勋，当时任政务院秘书长兼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毛泽东致沈钧儒信的手稿和信封。

给易礼容^[1]的信

(1953年9月27日)

礼容兄：

杨家^[2]生活问题，待接到杨开智^[3]兄的信以后，可以由我处解决。淑一^[4]能间〈经〉常去去看视两位老人^[5]则更好。

毛泽东

九月廿七日

[1] 易礼容，早年加入新民学会，曾和毛泽东等一起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并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劳工部部长。

[2] 指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娘家。

[3] 杨开智，杨开慧之兄。

[4] 淑一，即李淑一，杨开慧的同学。当时在湖南长沙福湘女中任教。

[5] 两位老人，指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和向振熙的姐姐。

关于更改拖拉机厂、矿山机械厂 厂址问题的批语^[1]

(1953年9月28日)

刘、周、朱、陈、邓^[2]阅，退李富春同志办。

同意改在郑州地区。军事方面在洛阳建设营房，亦应注意维护古物。

毛泽东

九月廿八日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副主席李富春、贾拓夫1953年9月6日关于拖拉机厂、矿山机械厂的厂址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上。报告中说，委托苏联设计的拖拉机厂及矿山机械厂，过去中央曾决定其厂址在洛阳，但据第一机械部派人至当地调查后报称：洛阳为古墓葬群之地，内战时军阀土匪又在当地挖过许多地道、地洞和地下仓库。因此，对厂房基础极为不利，不宜建厂。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召集有关部门研究后，也认为该地是极重要的古文化遗址，应予保护。因此建议在郑州附近另选厂址。后因郑州水位高、风沙大等，仍去洛阳选址。1954年2月22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发文，正式决定拖拉机厂在洛阳市涧河西部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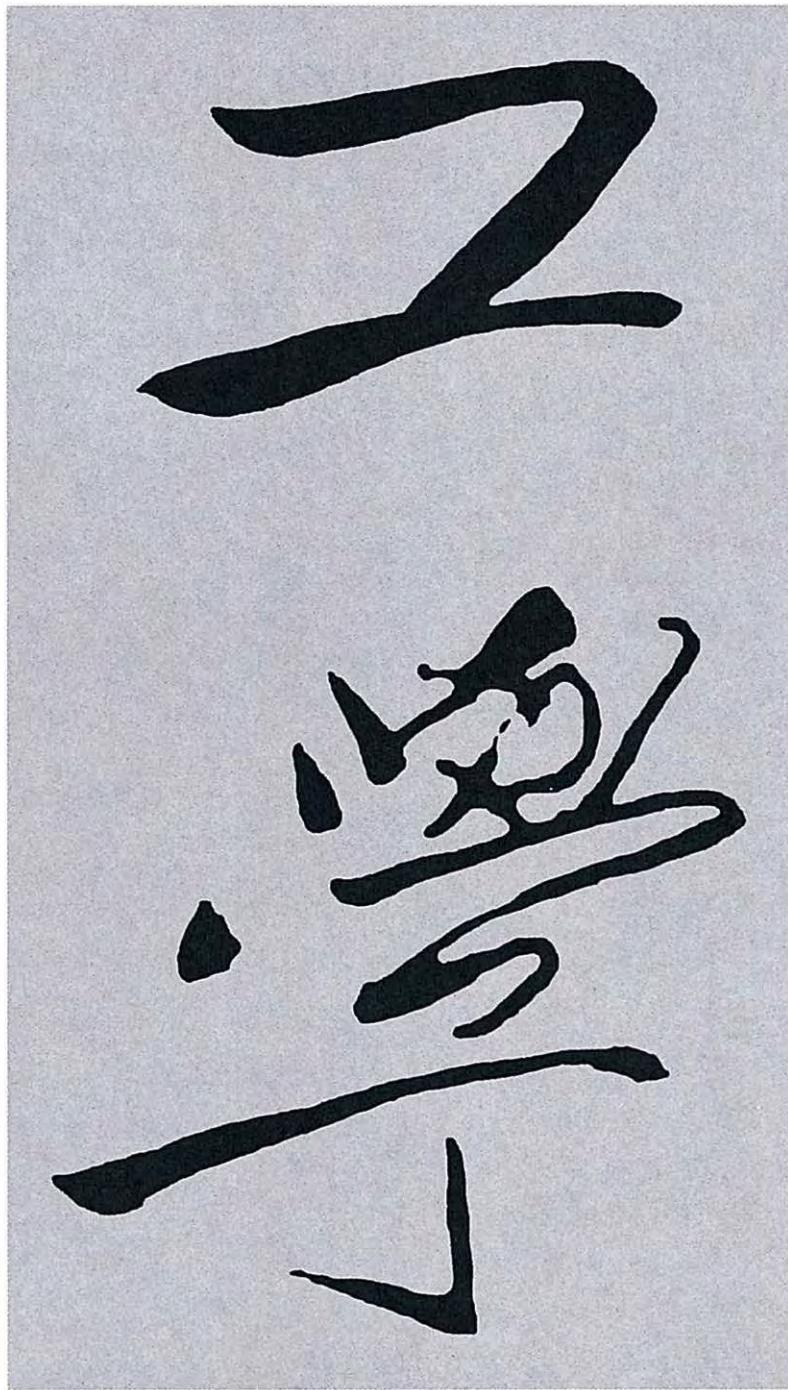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邓，指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

为《工学》报题写报头^[1]

(1953年9月)

工学

[1] 《工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校刊，1953年9月1日《工学》报创刊，毛泽东亲笔题写报头。



毛泽东为《工学》报题写的报头。



1953年10月1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



1953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少先队员张筠英亲切交谈。



1953年10月1日，毛泽东向参加国庆四周年大会的群众游行队伍举手答礼。

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讲话提纲^[1]

(1953年)

和“余粮收集制”的不同。

国家和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农民的关系问题，和百分之十左右缺粮户问题。

“共产要来了”？

和大中小粮贩子的关系。

合作社代替粮商。

农村之底有六：

- (1) 小农；
- (2) 百分之十左右的缺粮户；
- (3) 每年二千万至四千万的灾民；
- (4) 百分之十左右的落后乡；
- (5) 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农民欢欣鼓舞；
- (6) 互助合作运动。

(1) 水利；

(2) 肥料；

[1] 这是毛泽东在1953年9月至10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的一份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讲话提纲。提纲开列的问题，毛泽东10月2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结论中大多讲到了。

- (3) 种子；
- (4) 病虫害；
- (5) 农具；
- (6) 耕作法。

所谓“保护农民”的错误思想，应加分析和批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

依靠党、团、缺粮户。

一时工业品供应不上如何办。

一切必要配售的地方均应配售。

统一管理，分工负责。

大员下去。（2600亿斤细粮）

城市节约问题（苏联曾在大城市每人每天只配五两，我国现为老秤十两新秤十二两）。

过渡时期社会主义体系构成的两个重要分支部门：

- (1) 私人资本——国家资本主义；
- (2) 小私有制农民的征收，征购。

主体——国营工业；

一翼——国家资本主义；

又一翼——农村的互助合作和粮食的征购制。

价格应从长远计算。

不要城乡同时紧张？

（李富春，饶漱石）

暂时不要去讲。

全党动员作宣传（大张旗鼓，但不登报）。

节约是大问题，不是小问题。

计划供应。

可能出的乱子：

- (1) 农民不满（扁担暴动）；
- (2) 市民不满（因为配售）；
- (3) 对外影响不好。

粮食统购统销问题^[1]

(1953年10月2日)

一、赞成陈云同志的报告^[2]，详细办法以后讨论。粮食问题采取统购统销这样的措施是否迟了一步，将来再看，也许不迟。从现在起到十一月中或十一月底作准备，从十二月到明年一月征粮、购粮同时进行，因此，征粮的布置要推迟一个月。这也是要打一仗，一面是对出粮的，一面是对吃粮的，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要充分准备，紧急动员。

二、党内、党外对农村工作有很多议论。党外梁漱溟^[3]说农村情况很不好，党内也有要保护农民利益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从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结论。

[2] 指政务院副总理陈云1953年10月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全国粮食情况非常严重。一些主要产粮区未能完成粮食收购任务，而粮食销售量却在不断上升，京、津两地的面粉已不够供应，到了必须实行配售的地步。如不采取坚决措施，粮食市场必将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其结果必将导致物价全面波动，逼得工资上涨，波及工业生产，预算也将不稳，建设计划将受到影响。这不利于国家和人民，只利于富农与投机商人。为此，在粮食问题上必须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严格管理私商，在坚持统一管理的前提下调整内部关系。

[3] 梁漱溟（1893—1988），广西桂林人。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来没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已开始忘记了，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

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它有两个翅膀即两翼，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

有人要摸农村的“底”。农村的底有六条，这可答复梁漱溟，也可答复党内的一些同志。

- (一) 小农经济。这个经济不好，但是个现实。
- (二) 百分之十左右的缺粮户。共约有四千八百万左右的农民缺粮，其中老区情况较好，新区比较严重，要五年才能解决。
- (三) 每年两千万到四千万灾民。灾有六种：水、旱、风、虫、霜、雹，这个问题几十年才能解决，但搞得好可以减少。
- (四) 百分之十左右的落后乡。根据整党和“新三反”的材料，这些乡的坏干部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是异己分子钻进来的，百分之十到二十是好干部蜕化的。

以上四条都是不好的方面，以下两条是好的方面。

- (五) 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农民欢欣鼓舞，拥护政府，缺粮户和灾民也拥护政府。不拥护政府的人中包括地主、富农在内。我们在农村的基础就是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农民。
- (六) 互助合作已经发展起来。老区已达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新区是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其中也有部分是假的。农村将来进一步的发展，基本上是靠这第六条。

这不是讲技术的“底”，而是讲政治的“底”。要使党内、党外

的人心中有数。

水利、农具、肥料、耕作法，这些技术的推广应用，现在也要靠互助合作。将来进一步搞社会主义，就要靠机器（拖拉机）。

三、今天讨论的问题，就是涉及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欢欣鼓舞的人的问题，也涉及缺粮户的问题，这就是对农民实行粮食征购制的问题。实行粮食征购依靠谁呢？主要依靠党员，他们是乡村干部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贫农、中农、缺粮户中都有这样的积极分子。光靠缺粮户是不行的，缺粮户可以作我们的同盟军，也可以作中农的同盟军。

四、配售问题。粮食征购、整顿私商、统一管理这三个问题，势在必行。配售问题可以考虑，我观察也势在必行。因为小农经济增产不多，而城市粮食的需要年年增长，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城市、乡村不同时紧张更好，但恐怕办不到。至于名称，不叫配售也可以，可叫计划供应。这样做可能出的毛病，第一是农民不满，第二是市民不满，第三是外国舆论不满。问题是看我们的工作。

五、宣传问题。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但报纸一字不登。方针已定，今天会后可暂时不讲，因为召集各中央局及主要省市负责同志开的会议十二日才能开完，但有关机关可以进行讨论，并准备布置。

给毛月秋^[1]的信

(1953年10月4日)

月秋同志：

你给我的信收到。

为了了解乡间情况的目的（不是为了祝寿。为了节约，无论哪一年均不要祝寿，此点要讲清楚），我同意你来京一行。尚有毛翼臣^[2]（不知住什么地方）、文东仙^[3]（唐家圫）二同志过去来信，表示要来我处一看。如你及乡间其他同志同意的话，你可约同他们二位一道来京。除你们三人外，其他没有预先约好的同志，一概不要来。你们到京住一个短期仍回家乡。

你们来时，即持此信先到长沙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找那里的同志帮忙，发给你们三人来京的路费，并请他们派一人送你们来京。

另请你持此信，到韶山、石城两处乡政府及当地的两个区政府及党的负责同志处，和他们商量，如果他们同意的话，请他们将两乡两区的情况及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问题，写成书面材料，交你带来，作为参考之用（不是为了直接解决乡间问题）。

[1] 毛月秋，大革命时期曾在韶山任中共慈悦支部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在韶山毛泽东旧居做过接待工作。

[2] 毛翼臣，是毛锡臣之误。毛锡臣是毛泽东的远房叔祖父。

[3] 文东仙，毛泽东的表弟。

你们三人来时，不要带任何礼物。

你们到京时间，以早为好，希望不迟于阳历十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月四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月秋兄：

你給我的信已收到。我剛到蘇聯請問了幾句，說均不需託書。你為丁曉鶴編《同文》事，我剛看來，有一行，尚有未定，不知往什麼地方。文稿尚未完成，表示要早些郵去。

不全有了花壽，請歸。即盼。

毛泽东致毛月秋信的手稿。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他們的錢財被軍閥拿走，我們不能向湖南請教，請問
湖南政府不把湖南的軍隊交給我們，我們的人民會怎樣？
我們的人民會怎樣？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他們的錢財被軍閥拿走，我們不能向湖南請教，請問
湖南政府不把湖南的軍隊交給我們，我們的人民會怎樣？
我們的人民會怎樣？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毛月秋：十月廿五日
順致敬意。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毛月秋：十月廿五日
順致敬意。

毛泽东致毛月秋信的手稿。

给马叙伦^[1]的信

(1953年10月5日)

夷初先生：

闻病甚念。务请安心休养，不限时日，病愈再工作。有何需要，请随时示知。敬祝
早日恢复健康！

毛泽东
十月五日

[1] 马叙伦，字夷初，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部长。

事和先生：
闻你甚念。徐谦
深喜。不胜时人病急
再拜。有信为要。特
此。事忙。
望勿复。健康。
毛泽东
十月五日

毛泽东致马叙伦信的手稿。

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成立四周年的电报

(1953年10月5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同志
亲爱的总统同志：

值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四周年之际，我代表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以我个人名义，谨向爱好和平的全德人民和您本人致以最衷心的祝贺。

中国人民怀着十分愉快的心情注视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去四年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所获得的成就。德国人民在苏联的援助下反对国际反动势力挑衅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以及苏联政府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中所获得的重大成果，对于巩固欧洲和平和全世界的和平事业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祝德国人民在争取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德国的光荣事业中获得更大的胜利。德国人民在这个事业中将永远得到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深厚的同情和全力的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月五于北京

在印尼总统祝贺我国 国庆的电报上的批语

(1953年10月5日)

外交部：

各方贺电，应复电致谢。

毛泽东

十月五日

在李大梁^[1]来信上的批语

(1953年10月5日)

此件请李维汉^[2]同志酌处。

据王季范^[3]先生称：此人希望政府予以招待。请派人了解情况，酌量处理。

毛泽东

十月五日

此人系民国初年湖南第一师范心理学教员。

[1] 李大梁，当时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2]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3] 王季范，当时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



1953年，毛泽东和青年时代的老师、表兄王季范等在北京合影。

对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 结论的批语

(1953年10月11日)

尚昆^[1]同志：

(一) 此件^[2]用代电发出；(二) 文内凡用“毛主席”的地方，改为“毛泽东同志”，我已改了一些，请查一下，有未改者，照此改正。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周恩来1953年8月11日在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上所作的结论。

美蒋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值得注意^[1]

(1953年10月11日)

彭德怀同志：

此件值得注意，请饬查是否确有此项包括金门、二陈^[2]等地之协定。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联络部1953年10月6日关于美蒋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的报告上写给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的批语。

[2] 二陈，指浙江沿海的上大陈岛、下大陈岛。

关于粮食征购、配售和管理等 几个问题的提纲^[1]

(1953年10月12日)

一

数目：706亿斤；面大小；一次或多期；征价；标准=控制、
评议；运输；征购分开；免购区；指示；物资供应；公债；宣传总
路线；少出乱子；明年预购；生产中心；时间安排；配售；暂不登
报；统一管理；干部下乡和落后乡。

二

统一管理：

(1) 由中央公布控制数目，各大区保证完成，负责管理，组织
供应；

[1] 毛泽东草拟的这个提纲，本篇一写在邓子恢1953年10月10日关于在中南传达中央粮食方针的情况简报第一页上。本篇二写在情况简报最后一页的背面。初步分析，第二部分关于统一管理的七条意见，是对第一部分所列的“统一管理”这一问题的展开论述。

- (2) 各区需粮交大区，区省间分配掌握，东北各掌一部；
- (3) 除上外，粮均归中央，包括出口，供给，储备，备大荒，机动等项；
- (4) 地方发〔生〕自己不能克服的困难，中央予以援助；
- (5) 中央认为需要和可能调出粮食，经慎重考虑决定后，地方应照调，地方小困难应服从全国性的大困难；
- (6) 粮价由中央统一规定，中心点及以下的定价原则；
- (7) 供应标准，全国应大体一致，各地可提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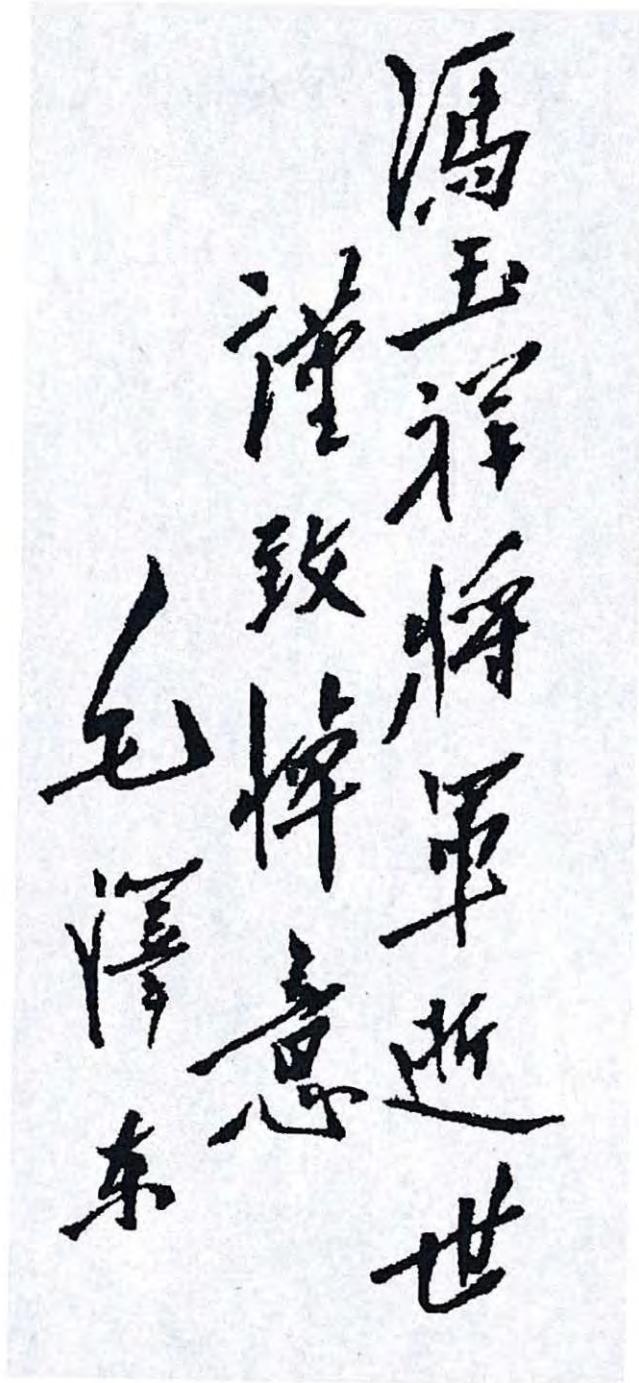
为冯玉祥将军骨灰安葬仪式题词^[1]

(1953年10月15日)

冯玉祥将军逝世谨致悼意。

毛泽东

[1] 为了纪念冯玉祥将军一生爱国的历史功绩，党中央决定将他的骨灰葬在泰山。1953年10月15日，冯玉祥将军骨灰安葬仪式在他的陵墓前隆重举行。毛泽东第二次亲笔题词：冯玉祥将军逝世谨致悼意。



毛泽东为冯玉祥将军骨灰安葬仪式的题词。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

(1953年10月15日、11月4日)

一 十月十五日的谈话

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

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个到两个，至多三个，根据工作好坏而定。要分派数字，摊派。多了冒进，少了右倾。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那就是自流了。可否超过三个？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责成地委、县委用大力去搞，一定要搞好。中央局、省市委农村工作部就要抓紧这件事，工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

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十月开会后，十一月、十二月、明年一月、二月，北方还有三月，有四五个月可搞。明年初，开会检查，这次就交代清楚。明年初是要检查的，看看完成的情形怎样。

[1] 1953年10月26日至11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这是毛泽东在会前和会议期间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两次谈话。

个别地方是少数民族区，又未完成土改，可以不搞。个别县，工作很坏的县，比如说落后乡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县委书记很弱，一搞就要出乱子，可以暂缺，不派数字，但是省委、地委要负责帮助整顿工作，准备条件，明年秋收以后，冬季要搞起来。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允许试一试。走直路，走得好的，可以较快地搞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

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

总路线，总纲领，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十月开会，要讲一下。

“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为什么法律上又要写呢？法律是说保护私有财产，无“确保”字样。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小合作社是否也能带一点，应加研究。互助组也要帮助鳏寡孤独。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户的社算大的了，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户。在大社之下设几个分社，这也是

一种创造，不一定去解散大社。所谓办好，也不是完全都好。各种经验，都要吸取，不要用一个规格到处套。

老区应当多发展一些。有些新区可能比有些老区发展得快，例如，关中可能比陕北发展得快，成都坝子可能比阜平那些地方发展得快。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念。东北其实不是老区，南满与关内的后解放的地方也差不多。可能江苏、杭嘉湖一带赶上山东、华北的山地老区，而且应当赶上。新区慢慢来，一般可以这样讲，但有些地方干部强，人口集中，地势平坦，搞好了几个典型，可能一下子较快地发展起来。

华北现有六千个合作社，翻一番——摊派，翻两番——商量。合理摊派，控制数字，不然工作时心中无数。东北一番、一番半或两番，华北也是这样。控制数字不必太大，地方可以超过，超额完成，情绪很高。

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出了废品，浪费农民的精力，落个影响很坏，政治上蚀了本，少打了粮食。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都不利。

在城市郊区，要多产蔬菜，不能多产蔬菜，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也都不利。城市郊区土地肥沃，土地平坦，又是公有的，可以首先搞大社。当然要搞得细致，种菜不像种粮，粗糙更不行。要典型试办，不能冒进。

城市蔬菜供应，依靠个体农民进城卖菜来供应，这是不行的，生产上要想办法，供销合作社也要想办法。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

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

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的，土地入股；有高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

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样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

二 十一月四日的谈话

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力很大。如果不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脚本来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那就错了。有条件成立的合作社，强迫解散，那就不对了，不管哪一年，都是错的。“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倒错了的，应当查出来讲清楚，承认是错误，不然，那里的乡干部、积极分子，就憋着一肚子气了。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

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反对“五多”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克服“五多”以及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

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内社外都有矛盾。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半社会主义的，社外的个体农民是完全的私有制（个体农民在供销社入了股，他这一部分股金的所有制也有了变化，他也有一点社会主义），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互助组跟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同，互助组只是集体劳动，并没有触及到所有制。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个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农具入了股，在社内社会主义因素和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要逐步解决。到将来，由现在这种半公半私进到集体所有制，这个矛盾就解决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将来也叫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要叫集体农庄）。一般讲，互助组还

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

有一个时候，曾经有几个文件没有提到互助合作，我都加上发展互助合作或者进行必要的和可行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这样一类的话。有些人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因而就特别反对对农民干涉过多。那个时候，也确是有些干涉过多，上面“五多”，条条往下插，插得下面很乱。“五多”哪一年也不行，不仅农村不行，工厂也不行，军队也不行。中央发了几个文件，反对干涉过多，这有好处。什么是干涉过多呢？不顾需要和可能、不切实际、主观主义的计划，或者计划倒合实际，但用命令主义的方法去做，那就是干涉过多。主观主义、命令主义，一万年也是要不得的。不仅是对于分散的小农经济要不得，就是对于合作社也是要不得的。但是，不能把需要做、可能做的事，做法又不是命令主义的，也叫做干涉过多。检查工作，应当用这个标准。凡是主观主义的，不合实际的，都是错误的。凡是用命令主义去办事，都是错误的。稳步不前，右了，超过实际可能办到的程度勉强去办，“左”了，这都是主观主义。冒进是错误的，可办的不办也是错误的，强迫解散更是错误的。

“农村苦”“不大妙”“措施不适合于小农经济”，党内党外都有这种议论。农村是有一些苦，但是要有恰当的分析。其实，农村并不是那样苦，也不过百分之十左右的缺粮户，其中有一半是很困难的，鳏寡孤独，没有劳动力，但是互助组、合作社可以给他们帮点忙。他们的生活比起国民党时代总是好得多了，总是分了田。灾民是苦，但是也发了救济粮。一般农民的生活是好的，向上的，所以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农民欢欣鼓舞，拥护政府。农村人口中间，有百分之七左右的地主富农对政府不满。说“农村苦，不得了了”，我历来就不是这样看的。有些人讲到农村苦，也讲到农村散，就是

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但是他们讲分散性的时候，没有同时讲搞合作社。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

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总路线，概括的一句话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大的推动。接着又开了这次互助合作会议，又是一次很大的推动。鉴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所以这次会议要积极一些。但是，政策要交代清楚。交代政策这件事很重要。

“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句话很好。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但是，也有好处。比如打仗，打了一仗，休整一下，再展开第二个战役。问题是有些阵地退多了一些，有一些不是退多了，而是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展，不批准，成了非法的。世界上有许多新生的正确的东西，常常是非法的。我们过去就是“非法”的呀，国民党是“合法”的呀。可是这些非法的社，坚持下来了，办好了，你还能不承认吗？还得承认它是合法的，它还是胜利了。

会上讲了积极领导，稳步发展，但是也要估计到还会有些乱子出来。你说积极、稳步，做起来也会是不积极领导，或者不稳步发展。积极、稳步就是要有控制数字，派任务，尔后再检查完成没有。有可能完成而不去完成，那是不行的，那就是对社会主义不热心。据检查，现在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社减了产，办得不太好，这就是没有积极领导的结果。当然有少数社没有办好，减了

产，也是难免的。但是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甚至有更多的社减了产，那就是问题。

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1]。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

县干部、区干部的工作要逐步转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这方面来，转到搞社会主义这方面来。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一定要书记负责，我就是中央的书记，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各级书记，都要负责，亲自动手。中央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在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事上。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是办社会主义。各级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到会的人，要成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专家，要成为懂得理论、懂得路线、懂得政策、懂得方法的专家。

城市蔬菜的生产和供应，都要有计划性。大城市和新发展起来的城市，人口很集中，没有蔬菜吃，哪能行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城市郊区，蔬菜生产搞互助组，供应不好解决，可以不经互助组，就搞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甚至搞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一下。

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提出来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收前，发展三万二千多个，一九五七年可以发展到七十万个。但是要估计到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一百万个，也许不止一百

[1] 参见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要办好，积极领导，稳步发展。

这次会开得有成绩。现在不开，明年一月再开，就迟了，今年冬天就错过了。明年三月二十六日再开会，要检查这次计划执行得怎样。这次会决定下一次会议的日期，并且决定下次会检查这次会决议的执行情形，这个办法很好。明年秋天还要开一次会，讨论规定明冬的任务。

关于重要土特产和副食品的经营问题

(1953年10月16日)

陈云、小平^[1]同志：

关于重要土产和副食品，逐步抓过来归国家和合作社经营，实有必要。这是一项大财富，不但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可以帮助兄弟国家。请你们邀集叶季壮、曾山、姚依林、程子华^[2]等同志，专为此事谈一次，定出今年两个月及明年的购销计划。例如油脂（植物油和动物油），油料（大豆、花生、芝麻、菜籽、茶籽、棉籽等），商品毛猪，商品屠宰牛、羊，蛋类，以及大中城市的蔬菜（关于菜农生产的合作化，我已告陈伯达、廖鲁言^[3]于本月底互助合作会议上加以讨论）等类，逐步走上国营和合作社营，目前就要有计划，动手做起来。像五千万头商品毛猪，国、合仅仅做了百分之

[1] 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 叶季壮（1893—1967），广东新兴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部长。曾山（1899—1972），江西庐陵（今吉安）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商业部部长。姚依林（1917—1994），安徽贵池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商业部副部长。程子华（1905—1991），山西解县（今运城）人，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

[3] 陈伯达（1904—1989），福建惠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六，即三百万头（其中一百九十万头出口），这是太少了，明年至少加一番，达到百分之十二，即六百万头。如外贸及内贸有销路，还可加大。大中城市蔬菜必须管起来，生产合作化和供销合作化（后者加国营控制），应是同时进行，过去这一方面我们全没有管。油脂、油料比普通粮食还有价值些，目前绝对大部分还在私营手里，今冬及明年必须由国、合管起来。当然目前几年不可能是全部或大部，但三分之一或一半能由我们管就好。

我们对德国应当全力帮助，我想可以答应三亿二千万卢布的生意，只是向他们声明：（一）明年上半年办不到，下半年准备用一切努力满足他们的要求；（二）德国货多给我们需要的日用品（他们有的，或能产的），少给我们暂时不能用的机器（也要准备来一部分政治积压，甚至欠账）。他们比我们苦得多，我们不能不管。此事请你们与外贸同志再加考虑。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二十四时

朝鲜是赠送，德国是易货贸易，是不相同的，因为德国未打仗。但德国却和朝鲜一样处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在民主阵营内只有这两个国家是被分割为二的，波、捷、匈等国都是统一的。

对华南分局关于具体执行 粮食征购配售政策的意见^[1]的批语

(1953年10月16日)

陈云^[2]同志：

恐须允许广东及广西只在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地方用征购办法，大体上即同意用“重点区试办”（来电末段）〔的办法〕去做；而在

[1] 指中共中央华南分局1953年10月7日给中南局并报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具体执行粮食征购配售等方针的意见。报告中说，中央为解决今后全国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决定采取征购、配售的方针和由国营、合作社包购包销的办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考虑到华南地区的以下情况：（一）两广结束土改较迟，目前农村土改遗留问题及稳定生产关系尚未全部获得解决，农村党的基础薄弱，领导精力还没有很好转到生产上去，如即实行粮食的全面征购，对今冬明春开展冬种和增产运动可能产生不良影响。（二）根据今年7月到明年6月两广粮食的产销情况与今年第三季度广东省完成粮食购销计划的情况，满足两广内地市场供应是较有把握的。（三）广东省今年粮食即使实行征购，增购的数量不会太多，但如果收购的动员组织工作做得不好，反会影响收购或造成更紧张更被动的局面。（四）从今年夏收后粮食上市与超额完成收购计划的情况看，由于市场管理加强，粮价一般保持稳定。在具体执行上我们意见可否在两广地区暂缓执行，即推迟到明年夏收后再执行，或在今冬明春先选择重点区试办。

[2] 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对华南分局关于具体执行粮食征购配售政策的意见的批语

配售方面，则在广州等大中城市办理。如何，请酌。

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

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 与计划供应决议的通知 和毛泽东对决议稿的修改

(1953年10月16日)

一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地委，县委，并告中央各部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兹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发给你们，请予认真执行。除迅速发至县委和城市区委外，可登党刊。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

二

必须使他们懂得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内，或者说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将我们的国家

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使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⑪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稿中加写的一段文字。

给李漱清^[1]的信

(1953年10月16日)

漱清先生：

惠书敬悉。承告乡情，甚感。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尚祈谅之。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

[1] 李漱清，毛泽东少年时的老师，大革命时期曾协助毛泽东在广州办过《政治周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 参观团代表的谈话^[1]

(1953年10月18日)

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例如鄂伦春族还不到两千人，我们也要和他们团结。只要是中国人民，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团结起来，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快一点，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点，不论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再做，没有商量好就不勉强做。商量好了，大多数人赞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国民党势力大就压迫人。他们不仅压迫少数民族，还压迫大多数汉人。国民党是做坏事的。坏事是不应当做的。我们的干部有了错误就要批评。我们在西藏的工作有什么缺点和错误，请你们讲，你们不同意的和你们认为不利于人民的都可以讲，便于我们纠正。有了缺点就马上纠正，这是我们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

过去两年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汉

[1] 这篇谈话，是西藏国庆观礼团团长朵噶·彭措饶杰1954年6月25日至27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藏语向西藏僧俗官员、人民的广播讲话中引述的。

藏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是有进步的，西藏地方对中央以及藏族和汉族之间都是一天一天靠拢的，相信将来会更加靠拢。

整个中国现在还很落后，需要发展。这是因为过去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压迫的关系。他们现在已被我们赶走了，这四年来我们就有了很大进步。在国家经济恢复以后，今年开始了第一个国家建设的五年计划，预计在三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的大工业就建立起来了。苏联在三十六年前赶走了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坏人，建设了三十六年才有现在的成绩。我们建设起来比苏联还要快些，因为我们有苏联的帮助。中国人口很多，有五万万几千万，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土地也很广大，有三个五年计划就能建设得很好了，对西藏就会有更大的帮助了。

中央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们的一定会帮助你们。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有希望的。

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主要靠西藏的领袖和人民自己商量去做，中央只是帮助。这点是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里写了的。但是要做，还得一个时间，而且要根据你们的志愿逐步地做。可做就做，不可做就等一等；能做的，大多数人同意了的，不做也不好。可以做得慢一些，让大家都高兴，这样反而就快了。

总之，我们的方针是团结进步，更加发展。

对朝中停战代表团首席委员 发言稿的修改意见^[1]

(1953年10月20日)

李克农同志，并告金首相、彭司令员^[2]：

十月十九日十九时三十分来电及附件均悉。附件^[3]应作如下修改后发表：

自“你方更派遣了长期在你方战俘营中迫害我方被俘人员的国民党反动残余的特务”到“实属卑鄙之极”一段改为：“你方更派遣了长期在你方战俘营中迫害我方被俘人员的国民党反动残余的特务充当你方的代表和译员，出现于解释帐篷之内，公然破坏职权范围和解释与遣返工作细则的许多规定，对解释工作进行公开的和直接的干扰，以威胁我方被俘人员，使其不敢申请遣返。必须强调指出，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根本不属于朝鲜交战的一方。过去你方即已利用这个匪帮残余集团的特务破坏分子在你方战俘营中对我方被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负责人李克农的电报。

[2] 金首相，指金日成，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彭司令员，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停战代表团首席委员李相朝准备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上发表的抗议稿。

俘人员进行各种残暴的迫害以便达到强迫扣留战俘的目的。现在你方更公然派遣这些特务破坏分子充当你方的正式代表进入解释场所，来阻挠破坏解释规则的实施，威胁我方被俘人员，并借此将他们强迫扣留。这彻底证明你方在你方强迫扣留战俘的罪恶阴谋已大白于世之后，更不惜完全破坏一切国际公法的原则，公开以使用匪类特务破坏分子进行破坏活动作为你方处理国际事务的主要手段。这是一切正义人类所不能容忍的。”抗议末一句改为：“对此，我向你方提出最强硬的抗议，并坚决要求你方立即停止上述明目张胆、破坏国际公法、违反协议的一切非法罪恶行为！”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日

给杨尚昆^[1]的信

(1953年10月22日)

尚昆同志：

请将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印成单张，于今晚或明天发给到组织会议^[2]的各同志，请他们利用停会的两三天时间，加以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使他们在刘少奇同志及别的同志在大会上讲话讲到这个问题时，已经有所了解。此事（印发结束语）在今日下午领导小组开会时，请告诉刘、饶^[3]及胡乔木^[4]同志一声。同时可多印一点（可印一两千份），发给北京的干部，并由总党委^[5]通知各部门、各党组要他们阅读和讨论。

毛泽东

十月廿二日二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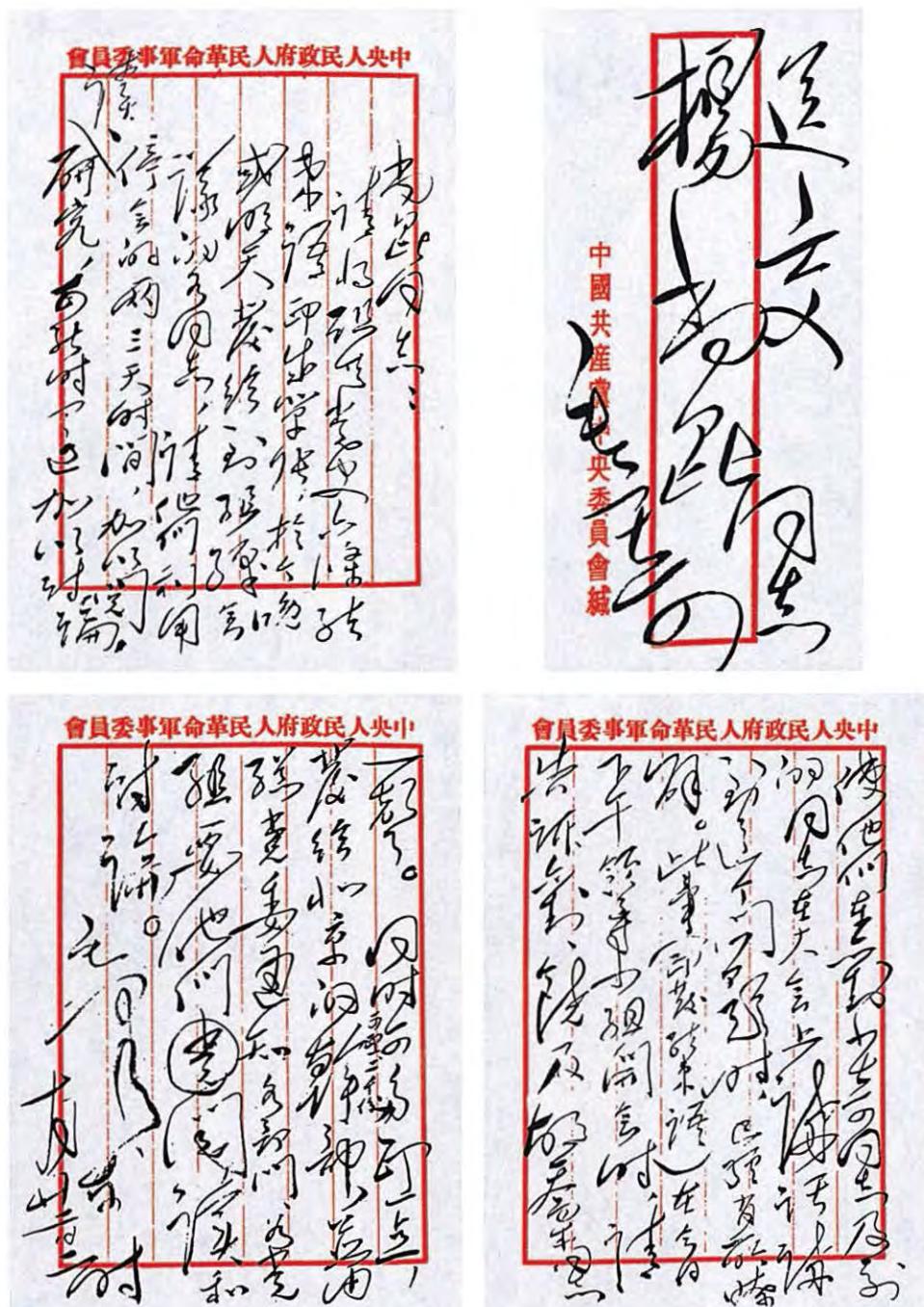
[1]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中共中央于1953年9月至10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3] 刘，指刘少奇。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4]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5] 总党委，指中央一级直属机关总党委。



毛泽东致杨尚昆信的手稿。

对刘少奇等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3年10月23日)

—

尚昆^[1]同志：

请将刘、饶、安^[2]三同志在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用打字打十多份（校对勿讹），准备交各中央局分局组织部长各带去一份，你处存二份，今日下午我进城时交我一份备用。星期六可以不开会。

毛泽东

十月廿三日三时

—

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刘，指刘少奇。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指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而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是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1]

三

目前在全党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是能够担负这个伟大光荣的任务的。^[2]

[1] 这是毛泽东审阅刘少奇1953年10月22日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时加写的话。

[2] 这是毛泽东审阅饶漱石1953年10月22日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时加写的话。

現在是全党的团结统一进行党的
思想教育时期，我们要对党、我们
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农民主动的
一个根本问题，我们要尊重人民的
意愿，尊重人民的劳动，尊重人民的
创造，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在这一
过程中，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
要在农村内基本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和他们的组织和教育好地为这个任务服务而做
努力，我相信同高产稳产的农业相比，这
个任务的完成。

毛泽东修改刘少奇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时加写的一段话的手稿。

给文九明^[1]的信

(1953年10月25日)

九明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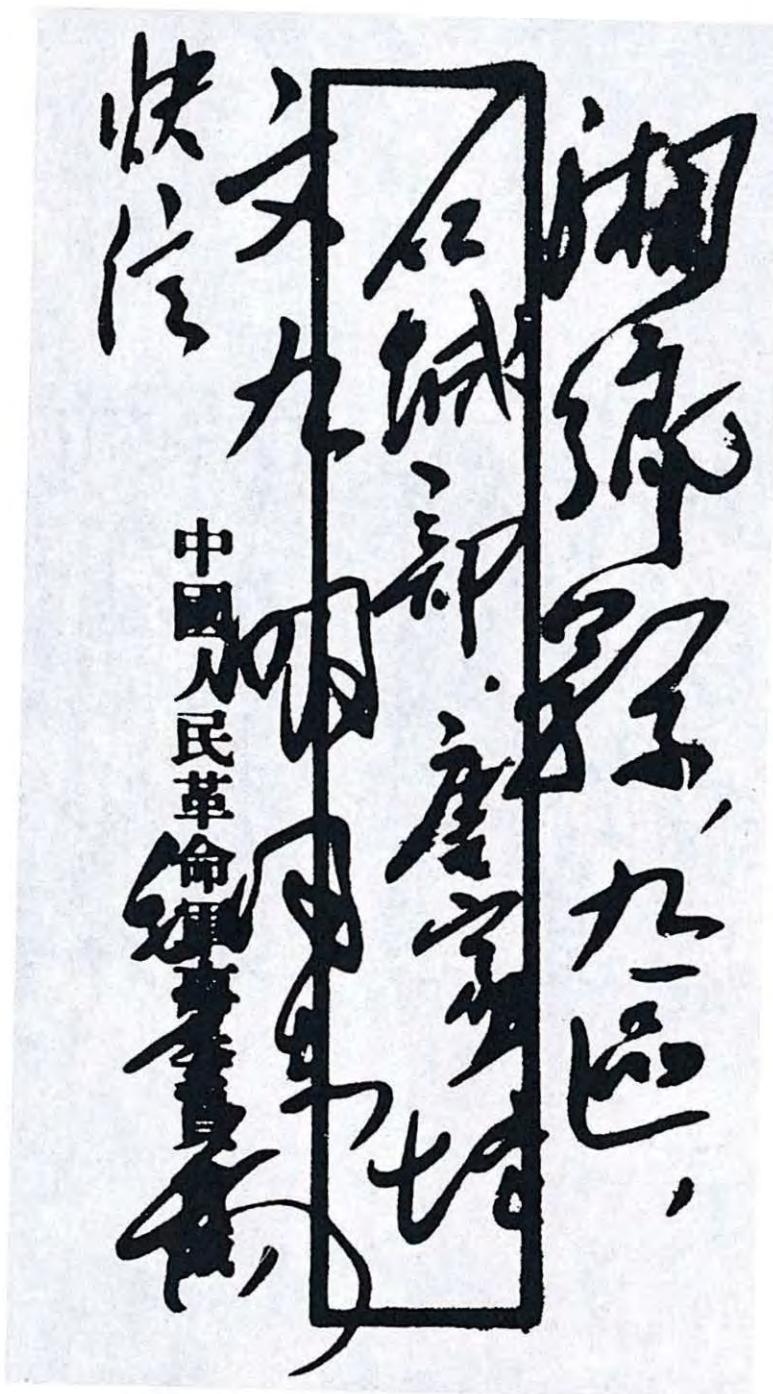
十月二日的信收到。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自备路费，由我补发。毛泽荣，小名宋五，是我的兄弟，住在限门前，他多次来信想来京一行，请你找他一路同来。他没有出过门，请你帮忙他。他的路费亦由自备，由我补发。你们来时如可以不找省委统战部则不找，如无路费，可以持此信找统战部同志帮忙。路上冷，每人要带一条薄棉被。不要带任何礼物，至嘱。其他的人不要来。

毛泽东

十月廿五日

能于十一月上旬到京为好。

[1] 文九明，毛泽东的表侄。



毛泽东致文九明信的信封。



毛泽东致文九明信的手稿。

接受印尼首任驻华大使莫诺努图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3年10月28日)

大使阁下：

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大使所呈递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的国书，并对贵大使所转达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政府和人民的祝贺，表示深切的感谢。

中印两国人民之间长期存在着的友谊，由于贵我两国新的外交关系的建立，三年来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我相信：今后在贵大使的努力下，中印两国间的经济与文化的友好合作关系将日益密切，这种友好关系的增进对于各国人民所努力争取的亚洲及世界的和平将有所贡献。

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贵大使为加强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协助。

我谨祝贵大使在工作中获得成功。

不怕破裂也不把门关死^[1]

(1953年10月29日)

李克农同志，并告金首相、彭司令员^[2]：

十月二十八日二十时来电和电话中所谈情况均悉。美方自己发动谈成员问题的实质，反诬我方离开议程，片面决定以我方议程为正式议程。对此，在二十九日会上应指出双方会谈^[3]首先应就议程达成协议，不应先广泛拉扯问题的实质。对方先扯实质问题反诬我方离开议程问题，明明是企图转移目标，破坏程序。在目前的讨论中我们应坚持解决议程问题，除在必须进行反击时外，不要与之就实质问题展开讨论。如对方再扯实质问题，我们仍坚持回到议程问题并表示要他们考虑建议休会。在讨论中要保持强硬态度，不怕破裂也不把门关死。遇对方无理之处要当场回击。二十八日会上对方侮辱中朝两国和苏联，二十九日要提严重抗议，指出其不是和平协商的会谈态度，而是破坏会谈的态度，是严重的失言，要他们收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负责人李克农的电报。

[2] 金首相，指金日成，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彭司令员，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朝中方面代表和美方代表从1953年10月26日开始在板门店就召开政治会议问题进行的会谈。

回。但不要当场等他们收回，就可谈议程问题。二十九日可就此事专发一公报^[1]。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1] 1953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朝中方面参加关于政治会议问题双方会谈的代表团发表的公报。

给邹普勋、谭熙春、毛锡臣^[1]的信

(1953年10月29日)

邹普勋、谭熙春、毛锡臣同志：

你们三位的信都收到了。熙春、锡臣（龙头山的）想来北京一次，普勋想再来北京一次，我想可以。现天气已冷，可在明年开春（阴历三月间）来，如果你们愿意早来，亦可在阳历十二月中旬来。由你们三人结伴同行，自己出路费，路上买车票等事亦由自己经理。到京住一个月即回家。如果你们同意，即可照这样办。

此外，我弟毛泽连^[2]（东茅塘的）要求来京治眼病，请邹普勋兄告诉他，亦可同来。除你们四人之外，别人都不要来。如有不得许可，自己来的，不便招待。锡臣、熙春二位不另复，即请普勋兄转致。此问

近安

毛泽东

十月廿九日

[1] 邹普勋，毛泽东少年时的私塾同学和邻居。谭熙春，早年和毛泽东在安源搞过工人运动。毛锡臣，毛泽东的叔祖父。

[2] 毛泽连，毛泽东的堂弟。

关于李克农回国后停战代表团 工作安排问题^[1]

(1953年10月31日)

金首相，并告李克农^[2]同志、志司、志政^[3]：

[1] 这是毛泽东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的电报。李克农1953年10月28日19时关于他回国后朝鲜停战代表团工作安排给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及志司、志政请示报告。报告说：（一）遵照中央指示，以杜平、乔冠华、丁国钰、柴成文、黄华五同志为党委委员，建议以杜平为代理书记，乔冠华为副书记，并建议代表团政治部主任郑文翰、代表团后勤部部长王厉同志参加党委，为候补委员。（二）关于军事停战委员会及行政会议的重大对外问题，必须经朝中双方代表团研究讨论并经中央批准始能作最后决策向对方提出，朝方代表团组成为李相朝、奇石福、崔龙汉、朱然、田东赫等五人，我方为杜平、乔冠华、黄华、丁国钰、柴成文等五人。（三）代表团党委内部拟作如下分工：杜管全局，乔负责对外谈判业务，杜兼管不直接遣返战俘工作的内部工作，黄管政治会议双方会谈工作，丁、柴管有关军事停战委员会及观察小组与后方口岸工作，丁兼管中国代表团党政工作，柴兼管后勤及机要、通讯、机场、汉江口等工作。（四）自11月1日起，代表团对志司、志政、东政、总政及总参、总后之文件和电报一律由杜签署，对业务方面向北京及平壤的请示报告均由杜、乔共同签署。

[2]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负责人。

[3] 志司，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志政，即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

现转发来李克农同志十月二十八日十九时来电。克农同志因过劳久病，需回来稍事休息，我们已决定令他于下月初旬动身回北京。并同意来电所作各点安排。他在开城的工作由杜平^[1]同志总的代理，对外谈判业务由乔冠华^[2]同志负责，一切工作经朝中双方代表团协商进行。以后关于对外谈判的请示报告各电均应由李相朝^[3]、杜平、乔冠华三同志签署分发平壤及北京，复电仍由北京发出。特此电告。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1] 杜平，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参与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领导工作。

[2] 乔冠华，当时在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协助李克农工作。

[3] 李相朝，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首席委员。

对中央关于统购粮食的宣传要点稿的修改^[1]

(1953年10月31日)

—

要过更好的日子，一定还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农业来说，只有在农村中一步一步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才能使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一步一步地和普遍地获得提高。

—

农村里一切明白道理的人都应当积极加入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1953年10月19日关于统购粮食的宣传要点稿时修改的四段文字，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中共中央的宣传要点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从今年起实行统购粮食。它的目的是保障全国城市农村人人有饭吃，保障国家按总路线实行经济建设，保障我国能够一步一步走社会主义的路。《宣传要点》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的路？（二）什么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总路线？（三）实行总路线，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要统购粮食？

质的互助组，加入半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将来就可以再进一步实行集体农民公有制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就是集体农场）和供销合作社，实现集体生产和富裕生活。工人在城市里建设，农民在农村里建设，农民要和工人一面合作，一面比赛，把农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这才是真正的工农联盟。要不是这样，所谓工农联盟，就不能发展和巩固，而且有使已经建立的工农联盟归于破裂的危险。

三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要使中国由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变成工业发达的国家。由非社会主义的工业变成社会主义的工业。这就一方面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工业（新的工厂，新的矿山），另一方面要将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加以社会主义的改造。这里最要紧的是多炼钢铁，多产煤炭、煤油和电力，多造机器。只有工业发达了，国家才能多造新农具和农业机器来帮助农民发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才能多修铁路公路把城市和农村联接起来，才能多修水利来发展农业，才能用大量的便宜的化学肥料、杀虫药剂、药品、糖、布匹、自行车、收音机、电影等各种日用东西来供给农民。

四

农业怎样改造？就是按照农民自愿（不能单靠行政命令，尤其不能采用强迫办法），一步一步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由办带有社会主

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到办半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办完全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场）。因为大家劳动，力量大，单干办不到的事，互助组能够办得到，互助组办不到的事，合作社能够办得到，所以互助组比单干强，合作社比互助组强，走一步就能使生产发展一步，生活提高一步。同时能用更多的粮食棉花和别的农产品供给国家和全国人民，又可以一步一步培养大家集体劳动的习惯（但不是吃大锅饭），一步一步积累资金，学习经管这个家务的本事，一步一步走到社会主义。

中央关于批判党内的 资本主义思想的指示

(1953年11月4日)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地委，并告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中南局和湖北省委抓紧了关于党的总路线在干部中的教育，及时地批判了干部中存在着的资本主义思想及各种糊涂观念，这在目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都是完全必要的。湖北和中南党内的这种思想情况，在各地都是存在的，请你们务必对党员首先是干部抓紧进行教育和批判，并将情况和结果向中央作报告。

中央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四日

对李维汉^[1]在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上的 讲话稿的批语

(1953年11月5日)

退李维汉同志：

(一) 同意于十日发表^[2]；(二) 我只在第七页、第十页、第十三页、第十四页上增改了几个字；(三) 请送一份给高岗^[3]同志阅；如周总理在十日前回京，应送他看一遍。

毛泽东
十一月五日

[1]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 李维汉1953年10月27日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于1953年11月1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3] 高岗，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再：会议应通过决议^[1]，拥护你的报告及陈叔通的开幕词。

[1]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关于接受和拥护陈叔通主席开幕词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李维汉副主任讲话的决议，载于1953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陈叔通1953年10月23日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题为《为实现国家总路线，正确地发挥私营工商业的积极作用而奋斗》，载于1953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

关于中央警卫团 不应设立文工团的批语^[1]

(1953年11月5日)

刘、朱、彭、罗瑞卿、周^[2]阅，尚昆^[3]处理。

根本不应设此文工团，三反后又发生此事是不应当的。肖华只负批发电报的错误，根本的错误在公安机关。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五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1953年11月2日关于处理电报中的错误问题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上。检讨报告中说：最近，我在处理电报中犯了错误，7月9日批发公安部为中央警卫团抽调文工团队员的电报，当时只注意到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问题，而未考虑到电报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后经彭德怀副主席指出，才发觉错误。

[2]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周，指周恩来。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祝贺苏联十月革命三十六周年 致马林科夫电

(1953年11月5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同志：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六周年之际，我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谨向您致热烈的衷心的祝贺。

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苏维埃国家就像灯塔一样照耀着全世界被剥削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前进道路。苏联人民最近在建设共产主义事业中所获得的日益辉煌的成就和威力，鼓舞着全体进步人类充满信心为争取美好的未来而斗争。

苏联的和平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的立场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努力，证明苏联的利益和全世界爱好和平自由的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各国善良人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苏联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正义的强大堡垒，而帝国主义者的反苏诽谤不过是他们奴役人类的卑鄙计划的一部分。

中苏两国人民已在过去三十六年的丰富历史经验中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当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苏联的慷慨援助下，沿着苏联所胜利地走过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光荣道路上前进的时候，我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觉到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亲密无间，和两国友好的无上珍贵。

祝贺苏联十月革命三十六周年致马林科夫电

为了我们两国人民共同发展的利益，为了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利益，愿中苏两国的伟大友谊永远巩固，不断发展！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五日 北京

拟公布美军细菌战战俘供词^[1]

(1953年11月8日)

金首相：

美国最近在联合国大会就细菌战问题重起风波，诬我以酷刑逼细菌战俘造假供状。我们拟将美细菌战俘十九人供词公布，并在公布之前，以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名义发表关于这十九份供词的公报。公报、供词、录音及各俘照片均将于十一月九日以飞机送平壤。我们拟于十一月十日上午北京时间十一时将公报广播，十一日见报。自十一日起连续广播各俘口供并连续在广播后之次日见报。拟请平壤亦照此日程公布上项公报和供词。以上各点均请电告您的意见。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八日

[1] 这是毛泽东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的电报。



1953年11月，毛泽东和金日成亲切握手。

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当前增产节约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3年11月8日)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中央同意国家计划委员会十月廿九日关于当前增产节约情况的报告^[1]，认为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意见是正确的，现发给你们，请迅速研究照办。今年只有一个多月了，明年第一季度即将到来，务望你们抓紧今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增产节约工作，并迅即动手布置明年第一个季度的各项工作，争取今年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已定的任务，并在这个基础上争取明年第一季度的生产工作和可做的基建工

[1] 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当前增产节约情况给毛泽东的综合报告中说，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已经逐步深入，干部和群众的情绪甚高，9月份的生产情况已有好转。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央五个工业部24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已有19种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某些产品的质量已有提高，成本亦有降低。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我们在财政上的困难情况正在得到克服。今年的基本建设计划可能完成得比原来预料的85%左右要更多更好些。为了把运动推进一步，各级领导的重点是应用大力帮助目前运动开展得不好或尚未开展的单位，使他们迅速把全体职工（包括技术人员及科室工作人员）发动起来，使增产节约计划与各项具体措施结合起来，提高生产管理水平。同时注意把目前生产同明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及明年第一季度生产的准备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避免两个年度之间生产工作上的中断或脱节现象。

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当前增产节约情况报告的批语

作不低于今年第四季度工作的数量和质量。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八日

关于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和配备干部问题^[1]

(1953年11月10日)

德怀同志：

军事会议^[2]快要开了，你是否准备写一个书面报告，要写，现在就要着手了。我觉得有一个简明扼要的书面报告为好（讲时可加发挥），使人好去传达，免致传错，会上讨论时也眉目清醒些。如你无暇写，可要肖向荣^[3]照着你的意见去写。请酌定。

对于我们配备干部不满意，不但那个写信的同志一个人的意见，我估计有相当一些人有意见。我认为我们配备的干部一般是正确的，对此不满的人是不多的，但我们对于二、四方面军的同志应当提拔的可能有些未提拔，他们可能认为一方面军的人提拔得太多，而二、四太少和照顾不周，值得注意。请你找赖传珠^[4]、徐立

[1] 这是毛泽东写给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的信。

[2] 指在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

[3] 肖向荣，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4] 赖传珠，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

清^[1]、肖华^[2]、甘泗淇^[3]四同志一商此问题，可将那封无记名信给他们看，要他们对此加以注意，并征求他们的意见，把在这个问题上的缺点加以改变。

军事会议的末尾，有一段时间让人们对军委几年的工作加以评论，将下面对军委及军委各部相互间的不满意见尽量讲出来，然后加以分析批判，以期弄清问题，统一意志，极有必要。这样做的结果估计会是好的，不会损伤什么同志。如你同意，这个问题应列入议程，并在你的报告中提到。我记得军委召开会议的通知内已将检讨过去工作的意思写上去了。如这样做，请叫各部门同志作精神准备。

毛泽东

十一月十日

[1] 徐立清，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

[2] 肖华，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

[3] 甘泗淇，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



彭德怀关于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给毛泽东的请示信。



1953年，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中南海。



1953年，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中南海。

接受民主德国驻华大使柯尼希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3年11月12日)

大使同志：

我很高兴地接受您所呈递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的国书，并衷心感谢您的祝贺。

四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有了极大发展。在两国外交使团改为大使馆后，不但两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密切合作将更加增强，并且对于巩固以伟大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有着极大的意义。

德国人民在国家建设工作及争取和平的斗争中的重大成就，已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为全德和平及民主力量的坚强堡垒和维护欧洲及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我相信：在伟大苏联的援助下，在各人民民主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下，德国人民为建立统一、独立、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德国的正义斗争，必将获得更大的胜利。在这一斗争中，德国人民将永远得到中国人民的全力的支持。

大使同志，我热烈地欢迎您出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巩固德中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谨祝您在工作中获得完全的成功。

中央转发天津市委统战部 关于资本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 反映的报告^[1]的批语

(1953年11月20日)

[1] 指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1953年11月14日关于天津市资本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反映给华北局统战部并中央统战部的综合报告。主要内容有：一、国庆口号中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资本家波动很大，正面是歌颂拥护，但背地里牢骚满腹，其中尤以中小资本家为甚。资产阶级对总路线是不满的，但又无可奈何。他们要求保持现在的秩序，不甘接受“逐步过渡”，回忆起1950年“黄金时代”，不胜依依，言下悲叹：“让我们多喊几声新民主主义万岁吧。”资产阶级不愿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认为加工订货已经“不太自由”，公私合营就要被“溶解掉”。二、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态度大致可划分几类：第一类是中上层中长期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认为总路线是大势所趋，自己先走了一步，“自动走吧，何必让人家用鞭子赶呢”。第二类是中小企业，这是资产阶级的多数，认为总路线“大势所趋，但又无可奈何”，对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不甘心的，对当前改进生产，扩大经营抱着消极态度。第三类是小业主，认为总路线与己无关，手工业搞合作化还可以干几年，万一没有出路，可以再当工人。第四类是商业资本家，怨天尤人，非常不满。三、总路线口号公布以来，中小工业联营并厂、商业转业已经冒头。并厂的动机复杂，有“创造条件的”，有丢包袱的，有互为利用的，有和国家抗衡的。企业内部人浮于事，矛盾很多。商业资本家认为转业分上中下三策，上策转投资公司，中策转入公私合营工厂，下策转入工业，争取中上策，不得已求其下。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并告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一）此件值得注意，发给你们参考；（二）请你们注意各地资产阶级的动态，加强对他们的工作和教育。

中央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关于签订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 等问题的批语

(1953年11月21日)

周总理：

(一) 各件^[1]均看过，同意；(二) 同意签字、宴会、晚会等各项安排；(三) 签字时似应有我国公职民主人士到场，如是，则各件应先给他们一阅，请酌定。

毛泽东

十一月廿一日

[1] 指周恩来1953年11月21日报请毛泽东审阅的中朝两国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中朝两国政府谈判公报、中朝关于铁路的议定书、中朝关于技术人员的协定、中朝关于留学生的协定、中朝关于民航的换文和中朝关于难民的换文七个文件。

对彭德怀《四年来军事工作总结 和今后建军中的若干基本问题 (初步定稿)》的批语^[1]

(1953年11月)

可用。略有修改^[2]。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为1953年12月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准备的讲话稿的批语。

[2] 毛泽东对彭德怀《四年来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建军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初步定稿)》的修改主要有：(一) 在标题之下增加了副标题“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党的全国军事会议上的报告”和署名“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二) 将原稿中两处“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改为“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三) 将“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我国东北边境的安全时”，改为“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侵略我国台湾，并使侵朝战争威胁到我国东北边境的安全时”。(四) 将“按照毛主席历来的军事方针，就是发挥党委员会集体领导的原则，采取在党委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改为“按照毛主席历来的军事方针，就是根据党委员会集体领导和首长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在党委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将“至于强调个人领导，把个人的权力放在党委集体的权力之上的作法，是错误的”，改为“在有党委制存在的条件下，不适当过分地强调个人领导，把个人的权力放在党委集体的权力之上的作法，那就是不对的”。

关于揭露美军对朝中军民暴行问题^[1]

(1953年12月1日、3日)

—

金首相，并告杜平^[2]同志：

美国已在联合国大会提出所谓我方对“联合国军”士兵及朝鲜平民暴行的正式报告。外电称此事十一月三十日在联大进行讨论，美国并企图通过一个决议“谴责”我方。关于此事，我们须予反击。中国方面现准备由郭沫若同志以抗美援朝总会主席名义，用答复苏联文学报记者的形式，在联大进行讨论之时发表谈话，主要是揭发美国对朝中军民的暴行。我们意见朝鲜亦可考虑发表一个类似的文件。关于美国军队对朝中军民暴行的正式调查报告，我们也应发表。中国的调查报告已准备好。朝鲜方面关于美军虐俘的报告已见初稿，但尚须仔细校正。请派人即往开城与杜平洽商，关于美军对一般军民的暴行报告则尚未见到总的东西，拟请您指定负责同志立即进行整理、编写并校正，以便中朝报告可以先后公布。

[1] 本篇一和二是毛泽东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任金日成的两份电报。

[2] 杜平，当时任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代理书记。

此外，我们已派人去碧潼对已遣返的东场里战俘进行关于美方实施特务恐怖破坏政策来强迫扣留战俘的调查，并拟于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写出此项报告。拟请朝鲜亦即派人进行同类调查。

关于暴行及强扣战俘的调查，请朝鲜方面经过开城杜平同志与北京经常联系。

对以上各点您意见如何，请电告。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

—

金首相，并告杜平同志：

十二月二日来电^[1]悉。关于美军对朝鲜一般军民暴行，我们意见，应将朝鲜祖国阵线过去所发表的四个公报中的材料重加编订成为一个总的调查报告与美方虐俘暴行报告同时再予发表。因美方这次诬蔑我方的所谓暴行报告是包括了所谓对俘虏及对一般军民的

[1] 指金日成1953年12月2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关于揭发美军对朝中战俘暴行问题，我们方面准备以祖国战线名义发表。凡在统计数目中有不确实者拟均不公布。为校正美军虐俘报告初稿已指示外务省派人即往开城洽商，调查美方实施特务恐怖政策强迫扣留战俘一事，现由我方战俘调查委员会进行此项工作。今后有关暴行及强扣战俘的调查问题已指定南日同志经过杜平同志与北京经常联系。至于美军对一般军民的暴行报告问题，我们曾于1950年8月至1951年3月以祖国战线名义发表调查美军暴行公报共四次，并已转达联大，再收集材料亦不能超出上项范围之外。是否有重复发表的必要，仍请您电复为盼。

“暴行”在内的，是包括了全部朝鲜战争时期的。因此，我们亦须就美方在全部朝鲜战争期间（连一九五二年的残暴轰炸在内）对朝中战俘和一般军民的暴行提出全面报告作为有力的反击。如果我们不再发表其对一般军民的暴行，则不仅反击不够有力，且可能为美方钻空子。对此您意见如何，仍请电告。

我们现将来电转发杜平同志，并望杜平同志即与北京和平壤进行联系。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日

接受芬兰新任驻华公使孙士敦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3年12月2日)

公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公使呈递的芬兰共和国总统的国书，并对贵公使所转达的芬兰共和国总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人民及我个人的祝贺表示感谢。

三年多来中芬两国间的经济与文化的友好合作关系获得了显著的发展。我相信：今后在贵公使的努力下，贵我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将在现有的基础上日益密切。这种友好关系的增进不仅将使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更加巩固，且将对全世界人民所努力争取的世界和平有所贡献。

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芬兰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公使，在贵公使为加强中芬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协助。

我谨祝贵公使在工作中获得成功。

给黄炎培的信

(1953年12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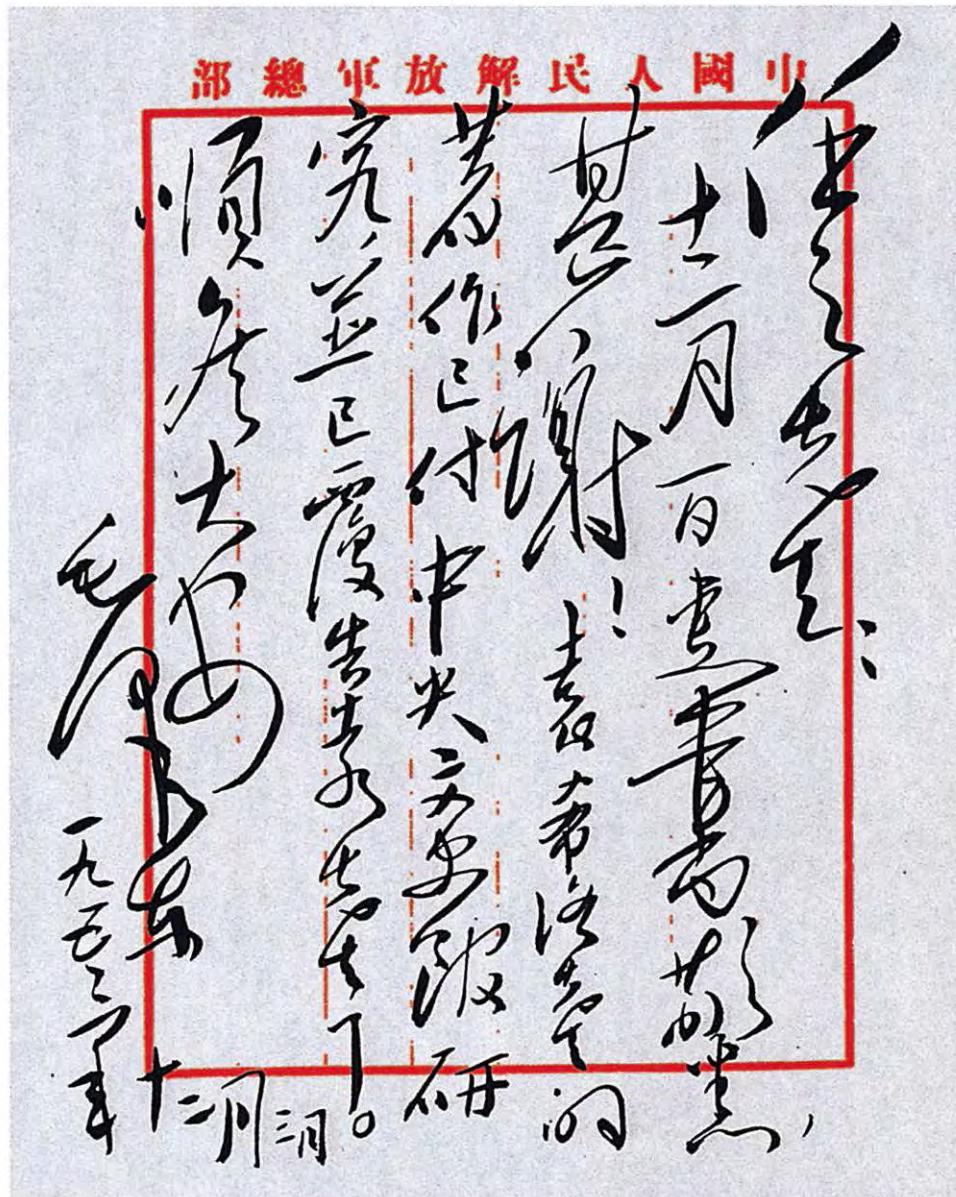
任之先生：

十二月一日惠书敬悉，甚谢！袁希洛先生的著作已付中央文史馆研究，并已复告袁先生了。

顺候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日



毛泽东致黄炎培信的手稿。

给袁希洛的信

(1953年12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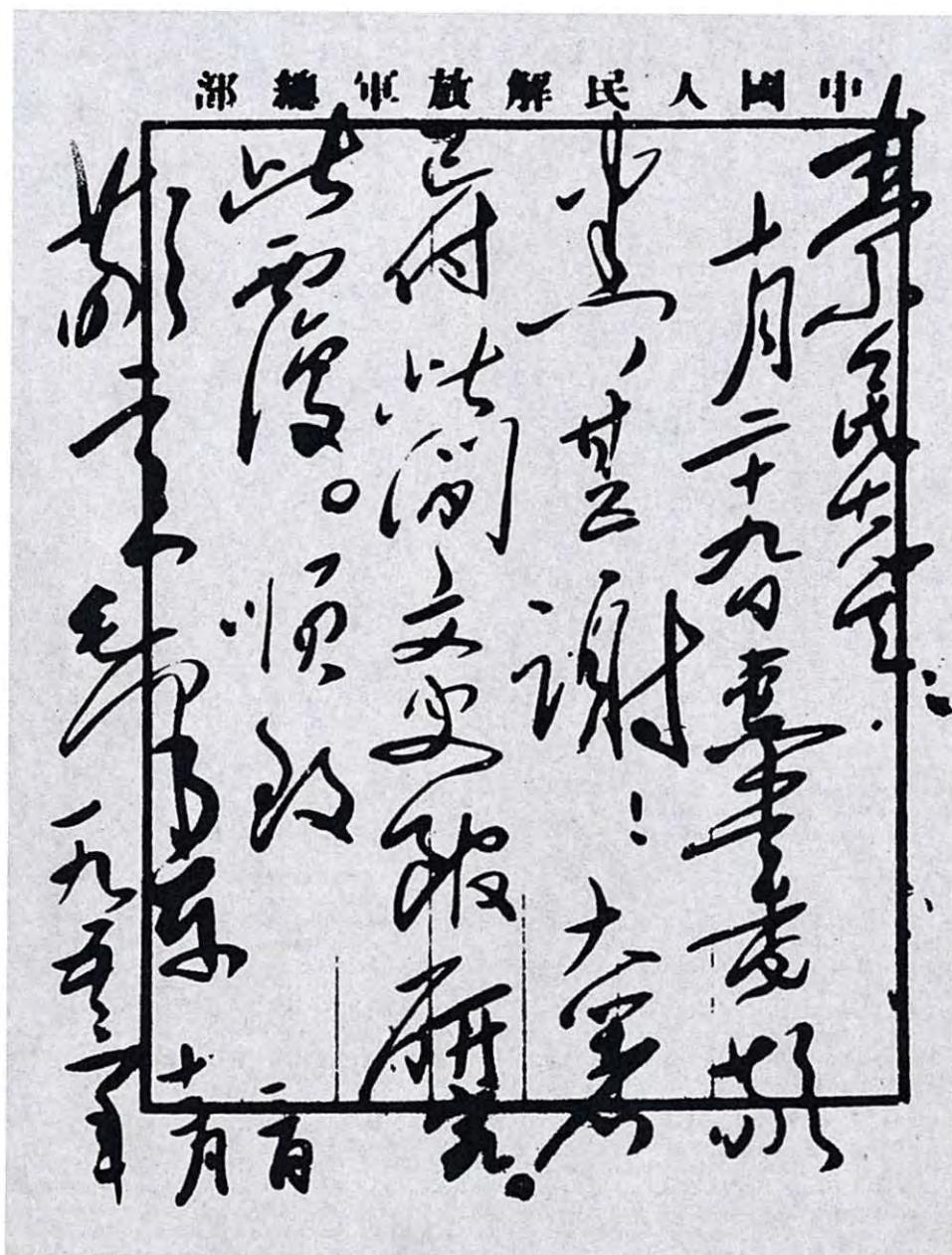
素民先生：

十月二十九日惠书敬悉，甚谢！大著已付此间文史馆研究。此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日



毛泽东致袁希洛信的手稿。

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1]

(1953年12月4日)

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胜利的航程》(油画)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关于为中央政治局会议准备文件 给杨尚昆^[1]的信

(1953年12月4日)

尚昆同志：

今天会议文件^[2]，除科学院一件外，我均已看过，请电话督促各同志均于会前看一遍，以便讨论。科学院一件，推至下次。

今晚应加上彭德怀^[3]同志准备在军事会议上作的报告一件，加以讨论、通过，并拟临时约刘伯承、叶剑英、聂、黄、张^[4]五同志

[1]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1953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准备讨论的文件。主要有：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党组关于过去工作检查和改进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的报告，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党组关于1953年出版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任务的报告，中共中央批准高等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高等工业学校行政会议的报告的指示，及中国科学院党委关于1953年工作情况的报告。

[3] 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4] 刘伯承，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军区司令员。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黄，指黄克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指张宗逊，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关于为中央政治局会议准备文件给杨尚昆的信

列席。请告各同志看文件。开会时间，待我起头〈床〉再定，也许要推迟一二小时。

毛泽东

十二月四日六时

关于通过公债条例及批准中朝协定 给周恩来的信

(1953年12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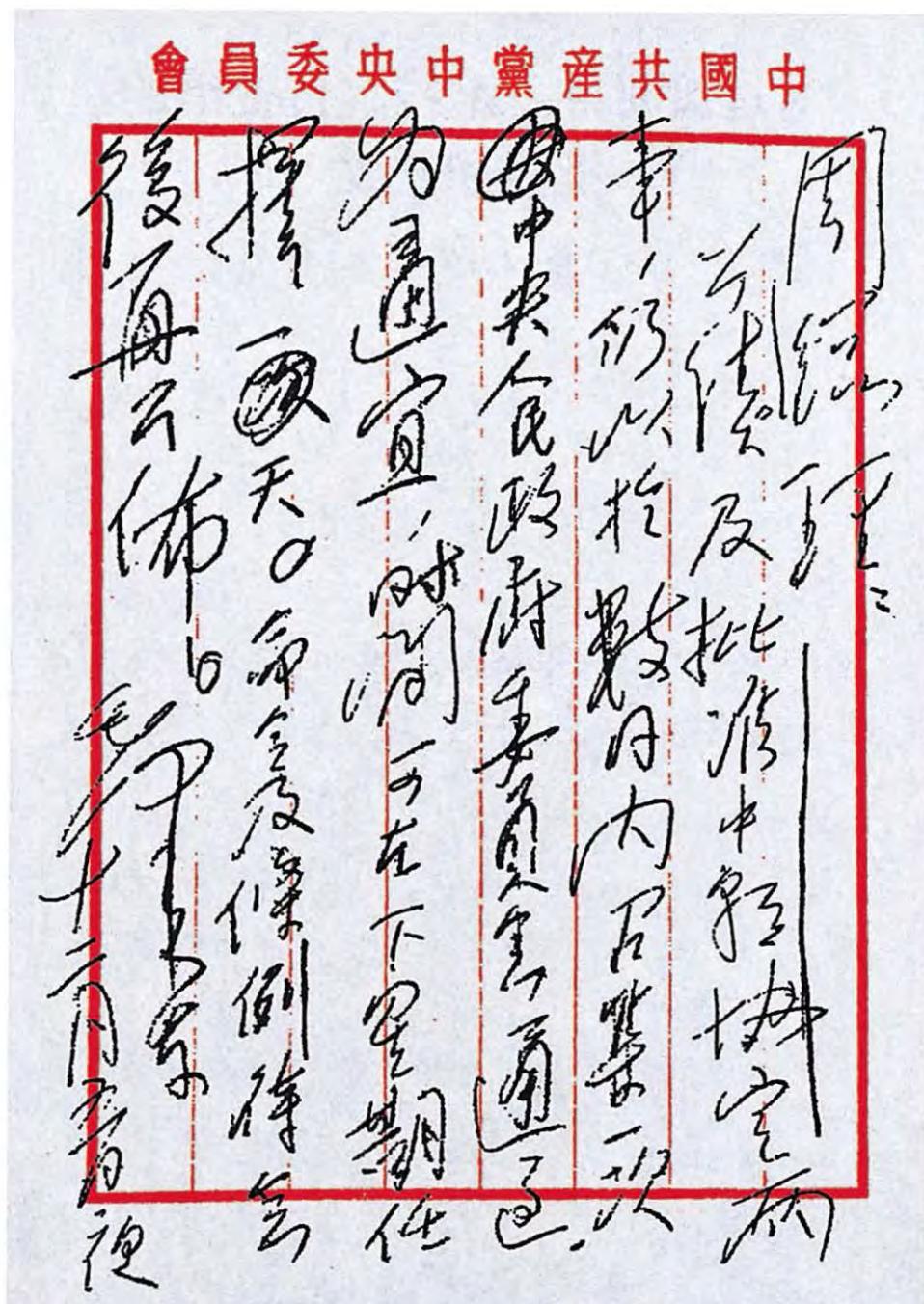
周总理：

公债及批准中朝协定两事^[1]，仍以于数日内召集一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为适宜，时间可在下星期任择一天。命令及条例^[2]待会后再公布。

毛泽东
十二月五日夜

[1] 指批准并公布《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

[2] 命令，指毛泽东为公布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而签署的中央人民政府命令。条例，指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这两件均于1953年12月10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布。



毛泽东致周恩来信的手稿。

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的 批语和修改

(1953年12月7日、13日)

—

乔木^[1]同志：

宣传大纲请你们于数日内写好，先经你及凯丰、伯达^[2]几位同志看过，最好座谈一下，于十二月十一日^[3]以前交我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七日下午七时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2] 凯丰，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3] 胡乔木1953年12月9日给毛泽东写信说：“总路线宣传与学习提纲的第六次稿今日上午约请伯达、凯丰、胡绳、熊复、许立群、于光远、马洪等同志讨论后，认为尚须作相当的修改，现正由凯丰同志修改，后日（十一日）可以送上。”毛泽东10日夜阅后写了如下批语：“如来不及，十二日交我即可。”

二

乔木同志，告尚昆^[1]：

此件^[2]已看一遍，比前好多了。我作了一些增改^[3]，请你邀伯达、凯丰看一下，看是否妥当；如有意见请告我；如无意见即送尚昆照扩大名单印发各同志阅看。最好今天即能印发，并请各同志明天（十四）即看一遍，准备提出修改意见。估计还会有些修改的。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三日早

三

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按毛泽东的要求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的草稿。

[3] 毛泽东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所作的修改，主要有四处，本篇三、七是毛泽东加写的，五、六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改写和加写的。

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

四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1]

五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

[1] 这是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中引述的经毛泽东最后确定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表述。这一表述，同周恩来1953年8月在全国财经会议的结论中所引述的毛泽东关于这一总路线的表述，在文字上略有差别。

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十八年，这十八年中已经过去了四年），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六

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是必要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之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由于上述的矛盾，这些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资金很多浪费，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小或甚至没有，因而影响到工业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影响到国家计划受到破坏。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这个广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合理的发展以适应国计民生的需

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全部实现。

七

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如像中国的张国焘^[1]，苏联的贝利亚^[2]），因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当地过分地去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

[1] 张国焘，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1935年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1938年4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离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

[2] 贝利亚，曾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因反党和反国家罪行，于1953年6月被清除出党，同年12月被处决。



1953年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12月8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一起步入勤政殿投票站投票。图为毛泽东投票选举西单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3年12月，毛泽东接见西单区委书记杜若。



《毛泽东在中南海选区》(中国画)

给戴毓本^[1]的信

(1953年12月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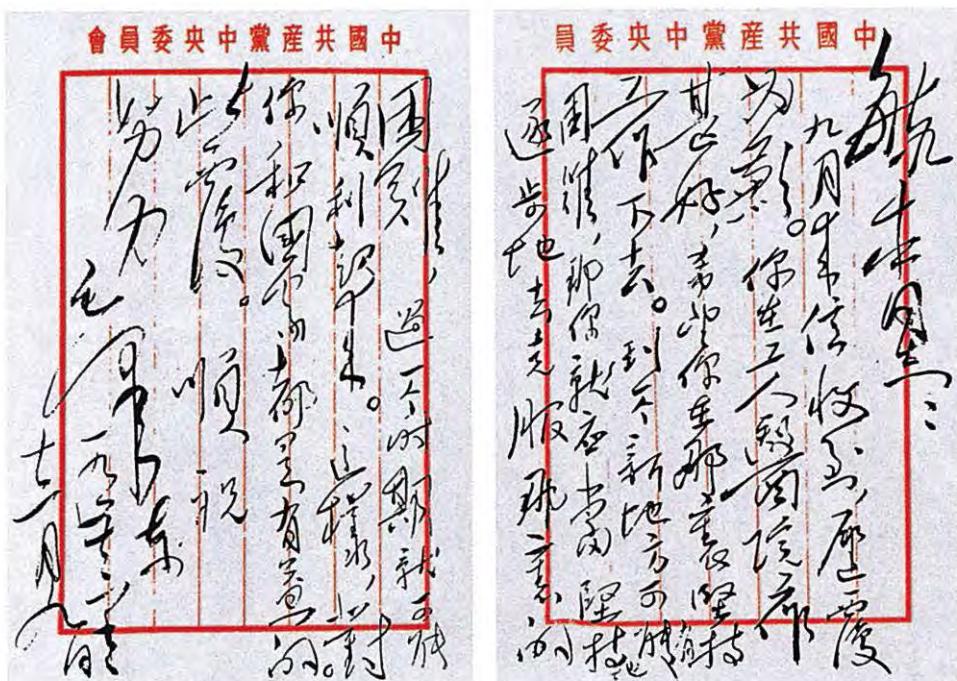
毓本同志：

九月来信收到，迟复为歉。你在工人医院工作甚好，希望你在那里坚持工作下去。到一个新地方可能有困难，那你就应当坚持地逐步地去克服那里的困难，过一个时期就可能顺利起来。这样，对你和国家都是有益的。此复。顺祝
努力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九日

[1] 戴毓本，五四运动后曾在毛泽东等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当时在唐山工人医院工作。



毛泽东致戴毓本信的手稿。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和统战人士安排问题^[1]

(1953年12月9日)

必须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不这样做，一切矛盾不能解决，公私、劳资、资资、劳劳、国劳（公公）的矛盾，不可终日。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三类方法：第一类，苏联办法，不见得完全好，生产低落，资产阶级破坏。第二类，发行公债购买，十年买完，但谁出钱买公债、谁付息？资产阶级也不会那么满意。第三类，我们现在的办法，十三年，工人付给资本家利润，资产阶级可养活起来，一段时间，企业还归他们管着。我们出了钱，资本家还会调皮？

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是列宁提出的，但苏联没有怎么搞起来。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是否在商业方面多搞了一点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现在的办法，不仅使资产阶级不搞破坏，还要使他们的生产增长。还有，我们现在对私营工商业“一下吞不了”。三年半的经验，我们找出这条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道路。

[1] 这是毛泽东1953年12月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有个资本家拿出七亿元^[1]钱给了和尚，把四十几个手表摆着看。这是一个例子，值得注意，是阶级要灭亡的心情，把钱乱花掉。我们要向他们的子女做工作，向他们的左右做工作，向他们本人做工作，消息要灵通，多做工作。

公私合营，实际上百分之九十是社会主义。对私营企业国家可投资一部分，这很便宜，而国家新建企业多费劲。把公私合营企业当作我们自己的，这很有味道。

新城市堵住资本主义商业，要按需要和可能尽力争取做到。如果我们来不及堵住，那里又有需要，有一点资本主义商业，也没有什么特别可怕。问题是我們没有大力去堵住。

根据地下工厂大量发展的情况，第二个五年计划让不让私人资本主义发展，这要由我们的政策来决定。但政策决定于需要，如果社会对私人资本主义有需要，那还是要发展。私营工厂，十人以上的可能有残留，十人以下的可能有发展，还可能有新生的。社会有需要时，让它发展，想办法管起来，以后再合营。十年搞掉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这没有什么急躁冒进。改造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可能不要十年，也许只要七年。

已过了四年，天下小变；再过四年，天下大变，包括人、经济、文化、社会舆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明年一定要比较稳，后年大进一步，突飞猛进还在后两年。撑着石头打炮洞，淹不死人。

基本上赞成这个计划，准备修改。大致控制数字，还要看发展。总之，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每年到这里讨论三四次，至少两次。

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一定要给资方分红利，十三年准备支出五

[1] 指人民币旧币，旧币1万元相当于1955年3月1日起流通的人民币新币1元。下同。

十万亿元给资本家。这可能成为另外一种方式的购买，比较行得通。工人付给红利，养活资本家。工人和我们党内都应当意识到这一点。这还不是仁至义尽？“新民主主义那么好”，资本家称赞的，就是这一条。

私营企业要多少年才实行国营？可能有先有后，要看发展，看看他们的生活、社会、人心等。今天政府会议上李烛尘^[1]讲话，对实行国营表现新的积极性。要培养这样一批人。实行国营，资本家的前途是光明的，今后可当工人，就是拿工钱吃饭。

统战人士的安排问题，是一个策略方针问题。他们可以当全国、省、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担任政府职务。

大体维持现有统一战线，还是缩小或者很大缩小？

（周恩来：共产党和最可靠的人的比重，要占绝大多数，这方面比过去增多，由他们掌权，管业务。资产阶级、民主人士、起义人员的作用比过去小了，在这个少数中，资本家可比往日多一点，其他方面可少一点。）

削掉一小部分太烂了的人，还可以安排他们在统一战线组织里。理由是安排这些人没有坏处。要正确认识统战组织成分不纯的问题。瑞金时代组织最纯洁，但有一个缺点，形式纯洁，却孤立了自己，政权不稳定，要搬家。搬到延安，组织不纯洁了，表现了灵活性。说共产党没有灵活性，我不相信。从延安起组织不纯，不纯，日子就好过了。到了北京组织又不纯了，许多人反对，特别是青年娃娃。要他们看《水浒传》，水浒寨百分之九十以上不是劳动人民，水浒寨是一个很好的统一战线，清朝政府最厉害，能用汉人。

[1] 李烛尘，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统战人士除个别人外，尽量安排他们当人大代表，担任政府职务，但安排他们管业务要谨慎。这不影响共产党及共产党同情者的掌权。

我们的国家仍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

统一战线中，工农联盟，是工人阶级同劳动人民的联盟，对这第一个联盟没有争论。同劳动人民的联盟，时间会很长，农业要全部变成国营农场，工农才会只是职业上的区别，无工人农民之分。第二个联盟，也就是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的联盟。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是资产阶级问题。资产阶级是一个敌对阶级，但不同于别的敌对阶级，它同我们合作。不善于区别能合作和不能合作的敌对者，就会犯路线错误。

一九四九年农村不能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那时农村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就是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革命。就中华民族来说，首先是中华民族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现在新的矛盾产生了，农村里产生新的资本主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区乡干部有余粮。当然他们不是资本主义分子，但不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倾向便要发展。所以要大大宣传总路线，宣传农业集体化。那时，城市也不能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国营经济才接收，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摊子没有摆开，没有做出榜样，优势没有形成。现在是应该也有可能大大宣传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

对胡乔木^[1]关于在他暂离期间 由凯丰^[2]列席中央会议等问题的 请示^[3]的批语

(1953年12月10日)

刘、周、朱、陈、高、小平、仲勋、尚昆阅，退少奇处理。

(一) 乔木暂离时期，凯丰列席中央会〔议〕是必要的；(二)
文字问题待会谈。

毛泽东
十二月十日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2] 凯丰，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3] 胡乔木1953年12月7日在给毛泽东、刘少奇的请示信中提出：
一、“在我即将离开北京并暂时离开宣传部工作的条件下，凯丰同志似有能经
常列席中央会议的需要”，“因宣传部负着每天指导宣传工作特别是报纸评论
的工作，而仲勋同志现在对宣传部工作过问的可能很少，所以希望中央对此
能予以格外的考虑”。二、少数民族文字问题和汉字改革问题的两个文件均已
印发，关于少数民族文字问题，拟由政务院以指示形式发布，希望能在最近
的中央会议上通过。汉字改革问题较为复杂，盼中央能对所提改革办法作一
原则指示。

对统战部召集人物安排工作会议 请示报告^[1]的批语

(1953年12月12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明年九月才召集，安排会议太早了不好，
以在明年春末夏初时为宜。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二日

[1] 指中共中央统战部1953年11月17日给刘少奇并报毛泽东、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为了统盘研究中央及各省、市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时安排民主人士的具体方案，拟于1954年1月间召集一次人物安排工作会议。会议内容包括：审查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委员会和统一战线组织中民主人士所占比例及具体的人事安排方案；拟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第二届政协中民主人士的比例、名单及选出地区和单位的初步方案。

接受朝鲜驻华大使崔一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3年12月12日)

大使同志：

我非常高兴地接受您呈递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的国书，并衷心感谢您的祝贺。

三年多来，中朝两国人民在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斗争中，结成了极深厚的友谊。最近我们两国间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的签订，更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了两国之间久已存在的、牢不可破的友好互助关系。我们之间日益坚强的团结无疑地将对保障远东及世界和平事业继续作出贡献。

我确信：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国家兄弟般的援助下，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下，勇敢而勤劳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在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及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事业中得到新的光辉的成就。

我热烈地欢迎您出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加强并发展中朝两国之间兄弟般的友好互助合作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谨祝您在工作上获得完全的成功。

接受丹麦驻华公使格瑞杰生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3年12月12日)

公使先生：

我高兴地接受阁下所呈递的丹麦国王陛下的国书，并对您的祝贺表示感谢。

中国人民对于中、丹两国人民间商业及文化关系的发展，甚为重视，并相信这种关系的发展对于促进两国人民友谊，以及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帮助的。

我欢迎阁下出任丹麦王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公使，并愿对贵公使旨在加强贵我两国友好关系的工作予以协助。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贵国国王陛下健康。



1953年12月12日，毛泽东和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与会人员合影。

对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 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3年12月13日、22日)

—

即退陈伯达^[2]同志，尚昆^[3]同志。

第（七）节^[4]加得好，但还应发挥一点，可引用过去决议中的

[1]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曾提交中共中央于1953年10月26日至11月5日召开的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讨论和征求意见，12月16日作为中共中央的正式决议下发，并在1954年1月9日《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本篇一、四是毛泽东在决议起草过程中和决议发表前写的批语，其中：一写在决议（草案）的第三次印稿上；四写在邓子恢1953年12月18日为送审决议最后修改稿给毛泽东的信上。本篇二、三是毛泽东对决议稿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文字。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4] 指决议稿起草过程中加写的第七点，主要内容是：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运动中，要继续切实注意和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中指出的“要满腔热情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的指示，必须执行适当照顾单干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政策，发挥单干农民可能的生产潜在力量，给以必要的贷款和可能的技术援助，帮助他们克服所遇到的困难，而避免受富农、高利贷主和投机商人的剥削。

一些话。改好，即送尚昆同志印发扩大人数那些同志看，最好今天能印发，请他们明天（十二月十四日）准备提出修改的意见。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三日早

二

现有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成为引导农民过渡到更高级的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的简便形式。也就是说，这是自然地不免〈勉〉强地吸引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这种形式，使个体农民和加入了互助组的农民在他们进到高级的、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组织的时候不感到突然，而是事先有了精神的和物质的准备的，因而能够避免由于突然上升而引起的种种损失。

三

中央认为各级党委有必要更多和更好地注意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准备逐步试办和逐步推行的条件，继续贯彻“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方针，从而带动整个互助合作运动的前进。目前许多地区的党委在这方面注意太少，缺乏领导或没有领导的状态，必须加以改变。

四

刘、周、陈、朱、小平^[1]阅，交邓子恢^[2]同志处理。

在报上发表，并写一社论^[3]，同时广播。

毛泽东

十二月廿二日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朱，指朱德。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

[2]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3]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于1954年1月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时，《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题目是《正确地贯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1953年，毛泽东视察高碑店时，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并作重要讲话。

关于看望徐悲鸿^[1]夫人的信

(1953年12月13日)

—

静文同志：

十月间的信和徐先生所绘奔马，早已收到，甚为感念。兹派田家英^[2]同志询问你们的情况，如有困难，请告知为盼！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

田家英同志：

请你持此信去访问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看其有无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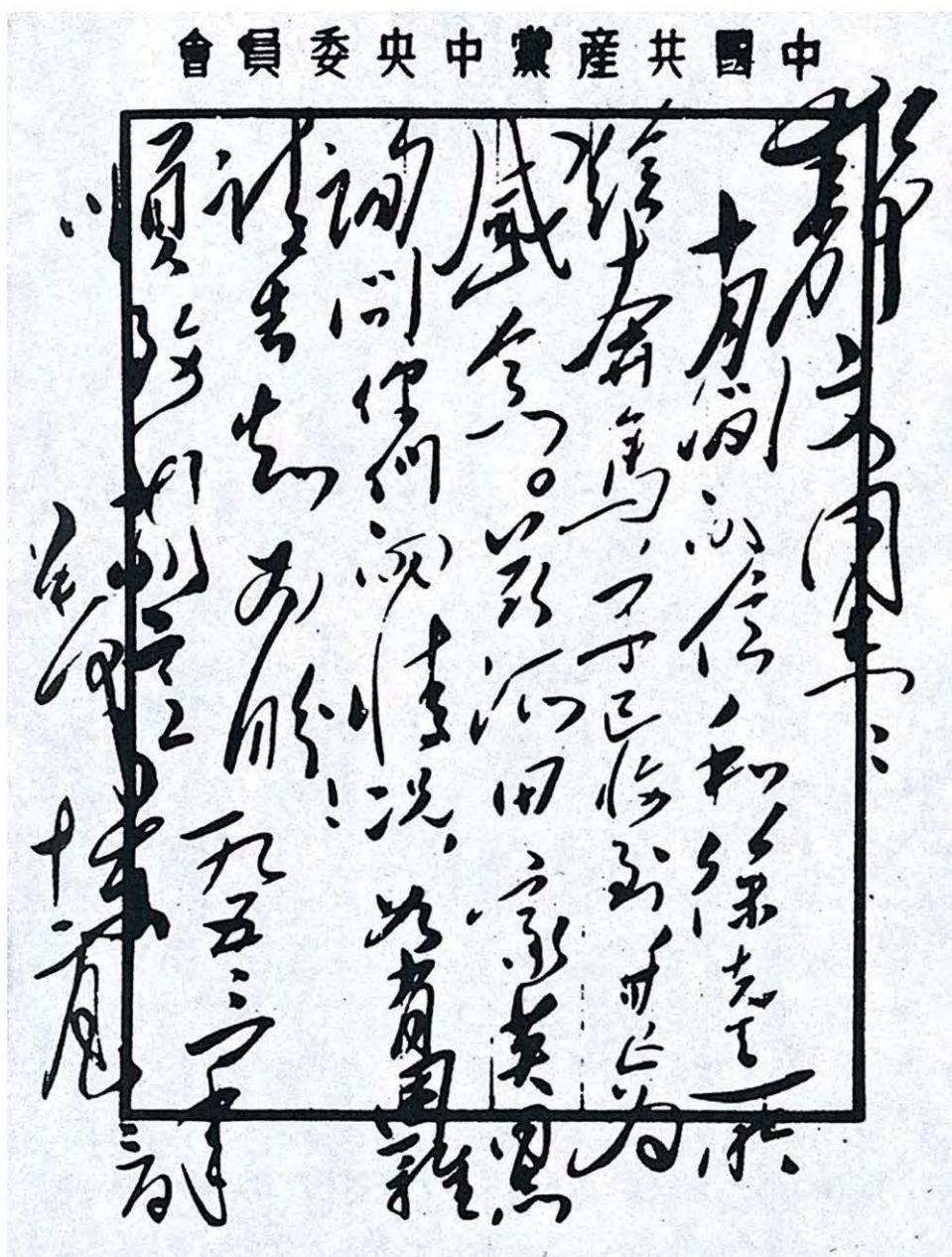
[1] 徐悲鸿，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
1953年9月26日因患脑溢血病逝。

[2] 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是否需要帮助（政府是否已有帮助），告我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三日



毛泽东致廖静文信的手稿。

接受苏联驻华大使尤金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3年12月15日)

大使同志：

我非常高兴地接受您呈递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国书，并衷心地感谢您的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间的兄弟般的友谊，四年来获得了巨大的进展并日臻巩固。中国人民一贯重视苏联的友谊，今天在从事大规模国家经济建设事业中，更加深切地认识到苏联伟大友谊的无上珍贵。中国人民一定永远以始终不懈的努力来不断加强中苏两国间的亲密的友好同盟和全面合作。我同样确信：我们两大国家间的牢不可破的同盟和合作不仅完全符合于两国人民的利益，并且对于巩固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对于保障远东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事业起着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

大使同志，我极为热烈地欢迎您出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巩固中苏两国友好互助合作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谨祝您在工作上获得完全的成功。



1953年，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

对金门作战建议的批语^[1]

(1953年12月19日)

退彭。此意见^[2]可注意。

毛泽东

十二月十九日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部长张震1953年12月16日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信的批语。

[2] 指张震信中提出的意见。信中说：敌人在金门已修筑了较坚固的地下工事，攻占金门想在一天或一晚解决战斗的可能性不大。如时间拖延较久，就须将台湾可能增援计算在内。再有，华东海军在上、下大陈岛未打下前不能全部参战，如制造大量机帆船不但有很大困难，而且也不合使用。作战物资所需甚巨，如第一线机场无保证，仅靠一条公路运输，困难很大。从使用兵力看，还须南下三个军。我总觉得，金门等于下围棋的一个死子，攻击主动权在我手中，只要我准备充分，任何时候都可发起攻击。在条件尚未充分具备时，以不过急发起战斗为好。彭德怀、聂荣臻将此信送呈毛泽东。

同意目前不打金门^[1]

(1953年12月22日)

刘、周、朱、彭、陈毅^[2]同志阅，请彭处理。

陈毅同志意见，目前不打金门为有利，否则很被动，且无攻克的充分把握。我同意此项意见。需费近五万亿元^[3]，无法支出，至少一九五四年不应动用如此大笔经费。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副部长王尚荣1953年12月19日关于攻击金门费用概算报告上写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的批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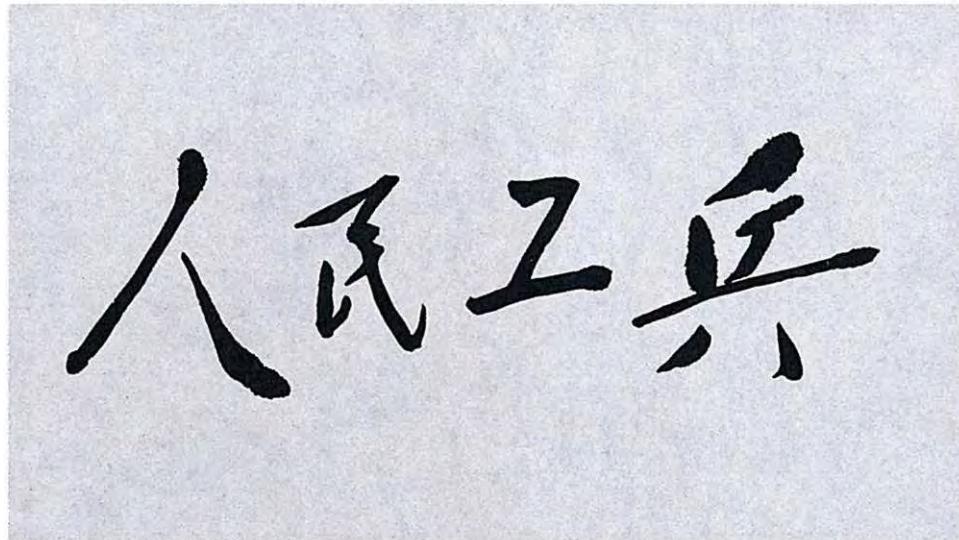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华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

[3] 指人民币旧币，一万元相当于人民币新币一元。

为《人民工兵》题名^[1]

(1953年12月23日)

人民工兵



毛泽东为《人民工兵》题写的刊名。

[1] 20世纪50年代，工程兵为更好地开展政治工作，创办了《人民工兵》杂志，毛泽东亲自题写刊名。

给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的贺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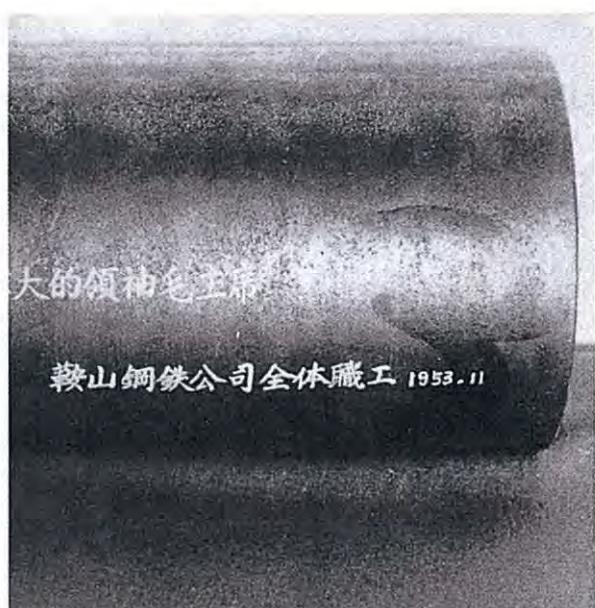
(1953年12月24日)

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同志们：

你们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来信收到了。鞍山无缝钢管厂、鞍山大型轧钢厂和鞍山第七号炼铁炉的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一九五三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我向参加这三项工程的全体职工、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和帮助鞍山建设事业的全体苏联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我国人民现正团结一致，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你们的英勇劳动就是对于这一目标的重大贡献。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发挥你们的智慧和力量，争取更大的成就。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鞍钢全體職工向毛主席報告三大工程開工 毛主席覆電祝賀鞍鋼職工

一

九

五

三

年

十一

月

二

日

大

慶

喜

樂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捷

報

喜

慶

勝

利

为《铁道兵》题名^[1]

(1953年12月25日)

铁道兵



毛泽东为《铁道兵》题写的刊名。

[1] 1953年12月25日，毛泽东专门接见了即将出任铁道兵司令员的王震，并亲笔为《铁道兵》报题写了“铁道兵”三个大字。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任务^[1]

(1953年)

(一)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中国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这个革命，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算起，经过了二十八年，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世界形势的改变，国内形势的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以苏联为首的国际革命力量的支援，而取得了胜利。这是继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之后的第三个伟大的胜利。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产生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产生了许多人民民主的国家。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东方世界的形势。这三个胜利，产生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具有八亿多人口的政治和经济的强大的阵营，资本主义阵营是大大削弱了。如同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各种不可能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阵营是不巩固的，经过一些时间以后，势必发生分裂和冲突，并且可能引起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而社会主义和民主的阵营则将互助团结、日益繁荣、日益强大、日益巩固。

[1] 本篇题目是毛泽东拟的，手稿上有“一九五三年”字样。毛泽东这篇文稿只写了第一条，没有写下去的原因不详。

对学校领导骨干、教材等问题的指示

(1953年)

1. 领导骨干：大专院校，中学必须有骨干。骨干配备大专由中央组织部负责，中学由地方负责，从宣传部门，青年团干部下去。有了好校长就有好教师。
2. 教材问题：集中力量编，语文、历史等原则问题，由陈伯达同志等解决。
3. 整顿小学：防止过“左”，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要照顾农村特点。私塾也要让其存在。小学有三类：(1) 中心小学、完全小学；(2) 一般小学；(3) 速成小学。小学问题主要便利农民子弟入学。教师只要不是现行犯，不作反革命宣传就可存在。对超龄学生不应赶出，首先教好。民办可办，不要求太严，群众需要自愿，学费可收。五年一贯制暂缓执行，提早了。小学生不能都升学，这不叫失学，要加强劳动教育。
4. 学生健康，高中大部分要有助学金，要增加营养，减轻负担。
5. 教育工作重点和关键：重点是高等学校和高中，关键问题是师资。中学要重点办好一批。如何办好高中，这是我们的重点任务。
6. 招生要注意成分。
7. 速成识字法，在农村有局限性。应是群众自愿的业务教育。

8. 中央教育部任务：（1）方针计划；（2）教材。
9. 总的方针和工作重点：过去主要毛病是盲目冒进，不能适应建设，我们任务是培养干部和逐渐适应生产发展，目前在培养干部。

青少年的教育

(1953年)

鲁迅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鲁迅很懂得这个事情，他提倡孩子要活泼，要顽皮。他说“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1]。在有些地方要让我们的后一代学我们；但有些地方就决不要后代再学我们，再学我们就糟糕。我们总是中孔夫子的毒太深了。不仅学校如此，就是托儿所也要很好注意。现在不把孩子送到托儿所还好，一送到托儿所就“机械化”了。在这些方面，我们要下很大的功夫，用很多方法，把我们的青年、儿童变得朝气蓬勃，生龙活虎一样。有这样的人民，建立这样一个国家，那我们中国就了不起。要懂得人在幼年、青年的时候，正是性格、品质慢慢形成的时候，如果在这方面不会教育他们，将来的损失就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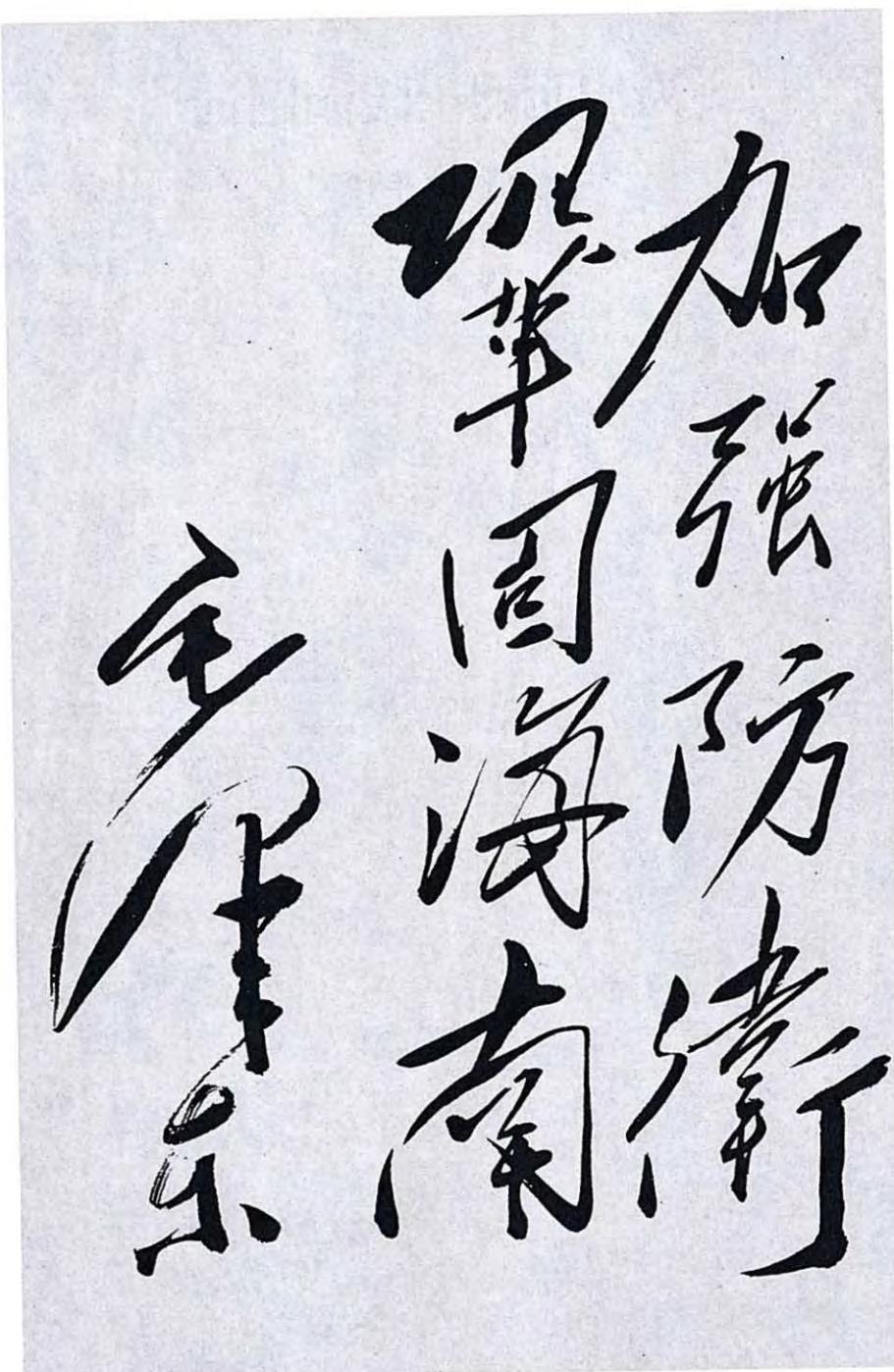
[1] 参见《鲁迅全集》第六卷第84页。

为海南岛海榆中线公路纪念碑题词

(1953年)

加强防卫，巩固海南。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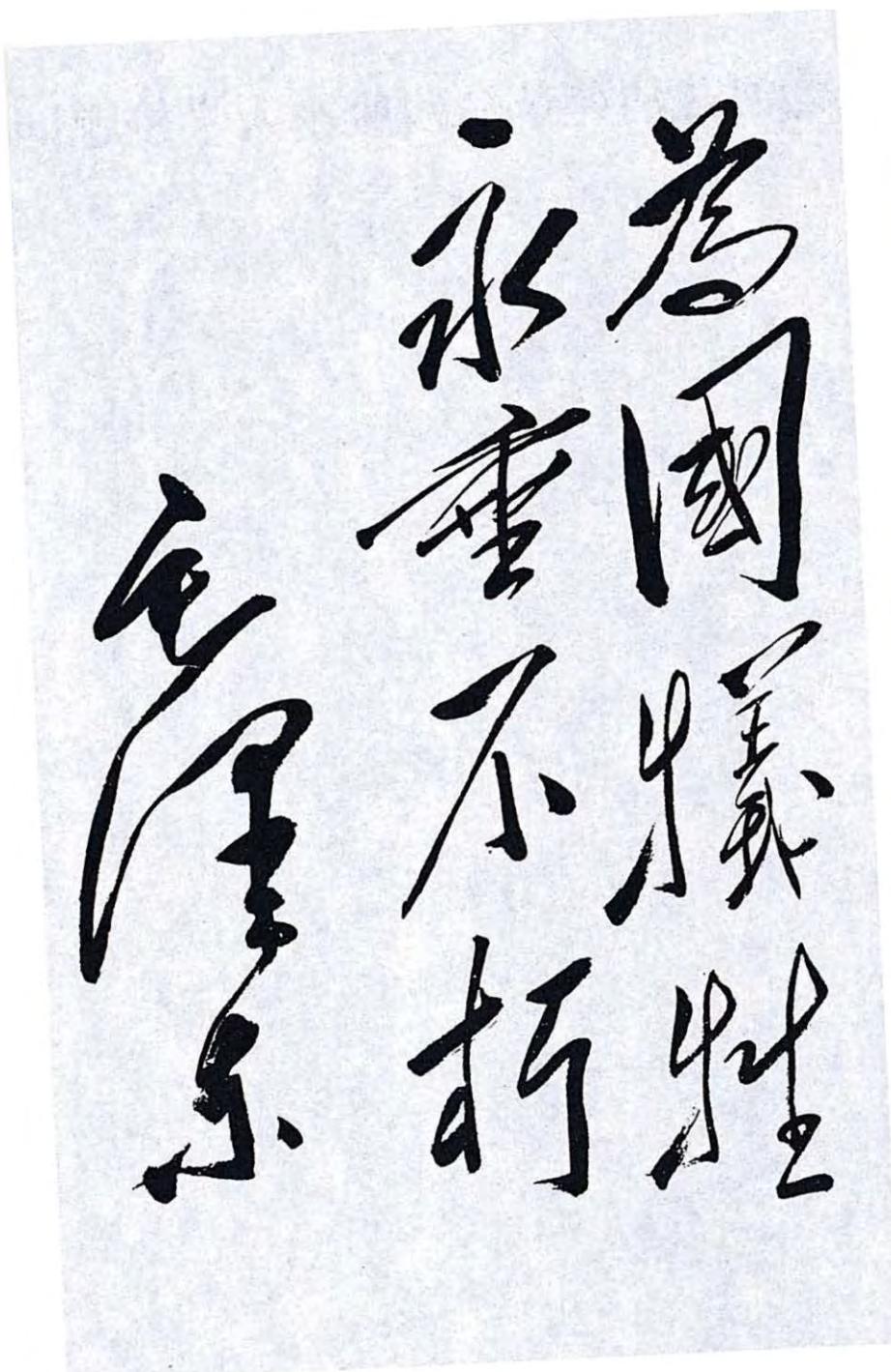
毛泽东为海南岛海榆中线公路纪念碑的题词。

为华北烈士陵园题词

(1953年)

为国牺牲，永垂不朽。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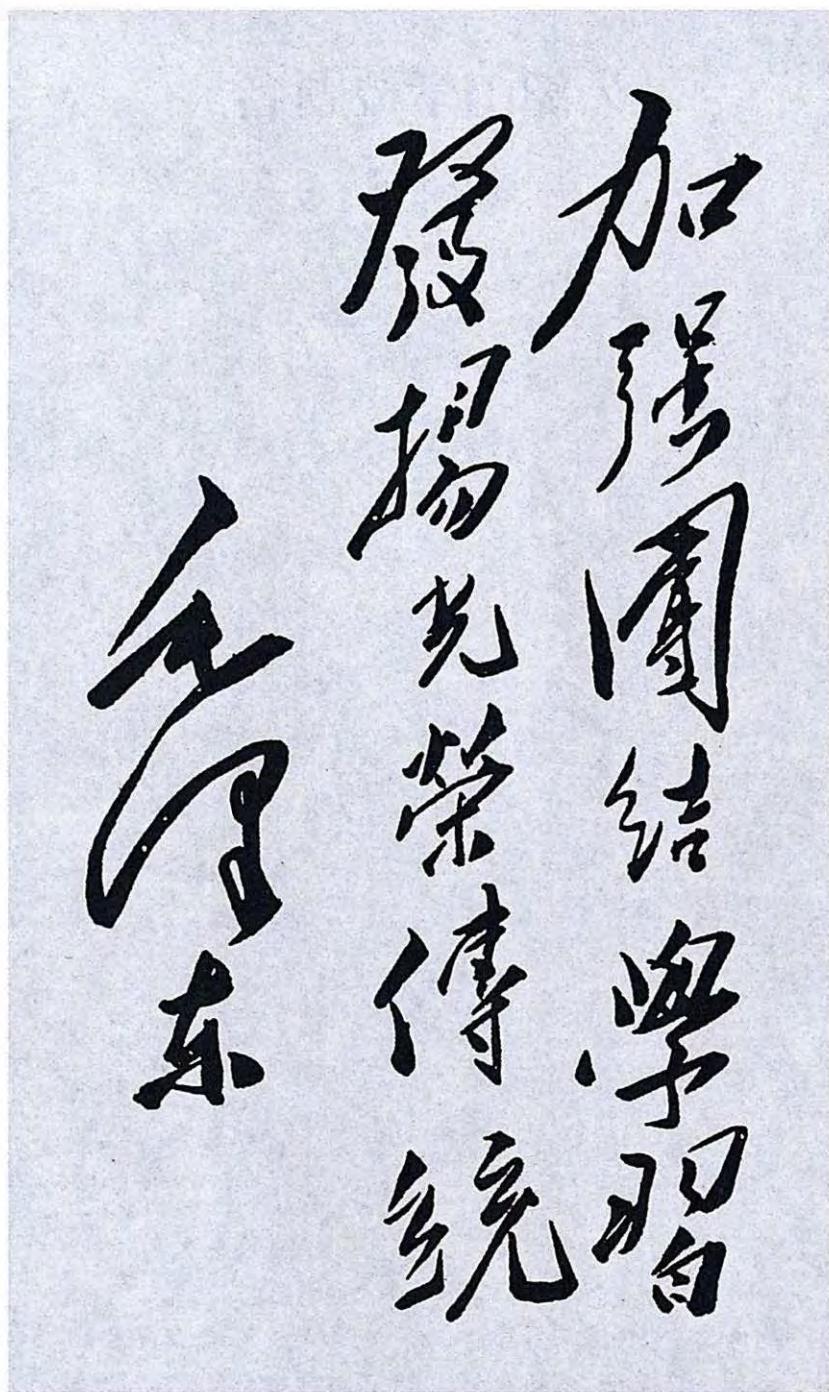
毛泽东为华北烈士陵园的题词。

为河北清苑革命残废军人学校题词

(1953年)

加强团结学习，发扬光荣传统。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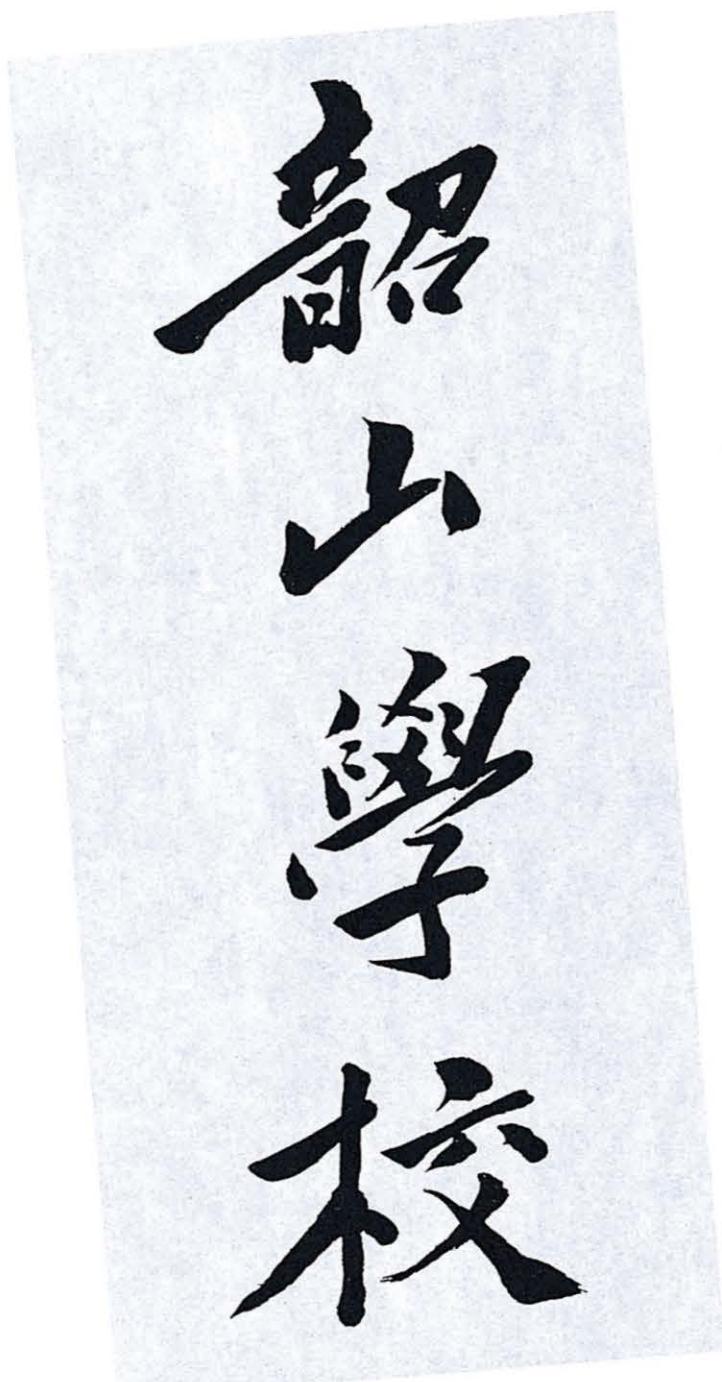
毛泽东为河北清苑革命残废军人学校的题词。

为韶山学校题名^[1]

(1953年)

韶山学校

[1] 毛泽东命名并亲笔题写校名的“韶山学校”，其前身是1921年毛泽东倡导创办的毛氏族校。1952年冬，毛泽东得知家乡兴建了学校，甚为高兴，欣然题写了“韶山学校”四个大字。1953年正式更名为韶山学校。



毛泽东为韶山学校题写的校名。

1954



195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

在转发邓子恢^[1]关于老根据地干部 情况报告时加写的话^[2]

(1954年1月4日)

一

此外，不但老根据地应这样做，一切晚解放区也应大体上这样做，也应用极大的注意力去培养和提拔地方干部。

二

所谓干部地方化，当然不是说地方高级和中级领导机关都要用本地人，不能用外地人，相反是必须要用必要的外地人的，现在如此，将来还会如此。在农业机械化实施的时候，农村技术人员也是要用一些外地人的。我在这里说的主要是指目前县区干部的情况。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1954年1月4日转发邓子恢关于老根据地干部情况报告的批语稿时，加写在末尾的一段话。本篇二是毛泽东写的一个批注，加括号写在邓子恢报告中关于干部地方化的一段文字之后。

对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 决议草案的修改^[1]

(1954年1月)

一

阶级是由党领导着的，党又是由它的中央委员会领导着的，党的中央委员会还紧紧地依靠着一批忠实的有能力的高级干部。因此，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的团结，尤其是决定革命胜利的最主要的关键。

二

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

[1] 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是在北京起草后送到杭州请毛泽东审阅的。在毛泽东主持下，有跟他一起去杭州的同志参加，对决议草案作了大量的修改，但最初的改稿未能保存下来。现在看到的是1954年1月9日杨尚昆从杭州带到北京的决议草案稿。收入本篇的毛泽东的两处修改，就是改在这份决议草案稿上的。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文字。

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

关于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问题的建议

(1954年1月7日、8日)

—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信及决议草案^[1]收到。

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2]的几位同志，林彪^[3]同志亦表示同意。

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4]。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

[1] 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草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

[2] 毛泽东当时在杭州。

[3] 林彪，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正在杭州养病。

[4]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于1954年2月6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

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报告可分为三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述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此报告有三五天工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廿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余请尚昆^[1]同志面报。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

全会应发一简单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他都可不公布。又及。

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二

少奇同志：

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稿宣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毛泽东
一月七日

三

刘少奇同志：

杨尚昆同志于七日下午十时由此返京，九日可到，带有修改了的决议草案及我的一封信。我在信中建议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决议以示慎重，目前大多数中委在京，召开全会甚为容易，请待尚昆到后会商酌定。

毛泽东
一月八日上午三时

刘少奇同志：杨尚昆於上月
下午十时由北返京，九时到，带有
修改了的决策草案及我的一封信。
我在信中建議^{以求慎重}開一次中央全會通
過这个決議，目前大綱中雖未定名，
開全會甚為容易，請你斟酌後電商
商定。毛泽东 一月八日下午三时

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的手稿。

宪法起草工作计划

(1954年1月15日)

少奇同志，并中央各同志：

宪法小组的宪法起草工作已于一月九日开始，计划如下：

(一) 争取在一月三十一日完成宪法草案初稿，并随将此项初稿送中央各同志阅看。

(二) 准备在二月上半月将初稿复议一次，请邓小平、李维汉^[1]两同志参加。然后提交政治局（及在京各中央委员）讨论作初步通过。

(三) 三月初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在三月份内讨论完毕并初步通过。

(四) 四月内再由宪法小组审议修正，再提政治局讨论，再交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

(五) 五月一日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将宪法草案公布，交全国人民讨论四个月，以便九月间根据人民意见作必要修正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最后通过。

为了在二月间政治局便于讨论计，望各政治局委员及在京各中央委员从现在起即抽暇阅看下列各主要参考文件：

[1] 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他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 (一) 一九三六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有单行本）；
- (二) 一九一八年苏俄宪法（见政府办公厅编宪法及选举法资料汇编一）；
- (三) 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见人民出版社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该书所辑各国宪法大同小异，罗、波取其较新，德、捷取其较详并有特异之点，其余有时间亦可多看）；
- (四) 一九一三年天坛宪法草案，一九二三年曹锟宪法，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三，可代表内阁制、联省自治制、总统独裁制三型）；
- (五) 法国一九四六年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四，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

有何意见望告。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



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



1954年，毛泽东在浙江农村视察。



《瑞雪兆丰年》(中国画)

关于在七届四中全会前征求 对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 意见的电报

(1954年1月18日)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中央全会既定本月三十日开会，还有十几天时间，为使在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参加会议的同志事先有所准备起见，建议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即日用电报发给他们阅看，如有因病因事不能到会的，请他用电报表示意见。同时可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的意见，以供全会参考。又张闻天^[1]同志宜通知他到会。以上请酌定。

毛泽东
一月十八日

[1] 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驻苏联大使。

关于高岗^[1]来信和七届四中全会的 开会方针问题致刘少奇电

(1954年1月22日)

刘少奇同志：

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

[1]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批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图为七届四中全会的会场。

同意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结论稿^[1]的电报

(1954年1月23日)

德怀同志：

原则上同意你在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结论稿，即可照此先讲，会后经书记处讨论修改后再印发。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一月廿三日

[1] 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在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结论稿。主要讲了五点内容：一、关于会议的收获；二、关于正规化、现代化问题；三、关于学习苏联经验与发扬我军光荣传统问题；四、关于组织编制问题；五、关于加强团结改进领导问题。

关于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 闭幕词的修改意见^[1]致朱德电

(1954年1月25日)

即送朱德同志：

一月廿四日电及闭幕词收到。罗瑞卿、陈伯达二同志建议，在说党军关系及学习苏联的地方增加几句话，我看了认为可以，请你

[1] 罗瑞卿、陈伯达建议在朱德的闭幕词中增加的几句话是：关于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原闭幕词稿说：“全党团结的最重要的关键，是党和武装部队的高级干部间的团结。因此，党的和武装部队的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应有很高的自觉，应充分认识自己责任的重大。”陈伯达建议在这以后增加一段话：“必须使全军了解：我们的武装部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了敌人的。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我们的革命武装部队。我们军委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我们武装部队的高级干部应当时刻记住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就是说，我们的武装部队和武装部队的一切干部，要忠诚地服从党的领导，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紧紧地团结起来。”关于学习苏联问题，原闭幕词稿说：“我们要认真学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和技术，学习苏联军队先进的作战经验，学习苏联军队现代化的指挥艺术，学习苏联军队高度统一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学习苏联军队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罗瑞卿建议在这之后增加一段话：“拒绝学习苏联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加以反对。但脱离我军的实际去高谈学习苏联，也是一种不正确的学习态度，因而就一定会是学不好的。”

和德怀^[1]同志等酌定之。

毛泽东
一月廿五日

现将有修改处的几段照发如下。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关于由杨尚昆^[1]转达四中全会文件 修改情况和有关意见给刘少奇等的信

(1954年1月27日)

刘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关于文件修改情形及我的一些意见，请杨尚昆同志向你们作报告。我和其他同志在这里都好。

敬礼！

毛泽东
一月廿七日

[1]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月下旬携带四中全会文件从北京到杭州。



1954年1月29日，毛泽东和女儿李讷同游杭州五云山。



1954年1月31日，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陪同毛泽东视察钱塘江。



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



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西湖畔。



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



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



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



《毛泽东在杭州》(中国画)

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四周年致马林科夫电

(1954年2月11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同志：

值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四周年之际，主席同志，请接受我衷心的感谢与热烈的祝贺。

四年来所经历过的事实愈益清楚地证明了：中苏之间的伟大同盟是保障远东及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可靠基础。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中国的真诚无私的援助对加速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使中国稳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壮大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谨祝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团结永远发展和巩固。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一日 北京

关于宪法初稿的讨论和修改 给刘少奇等的电报和信

(1954年2月17日)

—

刘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现将宪法初稿（五份）派人送上，请加印分送政治局及在京中委各同志，于二月二十日以后的一星期内开会讨论几次，将修改意见交小平、维汉^[1]二同志带来这里，再行讨论修改（约七天左右即够）。然后，再交中央讨论，作初步决定（仍是初稿），即可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因此，小平、维汉原定二十日动身来此的计划，可推迟到月底动身。送初稿的人^[2]明（十八）日动身，二十日可到北京。

毛泽东

二月十七日下午十时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维汉，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2] 指张一平，当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

劉少奇同志並書記處為同志：現將憲法初稿（長約¹⁵）派人送上，請~~即~~
~~即~~加印發送政治局及在京中央各同志於¹¹二月二十日以後的一星期内開會討論修改，將修改意

見交小平維漢同志帶來這裏，再行討論修改~~修改~~
(約七天左右即够)。然後再交中央討論，作初步決定
(仍是初稿)，即可提交憲法起草委員會討論。因此，小平維漢原定¹¹二十日

動身來此的計劃，可推遲到月底動身。送初稿的人明¹⁸日動身，廿日可到北京。
毛澤東二月十七日下午十時

毛泽东致刘少奇等电的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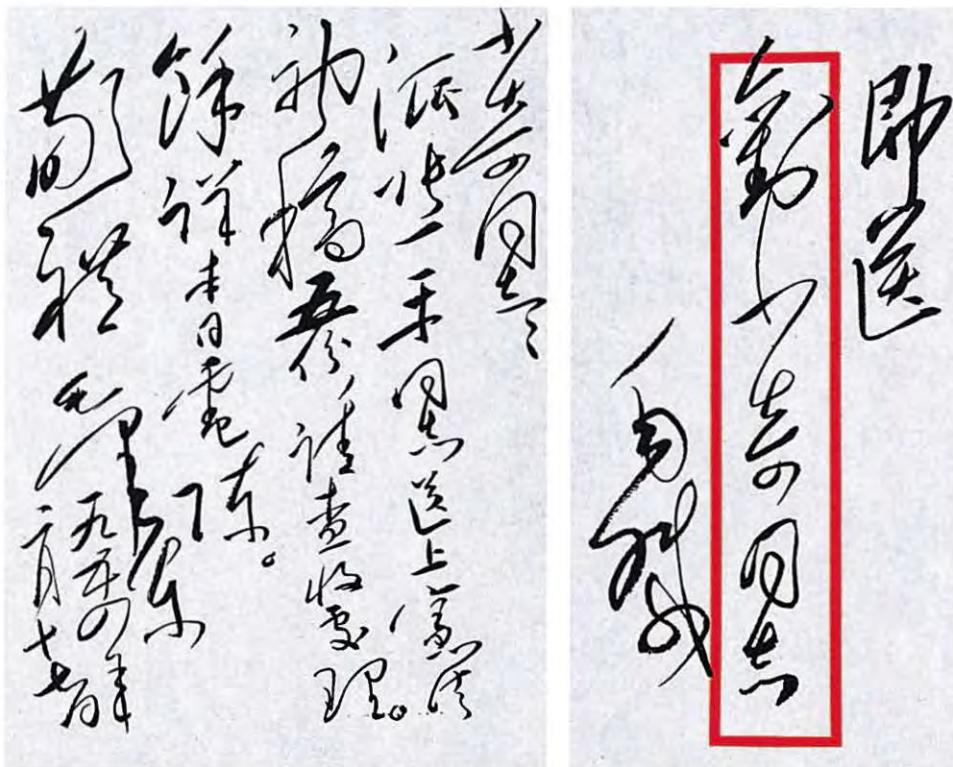
二

少奇同志：

派张一平同志送上宪法初稿五份，请查收处理。余详本日电陈。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七日



毛泽东致刘少奇信的手稿。

关于宪法草案初稿修改情况 给刘少奇等的信

(1954年2月24日、26日)

—

少奇同志：

兹将宪草初稿第二章以下二读稿及宪草小组报告送上，请印发各同志阅看。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二月廿四日上午二时

—

乔木同志：

今天所谈可作修改的地方，请于明日加以修改，并由小组各同志商酌一次，于明夜廿四点以前打好清样送我，准备后天（廿六）送给中央。

毛泽东

二月廿四日

三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为便于中央在这几天讨论宪法草案，这里的小组赶于两天内又作了一次修改，称为三读稿，现送上，请照此印发中央各同志阅看。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二月廿六日上午二时



1954年，毛泽东修改我国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毛泽东致胡乔木信的手稿。

毛主席：
今天所谈问题，
乃指於明日加以修改，並
由小组负责商討，
在廿二點以前，
或再行修改一次，
並請明早
來天安門修改。此
事有吾

毛泽东致胡乔木信的手稿。



《制定宪法》(中国画)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33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